

儒法斗争史话

开封师范学院《儒法斗争史话》编写组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序言	(1)
立法制管仲相齐国	(10)
作竹刑邓析反周礼	(14)
以法治军孙武练女兵	(17)
针锋相对少正卯斗孔丘	(21)
李悝相魏制《法经》	(25)
西门豹治邺破神权	(30)
吴起治楚狠斗旧贵族	(33)
商鞅变法为统一奠基	(37)
反儒学荀况批孟轲	(43)
批儒论法韩非集大成	(47)
秦始皇统一中国	(52)
承秦制刘邦建汉	(62)
卫汉业吕后除奸	(68)
巩固统一文景削藩	(75)
强本弱枝武帝兴国	(81)
桑弘羊舌战群儒	(89)
汉宣帝训诫逆子	(95)

王充伐孔刺孟·····	(99)
曹操打击豪门坚持统一·····	(107)
诸葛亮以法治蜀·····	(114)
范缜大讲“神灭论”·····	(120)
武则天做皇帝·····	(124)
柳宗元奋笔斥韩愈·····	(130)
王安石三斗司马光·····	(137)
反理学陈亮斥朱熹·····	(144)
张居正改革行法治·····	(150)
李贽反孔 宁死不屈 ·····	(157)
反倒退王船山狠批程朱·····	(162)
龚自珍怒驳嘉庆·····	(168)
严复译述《天演论》·····	(174)
章太炎批康反袁·····	(181)
编后记·····	(188)

序 言

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末期以来，两千多年中，一直存在着儒法斗争以及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思潮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思想内容，并且有着不同的斗争形式，但是，从实质上讲，都是复辟与反复辟，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两条路线的斗争。根据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儒法斗争大体可以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 儒法斗争的序幕

什么叫儒家？“儒”在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是一种职业名称，奴隶主贵族办婚丧“大事”时，去充当司仪和吹鼓手的就叫“儒”。因为孔老二年轻的时候干过这种职业，他所开创的学派，就叫儒家学派。孔老二是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代表，他创立儒家学派是妄图维护垂死的奴隶制度。因而，保守、倒退，也就成了这个学派的突出特点。

什么叫法家？法家是同儒家针锋相对的一个学派，它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这个学派最根本的主张是“以法治国”，所以称为法家。在中国奴隶制社会里是没有

法的，奴隶主贵族任意压迫、残害奴隶，想打就打，想杀就杀，不受任何限制，奴隶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法家学派主张“以法治国”，订出法律来，人人都得遵守，连奴隶主贵族也得遵守。而且，他们所订的法律，都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以法治国”，实际上就是要扶新兴地主阶级上台，赶没落奴隶主阶级下台。因此，这个学派也有它显著的特点：主张革新，坚持进步。

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七一年——前四七五年），就进入了没落、瓦解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非常尖锐，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奴隶们对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忍无可忍，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从怠工、逃亡，直到举行武装起义。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打得奴隶主望风而逃。在奴隶们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夺权斗争。当时，铁犁牛耕已经逐步使用，新兴地主阶级就利用大量的逃亡奴隶和这样先进的生产条件，大量开垦土地，冲破了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井田制。在上层建筑领域里，也形成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儒法斗争的序幕揭开了。斗争的焦点是建立新兴的封建制，还是维护反动的奴隶制。法家的先驱管仲、邓析、少正卯为封建制的诞生大喊大叫，制造革命舆论；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则拚命宣扬“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妄图使反动、腐朽的奴隶制永世长存。儒法斗争一开始就是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两条路线的斗

争。

二 战国初期到中期的儒法斗争

自公元前四七五年，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奴隶、农民反对奴隶主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已先后在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掌握了政权。但是，这种新建立的政权还很不巩固，奴隶主贵族还有很大的势力，它们不断进行疯狂反扑，时时刻刻都妄图复辟。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各国先后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实行了变法。其中最著名的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除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礼治”，建立封建地主阶级的“法治”；废除奴隶主土地占有制——井田制，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建立为封建地主阶级参政敞开大门的“因能授官”制。实行变法是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贵族的决战，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变法过程中，奴隶主贵族及其思想代表儒家反动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扑，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政变。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杰出的法家代表吴起、商鞅，先后在激烈的斗争中献出了生命。这再一次说明：儒法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吴起、商鞅虽然牺牲了，但是儒家反动派并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封建制度在斗争中继续取得胜利，逐步巩固起来。

三 战国后期的儒法斗争

经过战国初期到中期的变法斗争，封建政权在各诸侯国已经确立，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当时各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严重的障碍，特别是各国间频繁的战争，不仅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也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同时也给奴隶主贵族复辟造成可乘之机。因此，消除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就成为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度的迫切需要。杰出的法家代表荀况、韩非、李斯等，为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奔走呼号，大造革命舆论。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派，却顽固坚持复辟、倒退，大造反革命舆论。这时儒法斗争的焦点就是坚持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还是继续维持割据状态，这实质上还是巩固封建制和复辟奴隶制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李斯等法家人物的协助下，用武力消灭了六国割据势力，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

四 秦统一中国后到西汉中期的儒法斗争

秦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以后，被推翻的六国旧贵族和奴隶主残余势力及其思想代表反动儒生，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都在妄图死灰复燃，颠

覆统一的新兴地主政权，复辟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发展封建制度，就给予这些复辟反动势力以迎头痛击。这时，儒法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坚持统一封建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关于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坚持统一、进步的法家路线的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焚书坑儒”就是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残余复辟势力进行革命专政的有力措施。

秦始皇死后，赵高篡权，改变了法家的正确路线，儒家反动路线占了上风，奴隶主残余势力重新掌权，大开历史倒车。但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以风卷残云之势，扫除了这批历史沉渣，推翻了赵高把持的秦政权，为法家刘邦以及西汉中期以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政治家吕后、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重新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扫清了道路。

五 西汉后期到隋唐时期的儒法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他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

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

在西汉后期，封建制度已经巩固，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危险时期已经过去，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突出出来了。这时，地主阶级所考虑的已经不是进行社会改革，而是如何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镇压，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主张进步和革新的法家思想，已经不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儒家保守、倒退的反动思想，却与地主阶级保守派的要求相一致了。同时，儒家学派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被推翻后，也在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寻找新的主子。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神学化了的儒学，及其提出的“三纲五常”那一套，就适应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需要。汉元帝时期是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转变为尊儒反法的转折时期，从此以后，儒法斗争就变成地主阶级内部保守势力与进步势力的斗争。

六 宋、元、明、清时期的儒法斗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宋朝，已经开始向后期演变，土地高度集中，地主政权越来越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反动思想工具、董仲舒的神学化儒学反动思想，经过法家、特别是农民的冲击和批判，它的虚伪性已经逐渐暴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统治人民麻痹人民的需要；于是，更狡猾、更系统、更具有欺骗性的反动理论便被提了出来。这就是经过程颢、程颐、朱熹等反动道学家

改造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从北宋到明、清，法家和农民起义在思想领域的斗争，都是直接对着程、朱的反动理学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者特别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于是，反动的儒家思想地位也就被越抬越高，而法家思想越来越处于受排挤、受打击的地位。这种形势迫使某些法家人物不得不采取打着儒家的旗号反对儒家的策略。在这个时期，法家长期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很难掌权；即或掌握了政权，时间也很短，进行改革的成效也不太大。但是，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息过。这个时期的儒法斗争，仍然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两条路线斗争。儒家代表最腐朽的反动势力，对内坚持守旧、倒退，对外卖国投降；法家代表进步势力，对内主张革新、进步，对外是爱国的，主张抗战。

七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儒法斗争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自一八四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更加陷入苦难沉重的深渊。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

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中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

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封建买办势力，为了维护他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反动统治，打起了“尊儒反法”的黑旗，对内鼓吹复古、倒退，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对外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投降卖国。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发展资本主义，则举起尊法反儒的旗帜，对内提倡革新和革命，对外也有一定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性。这时的儒法斗争，仍然是两条路线斗争，但它具有了和封建社会不同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

在新的历史阶段，农民阶级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孔运动的主力军。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农民革命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对儒家的反动思想也是一场广泛深刻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尊法反儒的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综观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历史，就会发现：法家和儒家的斗争以及尊法反儒与尊儒反法思潮的斗争，始终同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进步与保守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儒家的孔孟之道，实际就是反革命之

道，复辟之道，分裂卖国之道，它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吹捧，成为他们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主张革命、坚持进步、反对复辟倒退的法家学派，则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歪曲和攻击。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靠苏修，充当儿皇帝，也打出了尊儒反法的破旗，胡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另一方面，他恶毒地攻击法家是“罚家”，还狂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借攻击秦始皇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揭露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揭露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必须同当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批林就必须批孔，不批孔，批林就不能深入，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为了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战斗，去夺取胜利！

立法制管仲相齐国

春秋时期，奴隶制的周王朝名存实亡，诸侯国家林立，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整个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整个社会进行大变革，势所难免。适应这种大变革的形势，出现了法家的先驱者管仲、邓析、少正卯等，要求冲破维护奴隶制的周礼的束缚，实行社会变革。他们提出的变革主张，反映了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管仲（？——公元前六四五年），又名夷吾，字敬仲，春秋时代郑国人。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游历过很多国家，了解到各地风俗民情和社会变革情况，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到齐国参加政治活动。管仲投在公子纠门下，鲍叔牙投在公子小白门下。这时正赶上齐国发生内乱，管仲随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随小白逃往莒国（今山东莒县）。不久，齐襄公被杀，国内无主，齐国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立公子纠为国君，一派主张立公子小白为国君。鲁国知道消息后，赶紧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去，想让他立为国君。莒国也用军队急忙护送公子小白回去。鲁、莒两国的军队在路上相遇，打了一仗。管仲出战，一箭射中了小白的带钩。小白乘势装死，鲁军受骗，

行动缓慢，结果小白先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五霸之首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立即出兵打退护送公子纠的鲁国军队，齐桓公的君位才得到巩固。齐桓公对于箭射他的管仲很恼火，想要杀死管仲以报一箭之仇。这时鲍叔牙就对齐桓公说：管仲是有才干的人，不能杀，你要想治理好齐国，用我还可以，你要想称霸天下，非得把管仲请来不可。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话，就要去请管仲。鲍叔牙又说：你如果去请管仲，鲁国知道你要重用他，非把他杀了不可，只有想个计谋才能使管仲来齐国。齐桓公按照鲍叔牙的建议，给鲁国写了一封信，说公子纠是我的亲人，我不好处罚他，你们杀掉算了；但管仲是我的仇人，我非亲手杀他不能解恨，因此你们要把管仲交给我。鲁国接到信后，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打入囚车，送给齐国。囚车上路后，鲁国明白了齐国要管仲的用意，就赶紧派人去追，可是已经追不上了。管仲到了齐国，齐桓公任命管仲为相。管仲在齐国帮助齐桓公，主要进行了以下的改革：

一、反对守旧，反对奴隶制的“礼治”，主张“以法治国”。他认为：法是处理社会上一切事情的是非标准。犯了法就要依法制裁，老百姓死了也不怨恨；以法赏功，老百姓受了赏就会感恩。所以他说：刑罚严，老百姓就不敢干坏事，赏赐公平，老百姓就不怕困难。管仲的“以法治国”，就从根本上冲击了奴隶主按尊卑贵贱区分等级、差别、远近、亲疏的“礼治”统治秩序，打击了奴隶主贵族。

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中，还提出“任贤使能”的主张。

他说：使有才能的人当官，最高统治者就能保持他的尊贵，使战士有功得到赏赐，士兵就勇于打仗，要能够任贤能，赏有功，国家就可以治理好。管仲“任贤使能”，越出贵族世袭的限制，选拔那些有才能、有勇力、有功劳的平民和没有政治地位的人参加国家政权，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度。

二、重视农业生产，改变赋税制度。齐桓公问管仲要“富国强兵，建立霸业”有什么办法，管仲就说：要富国强兵，首先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开荒种地，增种五谷。“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生产发展了，国家才能富强。管仲提倡“农战”，反对空谈礼义。认为只有仓库里装满粮食，人们的衣食充足，才谈得上礼义道德。管仲还根据齐国近山海、富鱼盐的有利条件，用政府的力量，设立盐官煮盐，设立铁官铸造生产工具，设立铸钱机构，来发展工商业，以增加齐国政府的收入，加强齐桓公称霸的经济基础。

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生产水平。管仲还提出了“相地而衰(cuī音崔)征”的赋税制度，即按土地质量的高下规定税收轻重，这就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这个时期孕育了幼芽。

三、改革军制，发展军事力量。管仲根据齐国的情况，对齐国的军制进行了改革，打破了西周以来的贵族兵制，解放了一些奴隶去充当士兵，改变了军队成分，扩大了兵源，并按居民组织编成军队，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

五家编为一轨，有一轨长。十轨编为一里，设一里长。四里编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编为一乡。乡有乡长。五家出五人为兵，叫一伍，由轨长率领；十轨出五十人为一小戎，里长率领；四里出二百人为连，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一乡出二千人为旅，由乡长率领。管仲把全国分十五乡。共出三万人，分为三军，加强了齐国的军事保卫力量。这些军士，因为是按居住地区编制的，彼此都很熟悉，打起仗来，尽力互相支援，所以要打仗就能胜利，要守城就能守得牢。齐桓公就是依靠这三万军队力量，在北方阻止了戎人、狄人的侵扰，在南面，挫败了楚国进攻的锋芒，而称霸中原地区。

管仲在齐国实行的一系列改革，都反映出他那个时代新兴势力的要求，促进着新的封建因素的发展，是后来法家的“法治”路线的先声。这些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于时代要求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了促进的作用。

作竹刑邓析反周礼

邓析（约公元前五四六——前五〇一年），郑国（今河南新郑县）人。他在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聚徒讲学，大力宣传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思想，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说教。他主张“不法先王，不是（不赞成）礼义”。要求打破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反对奴隶主贵族吹嘘的什么“德治”，认为“天”和国君（奴隶主总头子）对老百姓并没有恩德。他说：尽管人们十分虔诚地敬天祭天，但是天不能把年轻的死者救活，使善良的人长寿；天也不能禁绝人间邪恶，使人安宁。奴隶主对触犯他们利益的人从来毫不宽容，都要杀头的。周公为了维护成王的地位，杀了亲兄弟管叔、蔡叔，周公连亲兄弟就没一点恩德，对老百姓还会施恩德吗？他坚决反对把维护奴隶制的“周礼”作为衡量一切言行是非的标准，而提出“以非（指违反周礼的言行）为是，以是（指符合周礼的言行）为非”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新的的是非标准，鼓励人民起来与奴隶主贵族作坚决斗争。他宣扬“山与渊平”的变革思想，要求打破奴隶主贵族的尊卑等级秩序。邓析这些革新思想，对瓦解奴隶制的统治，是一个锐利的思想武器。

邓析很有口才，善于辩论，积极地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

济、政治利益辩护，和奴隶主统治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郑国的奴隶主贵族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下，也被迫颁布了一个成文法——刑书。不过这个刑书是铸在鼎上的，放在官府里面，只供奴隶主贵族内部掌握，一般人是见不到的。邓析就利用这一刑书进行斗争。他鼓励一些人把刑书抄录后悬挂起来。郑国的官府害怕人们掌握了刑书条文，下令禁止悬挂刑书。邓析就把刑书的条文抄录下来到处送人，广为散布。郑国官府又下了一道命令，不许互送刑书。邓析就将刑书条文摆在家里让人参观。郑国官府每下一道禁令，邓析就变换一种方式加以对付，搞得他们毫无办法。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纷纷到邓析那里学习诉讼，人数多得“不可胜数”；而且在邓析的帮助下，打官司都能取得胜诉，这对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后来，邓析又“不受君命”，将旧有的刑书予以根本的改变，自己编写了一部新的成文法。由于这部新法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叫做“竹刑”。这部完全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新法，对宣传革新思想，瓦解奴隶主的思想统治起着一定作用。

邓析这个革新思想家、鼓动家，还采取各种形式和办法，包括类似大字报的形式，出政治揭帖，来揭露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欺压剥削人民的种种罪行，掀起一股革新风潮，致使“郑国大乱，民口灌哱（喧哗）”，搅乱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由于邓析在郑国大力宣传革新思想，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使奴隶主贵族惶惶不安。因此，郑国反动守旧的当政

贵族，对他恨之入骨，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拚命地对他进行攻击和迫害。最后，郑国奴隶主贵族看到末日快要来临时，就对邓析下了毒手，于鲁定公九年（公元前五〇一年），以“诈伪之民”（不老实，不规矩，好捣乱）这样不清不白的罪名，杀害了邓析，并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

法家先驱者邓析奋斗一生，表现了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新精神。也清楚地说明了儒法斗争的尖锐性。

以法治军孙武练女兵

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国都在临淄）人，与少正卯同时。孙武很早就注意总结古代的军事经验，写了一部我国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这部兵书反映了当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军事理论，并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外军事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对《孙子兵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孙子的规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孙武不但在军事上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旗帜鲜明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儒家的“礼治”，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他“以法治军”，认为军队必须立法严明，用法来编制军队，制定军令，管理军队。这是军队打胜仗的重要因素。他说：凡是善于用兵的人，一定坚持用法治军，赏罚严明。如果赏罚不明，没有严明的军令，就不能管理好军队，这样的军队就不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就要打败仗。孙武练女兵斩美姬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他主张“法治”，“以法治军”的思想。

孙武所处的时代，不仅在我国北方奴隶制已日趋崩溃，奴隶起义风起云涌，新兴地主势力逐渐抬头，而且在南方比

较落后的吴、越等诸侯国，那里的国君也感到按照老样子再也不能统治下去了，纷纷下令求贤，要求改革。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武于公元前五一二年来到了吴国（国都在今江苏吴县），把他所作的《兵法》十三篇献给了吴王阖闾，受到了吴王的称赞。

有一天，吴王阖闾问孙武：“你的兵书我都看过了，可以摆一摆队伍小试一下吗？”孙武很干脆地回答说：“可以。”吴王接着又问：“用妇女练兵行吗？”孙武马上回答说：“当然可以。”吴王提出用女子练兵，是故意给孙武出难题。过去的统治者都轻视妇女，他们根本不相信妇女能当兵，更不相信女子会打仗。吴王阖闾抱着怀疑的心情，从宫中挑出了三百个青年女子，交给孙武训练。孙武把她们分成两队，以阖闾两个最宠爱的妃子为队长。孙武下令叫所有的人都披盔戴甲，手拿武器，把训练的动作向她们讲明后，就把刑具摆在一旁，指着刑具大声宣布军法：“不论尊卑贵贱，违犯命令者一律按军法治罪。”然后击鼓发令向右，那些妇女却嘻嘻哈哈大笑起来。孙武又把军令再三申明，然后击鼓发令向左，妇女们仍然嘻嘻哈哈大笑不止。孙武愤怒地说道：“训练规定不清楚，法令不明白，是将军的过错，既已三令五申，仍犯军令，这就是队长的过错。”孙武问军法官这应该怎么办？军法官说：“应该把两个队长处以死刑。”孙武立即下令刀斧手斩两个队长。阖闾正在台上看得出神，突然听到要斩自己两个宠爱的妃子，大为惊骇，急忙传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很会用兵了！我离开了这两个妃子连

饭也吃不下，请将军不要杀她们。”孙武根本不理睬，毅然决然地斩了两个妃子。接着又用另外两个女子当队长，重新击鼓发令。妇女们前后左右，或起或跪，动作整齐，没有一个敢发笑的了。于是孙武就使人报告吴王说：“队伍已训练整齐，大王可以下来看看，这些女兵任凭大王调用，让她们赴汤蹈火也可以。”吴王因为两个妃子被杀，就很不高兴地对孙武说：“将军回去休息吧，我不愿意下去看了。”孙武立即批评说：“原来大王只爱好我写的兵书中的词句，却不能真正按照它的原则去办事！”吴王听了以后，认为很有道理，马上就改变了态度，用孙武为大将，统率全军。

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孙武与孙臆、吴起、商鞅等著名法家人物并列在一起，这说明孙武也是法家的重要人物，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在吴国推行了法家的军事路线，对吴国强盛起了一定的作用。

孙武训练女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创举，也是对奴隶主贵族和孔老二轻视妇女的反动思想的有力批判，它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和法家对刚解放的奴隶和妇女力量的重视。孙武在练兵中，敢于违抗吴王阖间的意志，杀了吴王两个宠爱的妃子，这是法家“法不阿贵”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儒家“刑不上大夫”反动思想的否定。孙武练女兵，重视妇女战斗作用的传统，为以后的法家所继承。商鞅在改革军队时所提出的“三军”中，就有“壮女之军”，把妇女当成了可靠的战争后备力量。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也学着他老祖宗的腔调，诬蔑

“妇女落后”，“妇女无用”。妇女真的无用吗？毛主席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毛主席这一伟大教导为广大妇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是对孔孟之道宣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轻视妇女谬论的彻底批判。新中国的广大妇女，在党的关怀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正在各条战线上迅速地成长起来，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针锋相对少正卯斗孔丘

在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杀害邓析的同时，鲁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尖锐化了。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孔丘，为了反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挽救奴隶制，极力推行一条“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鲁国的法家先驱者少正卯（？——公元前四九八年），同孔丘“复礼”的反动倒退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孔老二从反动的“天命论”出发，认为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由天老爷的意志决定的，谁也不能违抗，如有违抗，就是得罪了天，那就不得了啦！少正卯则坚决反对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他不信“天命”，认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极力主张社会变革，造奴隶主阶级的反，向奴隶主贵族夺权，吓得孔老二胆战心惊。

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孔老二抛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所谓“克己”，就是要人们克制自己一切不符合奴隶主统治要求的革命思想；所谓“复礼”，就是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一整套等级制度，也就是全面复辟奴隶制。少正卯在政治上坚决反对维护奴隶主利益的“礼治”，走革新道路，主张“法治”，要求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权，以保护和发展新兴的封建地主阶

级的利益，与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礼治”针锋相对，给孔丘“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以迎头痛击。

孔老二进行反动说教时，前言不照后语，絮絮叨叨，干干瘪瘪，漏洞百出，尽是一些陈词滥调，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少正卯坚持革新，是一个热情的宣传鼓动家，在宣传革新思想时，语言生动，逻辑严密，把革新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使孔老二又气又恼。

孔老二从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反对变化，反对革新，反对社会发展，他极力美化奴隶制社会的一切，甚至对酒杯改改样子也大惊小怪。他所以这样顽固、保守，主要是想维护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使它能够万古长存。少正卯对奴隶主贵族内部的腐败无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在他的著作中能运用大量事例，说明事物是矛盾、变化和发展的，从而揭露奴隶制社会的种种罪恶，也就暴露了奴隶制的腐朽、没落，指出了奴隶制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狠批了孔老二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

孔老二思想反动，对奴隶阶级、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一律视为“非礼”，极力进行攻击和诬蔑。而少正卯则热情地支持一切反对奴隶制的革新思想和革命行动，并从理论上给予总结提高，发展成为自己的理论，有力地批判了奴隶制度。

孔老二办私学，招收学生，灌输奴隶主的反动思想，训练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打手。少正卯也办了私学，招收学生，进行革新思想的教育。少正卯宣传的革新思想，有理有

据，鲜明生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听讲。连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有几次孔老二的学生都跑光了，弄得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一个奴性十足的可怜虫颜回没有走，和他的老师孔丘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孔老二的学生听了少正卯的讲演，思想活跃起来，纷纷发表意见，有的直接向孔老二提出质问，把孔老二问得瞠目结舌，无以对答。儒家学派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被法家先驱者少正卯批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斗争是曲折的，敌人是狡猾残忍的。孔老二对于少正卯的革新理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在他骗取鲁国国君和执政者们的信任，当上了鲁国的司法长官和代理宰相职务三个月，就撕下了“仁者爱人”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站在两观台上(这是鲁国奴隶主头子们发号施令的地方)，杀气腾腾，指挥着一群刽子手，杀害了法家先驱者少正卯，而且陈尸三天，大搞反革命恫吓。孔老二的野蛮暴行，激起了鲁国各阶层的反对。孔老二的学生纷纷要求他说明杀少正卯的理由，子贡直接质问孔老二：“少正卯是鲁国闻名的人物，你刚刚当政，为什么要杀他？”有的学生指着孔丘说：“你不是说掌握政权的人不要杀人吗？为什么你一当政就杀了鲁国著名的革新家呢？”把孔老二问得满头大汗，丑态百出，但实在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只好吱吱唔唔，凑了几条所谓的“罪状”，说什么只要有其中一条就该杀头。这是十足的恶霸作风，很有点法西斯气味。孔丘杀少正卯，决不说明儒家和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强大，相反正是他们虚弱的表现。

郑国的奴隶主贵族杀邓析，孔丘杀少正卯，揭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这个斗争一开始就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是革命与反革命，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

李悝相魏制《法经》

在孔丘的反动言论集《论语》中，这样记载了孔老二和他的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治理国家什么事情最重要？”

孔丘答：“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粮食，还要讲信用。”

子贡又问：“在必不得已时，首先应该去掉什么？”

孔丘答：“首先要去掉军队。”

子贡又问：“再不得已时，应该去掉什么？”

孔丘答：“应该去掉粮食。但，信是不能去的。没有粮食饿死几个人不要紧，要是不讲信用，不讲仁义礼智信，那就没法统治了。”

在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已经在很多国家掌握了政权，首先是掌握了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孔老二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大讲什么治国可以不要军队，实质上是不要新兴地主阶级掌握军队，也就是不要奴隶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用暴力革命推翻奴隶主的反动统治。所谓可以去掉粮食保存信用，就是要奴隶直到饿死，也不能反抗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其实，孔老二所说的保存信用，也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儒家的反动信条之一，孔老二本

人就是一个言行不一，善于耍两面派的伪君子。正如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所痛斥的，孔老二是摇唇鼓舌，假说仁义，骗取利禄的“巧伪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耕战政策，就是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加强军队，利用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抗。这是当时巩固封建政权，反对奴隶制复辟的有效措施之一。

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晋国奴隶主政权，被三家新兴地主集团所推翻，建立起韩、赵、魏三个封建制国家，这是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斗争的重大胜利。新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时刻梦想变天复辟，因此，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斗争的焦点。韩、赵、魏三个封建制国家，为了巩固封建政权，打击奴隶主的复辟势力，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魏国的改革成绩比较显著，影响比较大。

公元前四二四年，魏国国君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kuī音亏）为相，进行变法，积极推行耕战政策。李悝（约公元前四五五年——前三九五年）又名李克，战国初期魏国人，是先秦时期著名法家人物之一。他在魏国实行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废除“世卿世禄制”，主张“食有劳而禄有功”，实行按功劳和能力大小选官的制度。这就是取消奴隶主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世袭特权，使新兴地主阶级牢固地掌握政

权。

二、制定《法经》，确立地主封建政权的法制，稳定封建社会秩序。《法经》共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这部法典，在新兴地主阶级上升阶段，即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阶段，打击、镇压了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对稳定封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当然，李悝的《法经》，也有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这一点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也是必须指出的。

三、推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dí音笛)法”，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使土地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教令。怎样使土地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呢？就是把土地分给解放了的奴隶耕种。我们知道，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打骂、买卖，甚至屠杀。奴隶解放为农奴或农民后，虽然要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这种剥削和压迫也是很沉重的，但农奴或农民人身获得了相对自由，还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提高。李悝正是利用农民这种积极性，发挥土地的潜力，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尽地力之教”的公布和执行，实际是废除了奴隶主土地占有制——井田制，使封建土地制度在法律上得到承认。

为了调动农奴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土地的潜

力，李悝详细地算了一笔账。他说：在一百里一块地方内，有田九万顷，除去三分之一的山水和城乡居住区外，还有六万顷土地，如果都努力生产，搞得好，每亩可增产三斗，一年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如果不努力生产，搞不好，每亩地就要减产三斗，一年就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李悝列举的数字是有说服力的。说明在条件相同的土地上，搞得好坏，人是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是很有启发性的。李悝推行“尽地力之教”，表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对生产的关心，同时也是对孔老二的“种地就要饿肚子”（“耕也，馁在其中矣”）反动观点的批判。

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李悝还提出了“平籴法”。他把农业年景分为大丰收、中丰收、小丰收、大饥年、中饥年、小饥年六等。大丰收年，国家就多征一些粮食，大饥年国家还可以放出一些粮食，以丰补歉，“取有余，补不足”。

在“平籴法”未实行前，奴隶主和大商人操纵粮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丰年，粮食多了，商人就压低粮价，造成谷贱伤农的恶果；饥年，农民缺少粮食，商人就抬高粮价，使农民卖儿卖女也无法维持生活。李悝的“平籴法”规定，由国家控制粮价，使丰年和饥年保持粮价的相对平稳，打击奴隶主贵族和商人的非法活动，这是法家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措施，对打击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保护新建立的封建生产关系，发展封建经济有一定作用。

魏文侯在依靠李悝实行政治变法的同时，还任用吴起改

革军事。

吴起是战国时期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与孙武齐名的杰出的军事家。吴起在魏国的主要活动，是帮助魏文侯建立了一支新的军队，名叫“武卒”。吴起治军，纪律严明，平时很重视军事训练。据古书记载，说吴起能与士兵穿同样衣服，吃同样的饭，还能关心士兵的疾苦。古书上对吴起的称赞，难免有夸大过头的地方，但魏文侯任用吴起当西河郡守的时候，在对秦国（当时奴隶主还在当政）的战斗中，正是依靠这支新的军队经常打胜仗，威震西河。

李悝、吴起的变法实际是法家的耕战政策在魏国的具体实践。由于魏文侯执行了李悝、吴起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削弱了魏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促进了魏国的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但是奴隶主贵族对他们的失败并不甘心，他们时刻梦想复辟。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武侯即位，这时复辟的旧势力又卷土重来，孔老二的门徒子夏纠集了一批社会渣滓，大肆宣扬孔老二的黑货，干扰李悝新法的执行。武侯尊儒反法，撤了李悝的职，先后任用保守派头子商文、公叔为相。又以狡诈、顽固的王错为亲信，极力打击排斥地主阶级的革新家吴起。吴起被迫不得不离开了魏国。

西门豹治邺破神权

公元前四二四年——前三九七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进行变法的时候，任用西门豹为邺地（yè音业，今河北临漳县）的县令。西门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无神论者，他在李悝主持的变法中，用唯物主义无神论，同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儒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邺地在商朝是处于奴隶主国家统治的中心地区，即“王畿”范围内。过去都说“殷人尚鬼”，就是说殷奴隶主贵族利用鬼神迷信来统治人民。邺地有个漳河，因年久失修，经常泛滥成灾，那里的一些奴隶主恶霸势力，继承商代统治阶级的神权政治，编造出“河伯娶妇”的鬼话，以破坏法家的耕战政策，剥削、残害当地人民。什么叫“河伯”？“河伯”就是奴隶主复辟势力捏造出来的漳河河神。他们造谣说，“河伯”很厉害，每年要娶一个媳妇，如果每年不给河神送去一个媳妇，河神就要发大水，把庄稼房屋都冲毁，把老百姓都淹死。

西门豹初到邺地，就召集群众，调查、了解法家耕战政策的执行情况，问老百姓有什么疾苦。群众说：“老百姓最感痛苦的是给河神娶媳妇，因为给河神娶媳妇，把这个地方弄得很穷。”西门豹问是什么原因，群众说：“邺地的廷

掾（辅佐县令的官，掾yuàn音院）和三老（乡官）借为河伯娶妇，常年搜刮老百姓，每年收钱数百万，只用二三十万为河神娶媳妇，其余的钱就伙同巫祝贪污了。到给河神娶媳妇的时候，女巫就到贫苦百姓家里去，看见谁家的女儿长得漂亮，就说该给河神作媳妇。首先叫这个女子洗澡洗头，穿上漂亮的衣服，住在河边洁净的房子里，房子里还搭有绸帐，放有牛肉和酒，准备有象结婚用的那样华丽的床。过了十几天，就强迫这位女子坐在床上，放到河里随水漂流，活活给淹死。因此，家里有漂亮女儿的贫苦老百姓，怕自己的女儿为河神娶走，都纷纷逃亡，搞得这个地方民心惶惶，田地荒废，人口日益稀少，越来越穷。”西门豹听了，非常气愤，决心对这伙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旧势力给以致命的打击，让法家的耕战政策在邺地得到执行。

到河神娶媳妇那天，廷掾、三老和一个老巫婆，还有她的十来个女徒弟都到了河边，河岸两边的老百姓，也有来观看的。西门豹亲赴河边，将计就计，把廷掾、三老和巫婆利用神权残害人民，破坏法家耕战政策的场合，变成了破除迷信、对旧势力实行专政的战场。等人到齐以后，西门豹对廷掾、三老等奴隶主恶霸和巫婆说：“把给河神作媳妇的女子叫来，让我看看长得怎么样？”那个被强迫给河神作媳妇的女子从帷帐中出来，到了西门豹跟前。西门豹看过后便说：

“这个女子长得不漂亮！麻烦大巫婆先去给河神说一声，要挑一个更好的女子，到后天就给送去。”说罢就叫人把大巫婆扔到了河里。停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为什么还不

回来？叫徒弟催催去。”于是又把一个徒弟投到了河里。一连共投了三个徒弟。西门豹“法不阿贵”，为了更沉重地打击旧势力，揭开他们玩弄的鬼把戏，就说：“巫婆、徒弟不能把话说明白，再麻烦三老去给河神说一下吧！”于是又把一个乡里的奴隶主恶霸头子三老扔到了河里。在场的廷掾、三老，这时都吓得面如死灰，屁滚尿流，连连磕头求饶，磕得头破血流。西门豹说：“大概河神要久留客人了，你们都回去吧。”邺地的官吏、巫祝都很害怕，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提给河神娶媳妇的事了。

西门豹为了推行法家的耕战政策，在邺地大力宣传无神论思想，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治理漳河，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经过艰苦奋斗，开了十二条水渠，灌溉民田，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西门豹在邺地破除迷信，兴修水利，是魏国新兴地主阶级变法中的一个突出事件，也是法家无神论战胜儒家有神论的一次大搏斗。它表明，西门豹是一个法家，又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为以后的法家荀况、韩非所继承。在这里也清楚的表明，法家主张变革、前进的政治路线，是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路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吴起治楚狠斗旧贵族

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在攻击革命暴力同时，总是要大肆宣扬什么“仁政”、“德治”。到底历史上有没有“仁政”、“德治”呢？现在让我们以吴起在楚国变法的斗争事实来说明一下吧！

吴起被迫离开魏国后，于公元前三八四年到了楚国。

楚国在我国的南部，当时是旧的奴隶主贵族势力比较顽固的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都操纵在屈、景、昭三家大贵族手里。他们拼命维护奴隶制度，残酷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把楚国糟踏得不象样子。楚悼王即位后，接连被三晋的联合力量打败，丧失了大片土地。楚国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求秦国从中调停，才得与三晋讲和。就在这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楚悼王下令征求有才能的人帮助他实行政治改革。

楚悼王早就听说吴起在魏国改革政治、军事取得很大的成绩。当吴起来到楚国时，悼王热情地接待他，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悼王问道：“你看，我们楚国为什么这样贫弱？”吴起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之所以如此贫弱，就是因为旧贵族势力太大，分封的旧贵族太多了，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把楚国弄得贫弱不堪。”楚王接着又问道：“那么，

该怎么办才能够使我们楚国富强起来呢？”吴起明确地告诉他：“必须革新，实行法治。”接着吴起胸有成竹地提出一系列无情打击奴隶主贵族，废除世袭特权，发展农业生产，整治甲兵以争天下的政治主张。悼王听后，非常高兴，让他作了楚国的令尹（即宰相），从公元前三八二年起，辅佐楚悼王变法。吴起敢于冲破奴隶主残余势力的阻挠，坚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

一，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奴隶主“世卿世禄”制度，使楚国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小，以致出现了有人怕楚国的大贵族昭奚恤，而不怕楚王的情况。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变法规定，大奴隶主贵族三代以后没有军功的就取消他的爵禄，把节约下来的钱抚养战士，以加强楚国的军事力量。同时还把那些在地方称王称霸、民愤较大的奴隶主贵族迁徙到地旷人稀的边远地区去垦荒，严重地打击了腐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势力。

二，为地主阶级进一步掌握政权而整顿政治机构。“罢无能，废无用”，裁减一批顽固派的官，选拔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做官。这一变法措施，横扫了楚国原来腐败的政治风气，使法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

三，为了防止旧贵族捣乱，禁止他们互相勾结，干预国家政令，采取了统一舆论的措施，禁止妨碍改革的议论。同时重视军事，扩充军队武器，加强对士兵的训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利用革命暴力来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

楚国经过这些改革之后，逐渐富强起来，它的势力南面

发展到江浙，北面占据了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新蔡)。

一次魏国攻赵国，楚国出兵援赵攻魏，楚国的军队一直打到了黄河边。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变成了战国初期的一个强国。

但是，吴起变法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当中充满着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当吴起宣布要取消旧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时，以屈宜臼（jiù 音旧）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便抬出孔老二的“仁”、“德”，疯狂攻击吴起变法，攻击革命暴力，说什么“凡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都不更改古法，变换常道。你现在要变法，完全反乎古道，异于常规。你的变法简直是要违犯天道。”吴起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坚持变法，用革命暴力更“古法”，改“常道”，达到“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统治，以争天下的目的。吴起变法打中了奴隶主贵族的要害，以屈宜臼为代表的复辟势力，又杀气腾腾地威胁吴起说：“军队是行凶的工具，争夺是违犯德政的。现在你要富国强兵以争天下，完全是逆德的行为。兵器就是专门对付你们这些不道德的人的。”这里活现出一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的反动嘴脸。

吴起变法不到二年。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死了，这帮大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便撕破了“仁爱”的假面具，象野兽一样猛扑过来。围攻京师郢（yǐng 音影，今湖北江陵县北），发动了反革命复辟叛乱，把吴起围攻于楚悼王灵前，乱箭齐发，射向吴起。面对着奴隶主贵族的叛乱，吴起毫不畏惧，大声高呼：“我要你们看一看我用兵的厉害！”随即拔掉射在身上的乱箭，立即伏在王尸上，射向吴起的乱箭也

射中了王尸。楚国有一条法令，伤王尸者杀全家。吴起临死还利用楚国的法律同奴隶主残余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吴起被乱箭射死。王太子即位后，根据楚国的法律，把射王尸的旧贵族七十余家，全部处死。

吴起的死，再一次彻底戳穿了孔老二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宣扬“仁政”、“德治”的虚伪性。两千多年前的孔丘，一面叫喊“仁政”、“德治”，一面却挥动屠刀，杀害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到近代、现代，刽子手曾国藩，卖国贼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都是在高喊“仁政”的同时，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的。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高喊要施“仁政”，妄图篡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他叫喊“仁政”的同时，暗地里磨刀霍霍，制订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屠杀千百万革命人民，建立林家父子的法西斯王朝，让广大贫下中农再回到旧社会去，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无数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所谓“仁政”从来就是剥削阶级血腥镇压劳动人民的代名词。

商鞅变法为统一奠基

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孔子西行不到秦”，意思是说儒家的“教化”在秦国影响小。孔老二没有到过秦国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明秦国没有儒；儒家的势力在秦国也是很嚣张的。商鞅变法就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商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法家思想的奠基者。

在春秋末和战国初年，中原地区多数国家的新兴地主阶级已经通过斗争取得政权，秦国却仍然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战国中期，秦孝公嬴渠梁即位后，奋发图强，在公元前三六二年下令求贤，想要改革政治，商鞅就在这时候来到秦国。

商鞅（约公元前三九〇年——前三三八年），又叫公孙鞅，原是卫国（今河南濮阳）人，因他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一带），历史上称他为商鞅。他年青时就爱研究李悝、吴起等人的学说，到秦国后，受到秦孝公的热情接待与欢迎。商鞅向秦孝公讲用法家理论改革政治的问题，讲到“强国之术”时，使秦孝公听得入迷。中国古时候的人都是“席地而坐”。有一次，秦孝公听商鞅讲用法家路线治理国家的道理，越听越爱听，只怕听不清，身子不断地往商鞅那边移动，屁股早就坐到席子外边去了，自己还不知道。商鞅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就在秦国进行变法。

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听到秦孝公要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就疯狂地进行反对和捣乱。他们造谣中伤，聚众闹事，甚至要搞暗杀。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秦孝公也有些动摇。公元前三五九年，秦孝公召开了国务会议，让大臣们共议变法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商鞅便劝孝公实行变法，要不怕议论讥笑，坚决干下去。他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成就；做事优柔寡断，就不会有功效。再说，行事高明的人，无疑会受到一些世俗之徒的反对；有独到见解的人，总是会受到一般人的讥笑。在高明的政治家看来，只要能强国，就不必遵循旧制度；只要能利民，就不必墨守老规矩。”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话，称赞说：“讲得好”。但是代表没落奴隶主利益的大夫甘龙，却坚决反对。他公然跳出来说：“不对！我听说，圣人不改变旧习惯施行教化；聪明的君主不改变旧制度来统治人民。按照旧习惯来施行教化，就一定成功，根据旧规章治理国家，当官的习惯，老百姓也乐于接受。”听了甘龙的一派胡言乱语，商鞅立即反驳说：“甘龙说的那一套，全是庸人之见。一般人安于旧习惯，学究们拘泥于自己的狭隘见识。这两种人只可以当官，按旧法令办事；要是讨论革新变法的大事，他们完全是一窍不通的！历史上三代礼制不同，都得了天下，五伯的法度并不一样，也都取得了霸业。有作为的人总是要改革旧制度，糊涂人才墨守成规！凡是被礼制和古法约束的人，是不能和他讨论变法的。”甘龙被驳得哑口无言。这时另一个保守派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

效，就不更换旧器物。效法古代没有错，照老路走不会出岔子的！”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对国家有好处就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不守旧而把国家治好了，夏桀、殷纣王没有改变旧礼，却照样灭亡了。变法没有错儿，守旧值不得夸耀！”这一场辩论是关系到秦国前进还是倒退的尖锐的斗争。通过辩论，秦孝公更加相信商鞅的意见，决定下令变法。

商鞅运用法家学说，紧密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先后在秦国实行了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一、宣布废除井田制，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为发展封建经济开辟了道路。二、奖励耕战，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可以免除徭役，凡有军功都可以受“上爵”。这个措施，确立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与新的封建等级制度。三、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法治”，主张“刑无等级”，进一步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四、实行“燔（烧）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把那些危害新兴地主阶级利益，鼓吹儒家思想的《诗》、《书》全部烧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奴隶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儒家实行专政。

从以上可以看到，商鞅的变法，触及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当时没有任何一次变法可以与之相比的。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由于商鞅变法比较

彻底，对秦国复辟势力的打击比较重，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也更有利，为以后秦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为使新法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颁布之前，他曾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放在国都咸阳城南门，贴出告示：谁能把这根木杆搬到北门，就赏金十两。顿时全城哄动起来，都感到很奇怪，没有人敢搬。随后，又把赏金加到五十两。于是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鼓起了勇气，把木杆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付给赏金五十两。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接着，商鞅就向全国颁布法令，并积极宣传他的法家路线和思想，使妇女儿童“皆能言商君之法”。

商鞅变法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奴隶主贵族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拼死进行反抗，先是利用传统的习惯势力，煽动成千的人在首都咸阳闹事，妄图扼杀变法；后来，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太子驷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又唆使太子犯法，公开进行挑衅，蓄意破坏新法的贯彻执行。面对着这样严重的政治斗争，商鞅没有被反动保守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坚决处理了躲在幕后指挥的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还杀了犯法的大奴隶主贵族祝懽，并把捕获的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一些反动儒生，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商鞅坚决镇压垂死挣扎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与阶级敌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

但是，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失败。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一小撮死党，继续策划复辟活动。他们一面披上画皮，到处娓娓动听地谈论起变法的好处来，装出拥护革新变法的样子，妄图骗取信任，伺机反扑；一面指使反动儒生赵良，赤膊上阵，跑到商鞅跟前，大肆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责商鞅变法不得人心，威逼要商鞅下台，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奴隶主贵族软硬兼施都没有使商鞅动摇，他声色俱厉地痛斥了那些“当面捧场，背后骂娘”的贵族，并把他们统统赶到边远地区去。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当时的奴隶主复辟小丑一模一样，一面甜言蜜语，喊着“无限忠于”、“紧跟照办”，一面把“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写成条幅，挂在卧室，借用赵良攻击商鞅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充分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在变法后期，放松了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警惕，加上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而，当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与旧贵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驷上台，奴隶主复辟势力便都从阴沟里爬了出来，进行反攻倒算，最后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位杰出的法家战士。

杀害商鞅，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是继杀害邓析、少正卯、吴起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行，说明了复辟反复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这些历史事实说明

儒法之争，决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商鞅虽然遭到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杀害，然而，法家的政治路线是不可战胜的。秦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强盛起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这说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思想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因而必然要取得胜利。

反儒学荀况批孟轲

战国末期，出现一位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这就是法家的著名人物荀况。他大约出生在公元前三一二年，死于公元前二三八年，赵国人。荀子生活的时代，新兴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中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诸侯割据的局面，妨碍着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当时，法家和儒家政治斗争的中心，就是围绕着统一和分裂、复辟和反复辟展开的。

孔家店的二老板、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孟轲，效法孔老二，到处活动，游说诸侯，鼓吹“仁政”、“礼治”，大造反革命舆论，妄想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他恶毒攻击法家代表人物，咬牙切齿地叫嚷要革新派“服上刑”，就是说，要把主张用革命暴力实行变革的法家代表统统杀掉。杰出的法家代表荀况则积极宣传统一的思想，为实现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大喊大叫。他热烈地赞扬商鞅变法，把孟轲对商鞅的攻击称为“奸言”、“邪说”。为了贯彻法家路线，实现统一理想，在秦昭王时，荀况亲自到秦国去考察。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热情地赞颂了秦国自商鞅变法后的

大好形势，歌颂了法家政治思想路线。他还与自己游历过的齐、楚、赵等国的情况相比，发现秦国的政治最先进，超过了其他各国。根据确凿的事实，荀况认为，商鞅变法使秦的改革比较彻底，奴隶主贵族受到了沉重打击，形势一天比一天好，这是由于法治路线的正确，是历史的必然，决不是侥幸得来的。因此他坚决主张实行“法治”，并且把完成统一的事业寄托在秦国身上。

与孟轲“法先王”复辟倒退的反动口号针锋相对，荀况提出了“法后王”的进步口号。孟轲把殷周奴隶制说成是理想的社会，胡说社会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古比今好，大叫要“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道”，妄图开历史倒车，复辟奴隶制。荀况提出的“法后王”的口号，就是要效法坚持法治的国王。他说：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观察，具有灿烂光辉的还是“后王”。这是对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歌颂和肯定。荀况还说：孟轲之流提出的“法先王”的反动口号是借呼唤先王的阴魂欺骗傻子，用以达到混吃混穿，开历史倒车的目的。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孟轲一类俗儒口里高喊行“王道”，实际是为谋求私利的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

荀况与孟轲的“法后王”与“法先王”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坚持新兴地主阶级专政，还是复辟奴隶制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荀况旗帜鲜明地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进行辩护，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进步意义。

孟轲为了复辟奴隶制，还竭力兜售孔老二的天命观和反

动的“天才论”。孟轲大肆鼓吹天是有意志的，是操纵一切、控制一切的最高主宰者。奴隶主统治奴隶也是由天的命令决定的，为了统治奴隶，天把他的儿子派到人间来。他说天的儿子就是指奴隶主总头子，故称“天子”。天为了使他的儿子更有效地统治奴隶，还授予“德”和“才”，这就是“天德”、“天才”。孟轲把自己说成是“先知先觉”的“天才”，是应该统治奴隶的“圣人”。对于奴隶，孟轲极力宣扬“听天由命”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谬论，要奴隶们甘心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奴隶们无辜地被屠杀，甚至被活埋、殉葬，都被说成是上天命令决定的，而且对于这样的“天命”，奴隶既不能反对，也不能反抗，不然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天命论”和“天才论”，都是奴隶主头子为了统治奴隶制造的反动理论。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也露骨地宣扬“天才论”。这不仅表现了他政治上的反动，而且也表明他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荀况在对孔孟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和“天才论”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的同时，还提出了光辉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思想。荀况明确指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因为世界上有贤明的尧才存在，也不因为世界上有暴虐的桀而灭亡。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它不因为人嫌冷就取消了冬天，地也不会因为有人嫌远就缩小它的面积。天和人各有本分，天不能决定人的事情。相反，对天的规律，人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因此，荀况坚决反对人类在

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消极等待的思想，进一步提出要“制天命而用之”，即要掌握自然规律，用它为人类服务。荀况认为，如果人们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节约用度，天就不能叫人贫困；只要根据气节的变化，从事农业生产，天就不能使人得灾祸；有了准备，遇到水旱灾，天也不能叫人饥寒，相反，若是荒废农业生产，又穷奢极侈，天也不能叫人富贵。对荀况的话还需要进行阶级分析，但他要人们从自然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做自然界的主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荀况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天生的“天才”。认为“材性知能”，“君子”和“小人”都一样，都是后天积累和学习的结果。就象积土多了会成山，积水多了会成海一样，人的知识才能是靠后天的实践，根本没有天生的“圣人”。孔老二要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荀况把“天命”、“大人”、“圣人”都踩在脚下，认为“天命”是不存在的，“圣人”、“大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他说：王公大人的子孙可以变为庶人，庶人的子孙也可以变为卿相士大夫。这种可以调换位置的变革思想是对奴隶主世袭特权的否定，是对新兴地主阶级掌权的肯定，这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潮流的革命思想。

荀况当时提出的思想，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对当时人们思想的解放，鼓励人们为彻底消灭奴隶制，为发展封建制而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批儒论法韩非集大成

你知道“自相矛盾”这个故事吗？

从前有一个人市场上卖矛和盾。对着拥挤的人群，他首先夸耀自己的矛是天下最好的矛，不论怎样坚硬的盾，都能刺穿。然后他又夸耀他的盾是天下最好的盾，无论怎样锋利的矛也刺不穿它。这个人的话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正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问道：

“如果用你的矛刺你的盾怎么样呢？”这个人顿时目瞪口呆，回答不上来，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市场。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以子（你）之矛，攻子（你）之盾”的故事。“矛盾之说”的最早运用者，就是著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引用这个故事揭穿了儒家所宣扬的“圣人德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韩非追问道：既然尧的“德治”使“天下无奸”，那么为什么又要舜出来“救败”呢？既夸耀尧又夸耀舜，这岂不自相矛盾？况且天下那么大，人那么多，舜只一个人，生命也有限，怎么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感化过来，这不也自相矛盾吗？韩非就是这样，善于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抓住矛盾的两个方面，对儒家的复古倒退反动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前二三三年）是战国末期韩国（国都河南新郑）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和李

斯同是荀况的学生。他研究、总结并发展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法家思想，激烈地批判了反动的儒家思想，从理论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和政策。韩非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尽管已经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然而奴隶主复辟势力还非常猖狂。当时的儒家学派，死抱住孔丘的衣钵，天天在那里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攻击新兴的封建制度，有的甚至钻进封建政权内部，大搞阴谋破坏活动，企图把历史车轮向后拉。对此，韩非从维护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出发，给予了尖锐的批判。韩非称儒家学派的言论是“愚诬之学”，即不是欺骗人，就是胡说八道的东西，是“亡国之言”。他在《五蠹》这篇文章里，把儒者视为五蠹之首，是腐蚀社会和人民的蛀虫，必须加以铲除。

孔丘的忠实信徒孟轲曾经用“拔苗助长”的寓言，来怨恨历史车轮走得太快了。韩非针锋相对地在《五蠹》篇里批判了孔老二和儒家之徒，说他们用先王那一套陈旧的东西来治理当今的政治，就象“守株待兔”一样，愚蠢可笑。这个寓言说：从前宋国有一个人，正在耕田，忽然看见一只兔子逃跑时碰到枯树上碰死了，这个人把兔子拾了起来，非常高兴。从此，他丢下农具，活也不干了，整天守在枯树旁边，等待兔子再来碰死，期望拾到更多的死兔子。等了多少天，连兔子的影子也没见着。他的希望落空了。这件事在宋国成了一个笑话。韩非说：“如果现在要用古代先王的政策来统治当代的人民，都是象守株待兔一样的蠢事”。韩非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时代变了，制度也要跟着变，一味复古

是可笑的。他说：如果有人夏代还在架木为巢、钻木取火，一定会遭到鲧、禹嘲笑的。到了殷、周时代，如果有人用远古的办法决河排水，就会受到汤、武的嘲笑。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如果还是念念不忘尧、舜、禹、汤，一心要回到古代去，一定会遭到新时代的嘲笑。这不是因为别的，是由于历史向前发展了，办法也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今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实现统一。韩非厚今薄古，批判了儒家“法先王”的复古主义思想，反映着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保守与革新、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儒家要开历史倒车，韩非则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和进取精神。

韩非在批判儒家复古主义的同时，进一步揭露了儒家“仁政”的本质，在《五蠹》篇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鲁国一个人跟着鲁君出去作战，在三次战斗中他三次当了逃兵。孔老二问他为啥要逃跑，那人回答说：“我家里有年老的父亲，我战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孔老二认为这个人是个孝子，可以把他推举上去做官。韩非批驳说：这样讲“仁义”、“孝道”，就没有人为国家打仗了。韩非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法治路线，通过革命暴力去镇压奴隶主残余势力，国家才能强盛，实现统一。他坚决反对孔老二的“仁义”、“孝道”，认为在战国这样一个“大争之世”，各种势力生死搏斗的时代，只有强化地主阶级专政，才能完成建立地主阶级的一统天下的任务。韩非总结了以前法家的各派理论和实践，提出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什

什么叫法？就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令制度。什么叫术？是指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国君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手段。什么叫势？就是君王统治的地位和权力。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他说：国家有法、术，就象衣服和食物对于人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一样。还说：有法与术，没有势还不行，国家好比人君的车子，势好比马，术就好比赶车的技术，国君有车无马（势），车子就不能转动，有车有马，国君没有赶车的技术去驾驭，国家就仍避免不了祸乱。因此韩非主张国君必须把法、术、势三者结合并用，才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管理好国家。韩非要君主正确运用法、术、势的同时，必须重视用事实来验照群臣言行，注意从基层中提拔有经验的人作官。韩非的这个理论是对世袭的分封制的彻底否定，为地主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提供了理论武器。但是，这些都是为地主阶级的专政服务的，因此，在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同时，也有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一面。

韩非和他的老师荀况一样，是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者，他坚决反对孔孟的天命观。认为：天有天的自然运行规律，人有人掌握自己的生存能力。如果人要不打破对天的迷信，认识它的规律，虽有十个象尧那样高明的圣人，也不能在十冬腊月里使庄稼长出一个谷穗来。韩非因此得出结论：什么“天”呀，“地”呀，它是没有思想意志的，对任何人也不

亲近，也不疏远。他主张在天和人的关系上，人应该主动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受自然限制。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时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后，大为赞赏说：“这真是部好书。我若能和这位作者见一面，也不枉活一辈子了。”秦始皇采用了韩非等法家思想，任用李斯等人，坚决镇压了吕不韦复辟集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始皇统一中国

秦始皇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封建大一统的第一个皇帝。他所以能对历史作出积极的贡献，就是因为他坚决执行了法家进步、统一的正确路线。秦始皇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法家路线实践者，是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曾被后世的法家推崇为“千古一帝”。

(一)

公元前二三八年，秦王嬴政已经二十二岁了。按秦国制度规定，国王到了二十二岁，经过加冕典礼，就可以亲自掌握政权。这年九月，秦王嬴政来到了离咸阳不远的蕲（qí 音其）年宫，举行加冕典礼。就在这时，丞相吕不韦的爪牙、太后的亲信嫪毐（lào ǎi 音涝矮）盗走了国王和太后的御玺，发兵叛乱，向蕲年宫进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年轻的国王嬴政，却沉着果断，立即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军平叛。昌平君、昌文君带领的士卒，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在咸阳和嫪毐的叛军展开了血战，把叛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嫪毐乘乱逃走。秦王嬴政下令，能活捉嫪毐的，赏钱百万；能杀死嫪毐的，赏钱五十万。很短时间，就把嫪毐一

伙全部捉拿归案。嫪毐等二十个首恶分子，被判处死刑，他的党羽被免除爵位而流放到房陵（今湖北房县）的共有四千多家。叛乱被平息了。

嫪毐为什么要在秦王嬴政举行加冕礼时反叛呢？这要从丞相吕不韦说起。

吕不韦原来是阳翟的一个大奴隶主大商人，也是个政治投机商。他在赵国做生意的时候，遇到了在这里当人质的一个秦国公子，名叫异人。一见异人，吕不韦心中大喜，不由得冲口而出地说：“这真是‘奇货可居’啊！”于是他主动登门拜访，并把自己的小老婆赵姬送给了异人。他又到秦国四处活动，终于使异人回国后当了国王，这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就这样成了庄襄王的“功臣”，当了宰相，掌握了秦国的大权。秦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死了，嬴政继王位时才十三岁，吕不韦不仅继续当丞相，还成了秦王嬴政的“仲父”，权势更大了。

这个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大奴隶主吕不韦，掌握了大权后，极力进行复辟奴隶制的阴谋活动。他搜罗了三千个门客，为他炮制了一部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吕氏春秋》。他打着“杂家”旗号，好象各家各派的观点都搜罗进去了，实际上里边尽是些孔孟的“仁”呀、“义”呀的破烂货。他利用《吕氏春秋》鼓吹反动的儒家思想，攻击主张社会变革、维护新兴封建制度的法家思想，主张分封割据，为复辟奴隶制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次，吕不韦还把他的《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城门楼

上，上面随着挂了千两黄金。他公开宣布：如有能增加或减掉一个字的，就可以领取千金重赏。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用权势压人，妄想用千金不易来表示他的奴隶主思想应成为秦国的金科玉律，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秦封建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吕不韦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复辟迷梦，还让嫪毐装扮成宦官，勾结太后（赵姬），在太后支持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阴谋复辟的反动集团。

时间真快啊！秦王嬴政从十三岁即位，一转眼就是九年，已到二十二岁亲自掌握政权的年龄了。但是吕不韦要在秦国复辟奴隶制的美梦，还没有实现；如果秦王嬴政举行过加冕礼，他的摄政大权就要被剥夺，这样一切不都落空了吗？于是吕不韦就指示嫪毐趁秦王嬴政举行加冕礼时发动叛乱。

嫪毐叛军在咸阳集结完毕，老奸巨猾的吕不韦，满以为政变有把握了，正躲在后台等待“捷报”呢！谁知听到的却是嫪毐惨败的消息。事情真相大白，秦王嬴政先撤了吕不韦的宰相职务，把他赶到洛阳。吕不韦贼心不死，仍然阴谋反叛，结果被秦王嬴政发现。吕不韦畏罪自杀，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吕不韦的未遂政变，使秦王嬴政经受了第一次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严重考验。经过斗争，秦国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更加巩固了，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为秦的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二)

在中国历史上，一讲到秦始皇，便要提到李斯。秦始皇在政治上的功勋是和李斯分不开的。李斯帮助秦始皇干了一番统一中国的大事业，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贡献的。

李斯（？——公元前二〇八年）是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青年时代在乡里做小官，后来在法家荀况那里读书，和韩非同学。他看见楚国的政治腐败，便来到秦国。他到秦国的时候，正是秦国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的时候。李斯见到秦王嬴政，就大讲秦国的大好形势，劝他抓紧时机，消灭诸侯割据势力，早日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这一番话深得秦王嬴政的赞赏，被任命为长史（丞相的助理），积极从事统一六国的事业。

秦王嬴政清除了吕、嫪阴谋复辟集团不久，秦国的旧贵族又发起了一个驱逐六国人在秦当官的“逐客”运动，妄图把法家李斯等赶走。李斯及时识破了奴隶主旧贵族煽动秦王嬴政下《逐客令》的阴谋。因为到秦国来的六国人，多半是执行法家路线，对秦国抱有希望，帮助秦国统一的人。旧贵族要秦王嬴政驱逐这些人，就是要在秦国取消法家的正确路线，为奴隶主贵族复辟铺平道路。于是李斯就给秦王嬴政写了一封《谏逐客书》，揭露旧贵族的阴谋。李斯从秦穆公用由余、百里奚、蹇叔等人征服二十个诸侯国，称霸西方，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家富强，以及秦昭王打击旧贵族，

使秦国坚持了商鞅变法路线，在统一的路上又前进一步的发展历史，说明秦王嬴政下《逐客令》就是孤立自己，帮助敌国，使六国的人都来反秦，这就等于向敌人提供军队，向强盗输送粮食，其结果必然造成内部空虚，外部树敌，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他建议秦始皇“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在有利于统一事业的前提下用人。李斯这一席话讲得很有道理。秦王嬴政在读到李斯的《谏逐客书》后，当机立断，取消了《逐客令》，并且以李斯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以魏国人缭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组成了一个以法家为主的新的领导核心。

秦王嬴政重用法家人物，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短短的十年内，用强大的政治攻势，粉碎了六国诸侯的“合纵”政策，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公元前二三〇年，首先灭韩，然后北灭赵、燕、魏三国，南灭楚，公元前二二一年南北会师，一举灭齐，统一了中国。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来诸侯割据、战争连绵不断的局面。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胜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

（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和“分土分侯”制，采用了郡县制。军政大权和主要官吏的任免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一项符合历史潮流的、影响深远的政治改革。

为了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又进一步改革旧的经济和文化制度。公元前二一六年，他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让老百姓自报占田数目，只要按亩纳税，就可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紧接着，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车马大道），统一车轨，开凿河渠，密切了全国各地的交通联系。又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制定了规范化的文字，使得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法令、制度都统一起来，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秦始皇在实现以上各项重大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改革与反改革，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旧贵族虽然被打倒了，可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那些代表没落贵族利益的反动知识分子，自以为在政治界和思想界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更是利用各种时机，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三十四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文武官员。博士（主要是反动儒生）七十人也参加了宴会。这些儒生们在宴会上攻击当时的政治制度，公开叫嚣要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一个热闹的宴会，最后竟成了儒法斗争的战场。

仆射（音仆夜，秦的一种官名）周青臣，在宴会上满腔

热情地歌颂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巨大功绩。他说：“过去秦国土地不过千里；赖皇帝英明，平定海内，统一中国，把诸侯国改为郡县，人人得到安乐，免除了割据战争的痛苦。这样的制度可以流传万世。”秦始皇听了这些赞扬统一，赞扬郡县制，赞扬中央集权的话，非常高兴。那些坚持法治的文武官员们也都点头称是。而那些反对秦王朝的儒生们却十分恼火，他们早已按捺不住了。周青臣的话音刚落，博士淳于越就跳将出来，指桑骂槐，借攻击周青臣，把矛头指向秦始皇。胡说什么：“我听说，殷周两代统治了一千多年，都是分封子弟功臣，帮助国王进行统治。当今皇帝统一中国，而子弟却都是平民，一旦国家发生变故，叫谁来帮忙呢？凡事不效法古代而能统治长久的，我没有听说过。”淳于越还挑拨说：“周青臣的话是当面阿谀奉承，企图加重皇帝的罪过，这可不是忠臣啊！”

当时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听了淳于越的一派狂言，立即挺身而出，揭露那班披着博士外衣的儒生们的阴谋诡计，严厉驳斥了儒家“师古”、“复古”的反动主张。他说：

“五帝、三代治理国家的办法都不一样，但都达到了治理国家的目的，这不是他们故意唱反调，而是因为时代不同的缘故。现在皇帝创立统一大业，建立了万世的功劳，这本来就不是那些愚儒们所能理解的……。当今天下统一，中央发布法令，老百姓应当发展生产，读书的应当学习法令，可是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東西而去学习老古董，以古非今，造谣惑众。他们结党营私，反对政府的法令，应当坚决禁止他们的

破坏活动。”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和禁止“私学”，对儒生们利用文化教育阵地进行复辟活动，予以严厉镇压。除保留秦国的历史、有关的法家著作以及医书、农书、兵书等书籍外，儒家书籍统统没收烧毁。国家的博士们可以留点儒书作为批判研究的反面材料。令下之日，有敢散布儒家诗书的杀头；以古非今的灭全族；官吏知道而不检举的同罪；三十天内不烧的，罚服劳役。同时，禁止私学，有想学习的，以官吏为老师。秦始皇在李斯的建议书上，大笔一挥，写了一个“可”字，令行全国，立即照办。秦始皇发动的这场焚书运动，像风卷残云，什么孔老二的变天账《春秋》，什么歌颂奴隶主分封制的《尚书》，等等，全部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法家各种理论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军事著作如《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吴起兵法》等等，畅行全国。这是秦始皇在粉碎了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丞相王绾主张的“请立诸子”的分封倒退路线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使刚刚建立不久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得到巩固。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二年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们又公开跳出来，疯狂地反对封建制度。这就迫使秦始皇下决心对这些“颂法孔子”的反动儒生采取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他下令逮捕了卢生、侯生，经过审讯，揭发出他们大量的破坏活动。秦始皇把以古非今，情节严重的四百六十个儒生在咸阳坑杀。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焚书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对奴隶主阶级的

专政，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秦始皇、李斯等总结了秦王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里两个阶级反复斗争的经验后采取的革命行动。它是法家进步的政治思想路线的一次巨大胜利，也是对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总结。但是，历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到朱熹，从刘少奇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大肆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政”，是“毁灭文化”，咒骂秦始皇是“暴君”，等等。这完全是别有用心恶毒攻击和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叛徒、卖国贼林彪，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充分暴露了他尊儒反法，叛党卖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和罪恶目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穿批透林彪攻击秦始皇的险恶用心，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秦始皇坚决实践了法家的正确路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对促进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秦始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不可避免地有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完成封建大一统的事业，虽然客观上符合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但他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就必然要加重剥削、压迫人民，甚至为了他个人生前死后的享受，大兴土木，耗费资财，加重人民的负担。另外，在镇压反革命复辟势力方面，尽管焚书坑儒是坚决的，但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也有妥协的一面，甚至对赵

高这样的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也缺乏警惕，长期容忍他留在身边，以致使其最后能够篡权复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承秦制刘邦建汉

秦始皇统一中国，进一步扫荡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秦王朝建立不久，由于赵高篡权，改变了秦始皇执政时期的正确路线，秦二世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使在秦始皇执政的末期已经存在的尖锐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刘邦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之一。陈胜、吴广失败后，刘邦继续领导农民军，最终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汉王朝。刘邦是个大法家。他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极为赞赏，曾说：“大丈夫应当象秦始皇这个样子！”他坚持由秦始皇开创的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把中国的封建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刘邦（公元前二五六年——前一九五年），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出身农民，做过秦的亭长，后来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成为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陈胜、吴广牺牲后，革命形势危急，在这一关键时刻，各路起义军于公元前二〇八年九月在彭城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入关灭秦，一路由刘邦率领，经河南攻关中，一路由项羽率领，经河北攻咸阳。而且规定：谁先入关，就当关中王，以号令天

下。刘邦忠实地执行彭城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西攻洛阳，绕道武关，一路上争取地方合作，并承认和维护郡县制，得到了地方上的支持，很快攻下咸阳。刘邦进关后，申明军纪，全部废除了赵高的苛法，又约法三章：杀人者判死刑，伤人和抢东西的要治罪。约法三章，是刘邦的政治宣言书，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财产不可侵犯，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人民的欢迎。起义军进入咸阳后，有人产生了和平享乐思想，大将樊哙等人及时向刘邦提出：胜利刚刚开始，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建议刘邦退出咸阳。刘邦从全局出发立即接受这个建议。除了同意萧何把秦政府的档案、文件取出来，以备将来建立政权参考之外，还把秦的宫殿、仓库全部封闭起来，然后撤出咸阳，屯军霸上，等待项羽进关共商大事。

项羽（公元前二三二年——前二〇二年），下相（今江苏宿迁县）人，是一个没落贵族子弟。陈胜起义后，项羽也打起反秦旗号，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参加起义。他是一个野心家，入关后便推翻了起义军先入咸阳为关中王的决议，一心要消灭刘邦，独吞胜利果实。他在新丰鸿门设宴，名义上是约请刘邦共商大事，实际上是要在会上除掉刘邦。过去有一句话，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的就是项羽想叫项庄以舞剑为名，要把刘邦杀死在宴会上。结果由于项伯、张良、樊哙等人的救护，刘邦才得以脱险。

项羽在“鸿门宴”后，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意孤行，推行了一条分裂、倒退路线，他宣布废除秦的郡县制，

一下子就封了十八个王。刘邦被封为汉王（都南郑），被赶入巴蜀。项羽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并把关中分成三个王国，封被关中人民“恨入骨髓”的、镇压农民起义的章邯等三个秦朝降将为王，企图以此堵住刘邦的出路，把刘邦困在汉中。项羽对秦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怀有刻骨的仇恨，他对秦王朝首都咸阳来了一次血腥的大屠杀，然后又放一把火，把秦的宫室、府库等全部烧光，火三月不灭。秦的资财也被掠夺一空。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项羽这个奴隶主贵族的残暴本性。

从刘邦、项羽入关前后的作为来看，刘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坚决执行法家路线，主张统一，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上，坚持分裂，执行一条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两种对立的路线是不能并存的，是互相斗争的。斗争不断发展，终于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项羽恢复了分封制，立刻就又出现了互相攻杀的混战局面。项羽分封刚完毕，就同山东的田荣打了起来。刘邦趁机发动了统一战争，出汉中，占关中，然后直下韩、魏，一直打到项羽的老窝彭城。不久，项羽反攻，刘邦败退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对峙。过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楚汉相争，鸿沟为界”，说的就是这件事。

楚汉战争开始，项羽拥兵四十万，占有九郡地方，兵强地广；刘邦的兵力不过十万，据三郡地方，地少势弱。在这种形势下，刘邦坚持前进、坚持统一，与项羽斗路线、斗政治、斗策略，时机不成熟就不在军事上进行决战；而项羽则

推行复辟倒退路线，飞扬跋扈，迷信军事上的优势，东闯西杀。结果，经过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刘邦愈战愈强，项羽每况愈下，最后，被迫与刘邦讲和，要以荥阳的鸿沟为界，搞“西汉东楚”的割据局面。但是，刘邦并没有停止进攻，而是联合韩信、彭越等，率三十万大军，直追项羽，并把仅剩下十万军队的项羽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刘邦为了迷惑项羽，使汉军尽唱楚歌。项羽听到楚歌四起，以为楚地已都被汉军占领，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但是，直到这时，他还不承认他的失败是由于倒行逆施、失道寡助的结果。他在垓下突围前演了一场“别姬”的丑剧，后来被一些儒生借题发挥，编成戏剧《霸王别姬》，对项羽和虞姬这一对“英雄美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与赞赏。编造一出戏怎么就能使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变成真正的英雄呢？项羽在“别姬”之后，就进行突围。到了乌江，前有大江阻挡，后有汉军追击，进退无路，拔剑自刎，结束了他复辟倒退的一生。

刘邦消灭了项羽之后，建立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的汉王朝。但是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并未结束。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为争取一些军事集团的支持，不得不分封韩信、彭越等诸侯王。汉王朝刚刚建立，这些诸侯王便蓄谋反叛，有的甚至勾结匈奴奴隶主贵族，里应外合，大搞颠覆活动。刘邦和吕后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彻底粉碎了六国旧贵族残余势力的反扑。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是楚汉战争反对项羽复辟势力的继续，是坚持前进、坚持统一的斗争，符合历

史的发展趋势。

公元前一九五年十月，刘邦平息了淮南王黥布的叛乱后，路过沛县，凯旋归乡，受到了乡亲们热情接待。刘邦豪情满怀，组织了一百二十几人的儿童合唱队，他亲自击筑（古乐器），唱了一首气势磅礴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歌》生动地总结了刘邦一生的战斗生活，歌颂了农民战争，歌颂了新的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诞生。新的中央政权建立了，还需要得到勇猛的将士去守卫它。

汉朝建立后，是废弃秦制，还是承袭秦制，这是当时儒家斗争的焦点。刘邦“不好儒”，曾经说道：“要打天下，就不能用腐儒。”他对儒生非常厌恶，甚至把儒生的帽子当便壶。酈食其（读丽异及）第一次见刘邦时，刘邦正在洗脚，问是什么人，回答说：“穿着一身儒服，戴着高帽子，看样子像个大儒。”刘邦就很不耐烦地说：“我现在正忙着国家大事，没时间见儒生！”酈食其听说刘邦不见，就对回事的人圆瞪双眼，手里按着宝剑大声喊道：“什么儒生？！我是高阳酒徒，快去回报！”回事的人又对刘邦说：“不是儒生，是一位壮士。”刘邦一听说是壮士，连鞋都顾不得穿，就把酈食其迎接进去了。

刘邦建汉后，承袭秦制，叫萧何根据秦的法律，制定了《汉律》九章，基本上保存了秦律面貌。在政治制度方面，

中央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下设三公九卿，分掌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地方政府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统一由中央任免。刘邦在用人上也是坚持法家路线，按功劳的大小封给爵位，按能力大小授予官位，不计较资历和门第，专门任用知法明度，能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人。如萧何、曹参原来都是小吏，陈平出身贫贱，樊哙是以屠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娄敬是推车的，都成了刘邦建汉的得力助手。

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和奴隶主残余势力，刘邦下令把六国复辟势力和豪强十多万人迁到咸阳附近，以加强控制。刘邦又推行“以有功劳赏田宅”的法令，把大量的田地和房屋奖给有功的军官和士兵，以扩大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他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开荒，发展农业生产；宣布凡因饥饿卖身为奴的人一律解放为农民；对工商奴隶主严格限制，不许他们乘车骑马，不许携带武器，不许做官，不许穿丝织的衣裳，还要加倍收他们的人头税。这些都是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促进封建经济发展的有力措施。

刘邦打败了以项羽为首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重新统一了天下；在建立汉政权的过程中，承袭秦制，重新建立了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刘邦是继承秦制的第一个皇帝，他在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的事业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是，刘邦继承秦制也有他的不彻底性。秦始皇连一个封国也没有建立，而刘邦在平定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却错误地总结了历史经验，大封同姓诸侯王，这就给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留下了隐患。

卫汉业吕后除奸

吕后（公元前二四一年——前一八〇年）名雉，字娥姁（xǔ 音许），单父（山东单县）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女法家之一。她为人刚毅，处事果断，积极帮助刘邦实行法治，“佐高祖定天下”。刘邦建汉后，吕雉当了皇后，历史上都叫她吕后。刘邦死后，她的儿子刘盈继位为惠帝。由于惠帝年少且又“仁弱”，吕太后掌握实权，后惠帝死，吕太后即临朝称制，亲自当政。在这十数年间，她坚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吕雉的一生，对汉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有着很大的贡献。

刘邦早年在泗水当亭长时，吕雉在家参加家务和田间劳动。刘邦在芒砀山（河南永城县北）酝酿起义时，吕雉担任联络工作。刘邦参加起义后以及楚汉战争期间，吕雉随刘邦转战南北，饱经风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楚汉战争后期，吕后和萧何镇守关中，把关中建设成为可靠的后方，把兵员和物资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对刘邦战胜项羽作了有力的支援。

在刘邦建立汉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之后，国内还有齐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韩王信等七个王国。这些地方王国表面上与刘邦是君臣关系，实际上都

是敌国。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野心家，是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保护者。在刘邦建汉不久，燕王臧荼就起兵叛乱。刘邦亲自带兵征讨，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平定了臧荼。接着，韩信、彭越等人也蠢蠢欲动。韩王信与匈奴奴隶主联兵入侵，给汉北边造成极大威胁。对于这些坚持分封割据的复辟势力，是坚决镇压，还是纵容姑息；是坚持前进、统一，还是倒退、分裂，这是关系到西汉中央政权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当时儒法斗争的焦点。吕雉坚定地站在刘邦坚持进步、统一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地镇压了韩信、彭越等分裂、复辟势力。

韩信，淮阴人，年青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秦末农民大起义，他抱着个人野心钻进了起义队伍，先是追随项羽，后又投靠刘邦。起初他认为刘邦不重用他，又曾从刘邦军中逃跑。过去有个旧戏，叫《萧何月下追韩信》，说的就是这个事。以后，刘邦任命韩信为大将军，执掌兵权。但在四、五年的楚汉战争中，他曾多次不择手段地向刘邦邀功讨封，破坏刘邦的作战计划。如公元前二〇三年，刘邦、项羽在荥阳相持，当时韩信已由河北进入山东，占领三齐。按刘邦原来的计划，韩信应从山东往西打，抄项羽的后路。但韩信按兵不动，反而派使臣去威胁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迫于形势，只好承认他的齐王封号。这件事情完全暴露了韩信这个野心家的面目。刘邦消灭项羽后，为了防止韩信在山东叛乱，便把韩信调离山东，改封为楚王。韩信到楚后，继续招降纳叛，搜罗项羽的残兵败将，密谋叛乱。在这样情况下，

刘邦才不得不以出游云梦泽的名义，乘韩信到边境来迎接时，把他逮住，降为淮阴侯。

刘邦对韩信捉而不杀，并没有使韩信悔悟，相反他更怀恨在心，成天在家装病，准备待机而动。公元前一九七年，阳夏侯陈豨(xī 音希)为相国，上任前特意去拜访韩信。两个野心家气味相投，打得火热。韩信一边仰天长叹，一面怂恿陈豨说：“你所处的代地，是兵力最强的地方。现在皇帝还信任你，即使有人说你反，皇帝也可能不相信；但是说的人多了，皇帝不但会恼火，而且还会亲自带兵去讨伐你，那时我可以当你的内应。这样，天下是可以夺到手的。”陈豨完全同意韩信的话，于是他们就秘密订了一个里应外合的政变计划。陈豨举兵叛乱，刘邦决定亲自率军平叛。为了防止韩信叛变，想让韩信随军出征，但韩信因与陈豨先有密约，故意装病不去。刘邦一走，韩信马上派人与陈豨联系，同时调兵遣将，甚至假传“圣旨”，释放犯人组织叛军，准备发动武装政变。机警沉着的吕后，在刘邦出征后，密切注视着韩信的动向，发现韩信准备发动叛变时，便当机立断，与相国萧何秘密商量，决定生擒韩信。一天，韩信正在焦急烦躁地等待着陈豨的回信，忽然萧何出现在他的面前。萧何对他说：

“前方传来了捷报，皇帝已杀了陈豨，平定了叛乱，满朝文武都进宫去祝贺，咱们也一块去吧！”韩信一听，脸都吓白了。他知道大势已去，本想装病不去，又怕露了马脚，只好随着萧何一同进宫。韩信一进宫门，马上就被武士捆了起来，吕后一声令下，斩了这个一贯制造分裂，蓄意颠覆统一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复辟狂。

韩信的政变阴谋刚被粉碎，又揭露出梁王彭越的叛乱阴谋。刘邦在彭越“反情已露”的情况下，立即逮捕了他，将他削职为民，流放到蜀郡青衣（今四川雅安）。当彭越被押送到华县时，正遇到从长安去洛阳视察的吕后。彭越一见吕后，就痛哭流涕，求吕后替他说情，要求放他回老家昌邑。实际这是彭越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深谋远虑而又干练的吕后，识破了他的阴谋，将计就计，把彭越带回洛阳。吕后见到刘邦就说：“你把彭越这样的人放到四川去，不是放虎归山吗？不如马上杀掉，以绝后患。”刘邦接受了吕后的建议，把这个制造分裂的野心家彭越判处了死刑。

到公元前一九五年初，异姓诸王的割据势力已基本消除。但刘邦在平定异姓诸王的过程中，错误地总结了经验，又分封了刘姓九王。刘邦认为，刘姓子弟为王，就可以起到维护和巩固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作用。实际上这些刘姓王和异姓王一样，都是割据势力。分封制本身就给汉统一中央集权制地主政权留下了后患。

同年四月，刘邦死，惠帝刘盈即位。在当时，北部有匈奴的侵扰，内部有封建割据势力的威胁，为长期的战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还没有恢复。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惠帝刘盈能不能支撑住局面，吕后经过认真考虑，不能放心。因此，在刘邦临死前，吕后就向刘邦征求了意见，为惠帝安排了得力的助手。吕后问刘邦，在萧何死后，谁可当丞相？刘邦说，曹参可以代替；曹参死后，可让王陵继任，并让陈平帮

助他。吕后果然按照刘邦的意见，让曹参、王陵、陈平相继当丞相，保证了刘邦时制定的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但是在刘邦、萧何死后，在汉初的政治形势中，真正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法家路线的，还是女政治家、女法家吕后。

历史上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说的是在曹参继任萧何的丞相职务后，一切制度办法都不改变，完全按照萧何时的规矩办事。有人看到曹参当了丞相，也没有搞出个新名堂来，就想去劝劝曹参，但曹参只和他们在一起喝酒，不和他们谈朝廷政事。惠帝对刘邦的法家路线本来就有抵触，也想让曹参改换个办法，就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kū 音枯）去问，曹参一听就发了火，打了他儿子二百板子，并对他儿子说：“国家大事，并不是你所应当问的。”惠帝知道曹窋挨打，只好自己去问曹参。曹参先不作正面答复，反问惠帝：“陛下你自己考虑一下，你的本事比起高帝（指刘邦）来谁的大？”惠帝答道：“我哪能和先帝比呢？”曹参又问：“陛下，你看我比萧何谁能干？”惠帝说：“你似乎也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帝、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定得很明确，我们只要能忠于职守，按他们的制度办事，而不发生过失，不就可以了么？”惠帝完全同意了曹参的意见，说：“好！”以后惠帝也就不再想新点子了。对于“萧规曹随”的故事，我们必须这样看：当时惠帝所以能够“垂拱”（不管事），曹参所以能“守职”（按章办事），绝对不是说汉初法家政治路线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关键在于吕后直接担负着国家重任，是由于吕后掌权，

才保证了汉初的法家路线得以继续贯彻执行。

吕后在用人方面，坚持“用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吕后按照刘邦的意见，让陈平当了丞相。但吕后的妹妹吕嬃与陈平有私怨，经常在吕后面前说陈平的坏话。吕后并不偏听偏信，通过调查，认清陈平没有问题，就当着吕嬃的面对陈平说：“你自管照常办事，不要怕吕嬃在旁多口，我相信你，不信吕嬃。”这说明吕后是“知人善用，用人不疑”，能够使所属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吕后还坚持法家的论功行赏的原则，有功者，一定要赏；有过者，虽亲必罚。吕后的侄孙吕王吕嘉，骄横不遵守法治，吕后立即废掉了他的王位。吕后执政后，继续采取加强统一中央集权制措施，处死了几次想夺权篡位的赵王如意（后台是其母戚夫人）；迫使齐王刘肥让出一郡。对赵王刘友、梁王刘恢、燕王刘建也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些措施对维护汉初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吕后与刘邦一样，也错误地总结了经验，认为封吕姓为王，就可以用血统关系帮助她维护中央集权制。这说明了吕雉这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同样存在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在经济上吕后仍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了农业经济。据史书记载：吕后当政时，政府的开支和收入比较有计划，能够根据官吏的俸禄、政府的用度来向人民征税，对田租赋税都有所减轻。这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

对匈奴问题上，吕后一方面力图保持与匈奴的正常交往，同时又加紧战备工作。鉴于匈奴对首都的威胁，吕后执

政期间曾三次修筑长安城，调动骑兵加强边防，并且在边境屯田，以防备匈奴奴隶主的入侵。

综观吕后的一生，从“佐高祖定天下”，到汉建国后，协助刘邦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以及刘邦死后的十五年中，她又直接掌权，忠实执行了刘邦制定的路线，反对分裂，反对复辟，为维护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切都说明，吕后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女法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吕后要不是有独到的胆略，不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要想突破重男轻女的封建枷锁，在政治上站住脚，那是不可能的。复辟狂、野心家韩信、彭越之流，都是极端轻视吕后的。韩信在中计落网、被推上长乐宫的断头台的时候，还无耻地叫嚣什么，想不到他竟“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韩信的狂吠，反映了轻视妇女而又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的可耻哀鸣。以后，历史上的尊儒反法派，也都从轻视妇女，反对统一、进步的角度出发，对吕后大加污蔑，胡说什么吕后对割据势力的打击是“狠毒残忍”、“屠戮功臣”，等等。这同历代反动派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是为被镇压的反动派鸣不平、唱挽歌。这正说明吕后镇压割据势力是完全正确的。

巩固统一文景削藩

汉朝在吕后之后，是文帝、景帝执政时期。文、景二帝都是法家人物，在他们执政期间，继续执行刘邦的法家路线，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文帝刘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五七年在位），是刘邦的儿子。他崇尚法家，是刘邦法治路线的继承者。他认为法治是管理好国家的最正确的办法。在政治上他强调用法治来巩固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在经济上他坚持法家的“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奖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坚持不许商人当官的禁令。

景帝刘启（公元前一五六年——前一四一年在位），是文帝刘恒的儿子，法家路线的维护者、执行者，他强调以法治国的重要性，曾说：“设立法令、尺度和量器，就是为了禁暴止邪。”刘启坚持商鞅、李斯的教育政策，即愿意念书的人，到国家办的学校去学习，以官吏为老师，这是使法家的教育为法家的政治服务的有效措施。

文景时期，面临着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侵扰的威胁。文景二帝采取了与吕后时基本相同的政策，即一方面尽量保持与匈奴的正常交往，同时加紧战备，如改换了边防军的轮换制度，募兵、移民和屯田筑城，增加粮食储备等措施。这些

措施对于阻止匈奴的侵扰，保护汉族农业居民区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文景时期，最严重的问题是刘姓诸侯王割据势力和汉朝中央政权的尖锐矛盾。这些诸侯王都占有很大的地盘，如齐悼惠王在山东一带的封地就有七十余城，楚元王在江淮间有四十城，吴王濞（bì音必）在长江下游有五十余城，再加上其他诸王的封地，几乎控制了汉王朝半数左右的山河。他们在各自封国内称王称霸，大兴礼乐，招募儒生，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武器，大搞分裂活动，反对中央；他们擅自征收赋税，摊派徭役；利用奴隶煮盐、铸造钱币；任意招收兵员，扩充军备，有的甚至勾结匈奴，阴谋推翻中央政权。这些刘姓诸侯王，实际上是新的复辟势力，代表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在文帝时，洛阳的青年政治家贾谊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尖锐地指出：

“汉中央和地方诸侯王的关系，就象一个人得了严重的浮肿病一样，小腿肿得差不多跟腰一样粗，一个手指头象大腿一样，如果不加紧解决，必然成为难治的病呀！”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其国小而无邪心”的建议，就是要把一个诸侯王国分建成几个小王国，使其国小力弱，就没有反抗中央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政权对全国的统治，就象一个人的身体能够指挥他的手臂，手臂能够指挥他的手指一样，得到应有的控制。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于公元前一六四年，把齐分为六个小国，又把淮南分为三个小国。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原来

的王国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对封建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景帝时代，晁错为御史大夫。他继承贾谊的思想，又进一步提出削藩的主张。

晁错（约公元前二〇〇年——前一五四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从小好读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书，有丰富的社会知识，对法家的思想很有研究。在文帝时，他当过太子（即景帝）家令，教给太子以法治天下的道理，被称为“智囊”。景帝即位后，他积极参与制定国家各项政策法规工作。他看见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严重地危害到中央政权，就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削藩就是要削掉那些地方诸侯王占有的藩属领地。他说：“长期以来，这些诸侯王目无中央，在地方联合反动的儒生，大搞复辟活动，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如果听任他们发展下去，那怎么能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呢？”晁错提醒景帝要特别注意吴王刘濞的动向，认为他是诸侯中势力最强，野心最大，随时都可能反叛的危险人物。在对诸侯王的势力进行分析之后，晁错指出：“今削他，他要反叛；不削他，也要反叛。削他，反叛可能快一些，但祸要小一些，不削他，反叛迟一些，但祸却会更大。”晁错的建议，得到景帝的欣赏和支持，于公元前一五四年就削去了楚元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的封地，同时并积极准备打击吴王刘濞。

晁错提出的削藩建议是一场社会变革，它必然要遭到各地诸侯王的反对。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分裂割据势力更是蠢蠢

欲动，图谋反叛。当时袁盎、申屠嘉和窦婴一批儒生，象苍蝇逐臭一样，簇拥到吴王刘濞身边，特别是袁盎这个腐儒，更是一个可耻的帮凶。申屠嘉是文帝末年、景帝初年的丞相。袁盎、窦婴都在吴王刘濞的封国当过丞相。他们臭味相投，一向狼狈为奸，来往极为密切。后来袁盎玩弄两面派手法，混到中央，成了吴王刘濞的代言人。他花言巧语在中央到处制造舆论，欺骗景帝，为吴王刘濞评功摆好。而对晁错要求改革法令，削掉诸侯王割据势力以求统一的正确主张恨得要死。他竭力鼓吹分封制，要求恢复诸侯王原来的封地，与晁错的削藩主张大唱反调。当晁错的削藩政策正在全国大力推行的时候，袁盎、申屠嘉曾多次捏造罪状，陷害晁错，结果都被景帝识破，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维护中央集权制还是维持地方封国制的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尖锐、激烈。晁错在这场斗争中，意志坚定，坚决主张削掉各诸侯王的势力，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各诸侯王惊恐万状，他们大肆制造各种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对晁错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说晁错不怀好心，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妄图拔掉晁错这个“眼中钉”。晁错的父亲在家里听到这些消息，特地从遥远的家乡颖川赶到长安，对晁错说：“你打击诸侯王，使皇帝和他的兄弟、亲属疏远了，你自己也要受到人家的怨恨呀！甚至咱全家都要被你牵连，何必这样干呢？”对于父亲的劝告，晁错申之大义，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晁错说：“不这样干，中央集权制就不能巩固。”他父亲涕泪交流，接着又说：“姓刘的安定了，可

是咱姓晁的就危险了，我不忍看到全家遭祸！”回家后就自杀了。晁错不作孔老二的“孝悌”思想的俘虏，在景帝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削藩斗争。这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图谋叛乱的活动也越来越紧了。

公元前一五四年，景帝要削吴国的会稽（今江苏吴县）、豫章（今江西南昌）两郡。削地诏书刚到吴国，吴王濞就联合赵、楚、胶东、胶西、淄川、济南等六国，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意思是：请求杀掉晁错，以清除国君身边的坏人）”为名，调动二十多万兵力进行反叛。暗藏在中央的内奸袁盎，竭力掩盖吴王刘濞叛乱真象，并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心怀鬼胎地向景帝说：“吴王之所以要反，是因为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乱了刘家天下。他们是为了‘清君侧’，只要杀了晁错，他们就可以退兵了。”景帝误中袁盎的诡计，平叛的决心有了动摇，任命袁盎为太常（官名），秘密地去和吴王议和。袁盎等人秘谋策划，要杀害晁错以讨好吴王。一天，他们以朝见景帝为名，把晁错骗到宫门，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晁错被杀时，还穿着整整齐齐的官服。按汉王朝的规定，处死官吏，必须脱去官服才能行刑。他们杀害晁错时，连晁错身上的官服都顾不得脱去，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的虚弱与慌乱。

晁错被杀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没有停止叛乱，相反，他们更加放肆地勾结匈奴向梁（今河南睢县）进攻。这才使景帝清醒过来，又坚定了平叛的信心，立即命令周亚夫率兵镇压七国叛乱。周亚夫坚守昌邑（今山东

金乡)，断绝吴、楚粮道，以逸待劳。叛军粮草供应不上，兵士厌战。七国叛乱，仅用三个月就平定了。晁错虽然被害，然而代表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叛乱阴谋活动也受到了惩罚。刘濞的可耻下场深刻说明：在我国历史上，搞分裂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最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而要统一，不要分裂，要前进，不要倒退，这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儒家信徒如何变换手法，也永远阻挡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景帝镇压了七国叛乱之后，继续坚决推行晁错的削藩主张，取消诸侯王的政权、军权，把诸侯王的行政和官吏任免权统统收归中央，并削减诸侯王的官僚机构。各诸侯王国此后便名存实亡，给汉武帝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制打下了基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野心家奉为至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也妄图用“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达到他篡党篡政的目的，但是毛主席、党中央明察秋毫，及时地识破了林贼的阴谋诡计，使林彪和吴王刘濞一样，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强本弱枝武帝兴国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在武帝时期，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家思想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在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是吃不开的。据说董仲舒曾写了一部专门讲灾异与政治得失关系的“道术之书”，呈献给汉武帝。后来辽东高庙失火，董仲舒又大讲灾异，攻击汉武帝的法家路线，遭到了主父偃的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欺骗老百姓的书，汉武帝就把董仲舒交给狱吏进行审判。狱吏把董仲舒判处了死刑，只是由于汉武帝的赦免，董仲舒才没有被杀头。这件事说明在汉武帝时期，法家思想还占有统治地位。武帝赦免了董仲舒，并没有重用他，把他派到地方上去，实际上是对董仲舒的遗弃。

汉武帝执行的是法家路线，在内政问题上，主要是根据主父偃的意见，继续削弱地方封国势力。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施行“推恩令”的建议，以打破王国嫡长子继承王位的特权，而让王国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这样，在一个大王国的国王死后，就会分成几个小国。主父偃说：这种办法从表面上看是皇帝对诸侯儿子的普遍施恩，实际是分散了王国的力量，可达到削弱王国的目的。武帝接受了主父偃的建

议，向全国颁布了“推恩令”，从此王国越分越小，大的不过十数城，小的只有方圆几十里，而中央管辖的郡县日益扩大，割据的威胁就逐步消除了。

为了打击地方封建割据势力，武帝还颁布了“左官令”，规定：凡是在地方封国当官的人，都叫“左官”，以后再不能到中央任职，这样来控制地方地主集团和封建割据势力的勾结。

武帝还颁布了“酎（zhòu音宙）金律”，打击诸侯王。

“酎金”就是地方诸侯王每年按时向中央的太庙交纳一定量的黄金作祭酒。汉武帝规定：凡地方交来的酎金，份量不足，成色不好的，“王削县、侯免国”。武帝就用这个办法于公元前一一二年一次就取消了一〇六个侯国。武帝还把那些“兼并之家”、“乱众之民”迁到茂陵（陕西兴平县北），以割断豪强地主、奴隶主残余势力与地方割据势力的联系，“强本弱枝”，来巩固中央集权。

武帝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制是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的，其中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镇压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的叛乱。

淮南王刘安，是个野心家、复辟狂，也是吴楚七国之乱的漏网分子。在吴楚叛乱时，他已答应起兵响应，只是掌握兵权的淮南王相没有听他的话，阴谋才没有得逞。以后他隐蔽真相，在武帝面前大耍两面派，当着武帝的面经常说“陛下待我这样好，我真感激不尽”，背后又和他的弟弟衡山王刘赐结成死党，阴谋发动叛乱，夺取中央大权。

淮南王刘安为了复辟叛乱，还大造反革命舆论。他网罗了儒生、方士几千人，编写《淮南子》，打着杂家的幌子，贩卖“仁义”、“道德”一类孔家店中的破烂货，甚至公然提出了“存危国，继绝世”的反动口号。他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封建割据的王国，继封建诸侯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绝世，这实际就是搞复辟、搞倒退、搞分裂。

刘安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时，也加紧了叛乱的准备工作，招降纳叛，扩充军备，并加紧了与衡山王刘赐的勾结，甚至把当皇帝的玉玺、官吏的印章都准备好了。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即将登场的时候，被人告发。汉武帝当机立断，发来大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逮捕了淮南王刘安，并把参与刘安叛乱的党羽数万人判处死刑。一场威胁中央集权制的叛乱就这样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在汉武帝时代，执政前期，工商奴隶主还有很大势力，他们役使大批贫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资财甚至超过诸侯王。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结党营私，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

为了从经济上加强中央集权制，武帝任用法家桑弘羊管理经济，把冶铁、铸钱、煮盐、酿酒统统收归官营，并公布平准、均输政策，由国家控制物资调运，控制物价。对不法商人，还发布了“告缗（mín音民）令”，令商人、高利贷者自报财产，按财产多少征税；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偷税漏税者，没收全部资产，并以没收资产的一半赏给告发人。

“告缗令”一公布，群众纷纷检举告发，政府没收工商奴隶

主的财产物资，多以亿计，没收的奴隶成千成万，没收的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还没收了大量房屋。“告缗令”的公布与贯彻，给了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一次沉重的打击。

桑弘羊执行法家经济路线，打击工商业奴隶主反动势力，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和破坏。他们对桑弘羊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甚至把天旱不下雨，也说成是桑弘羊施行盐铁官营政策造成的恶果。钻进汉政府内部的畜牧奴隶主出身的卜式，咬牙切齿地叫骂：“除掉桑弘羊，天就下雨了”。要汉武帝杀掉桑弘羊。但汉武帝并没有听他的话，继续对敢于破坏盐铁官营的不法分子进行严厉的镇压，保证了桑弘羊法家经济路线的胜利执行。

汉武帝采取这些经济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加强了中央对财政经济的控制，做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富饶，强化了中央集权，使秦始皇以来建立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发展，这就为反击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我国古代无名诗人对塞外风光的描述。但是，就是这个水草丰盛、牛羊成群的塞北，在秦汉时代，却被匈奴奴隶主贵族蹂躏着。匈奴奴隶主贵族拥有几十万骑兵，经常对临近地区进行侵扰和掠夺。他们把汉族人民居住的先进农业地区当成一块肥肉，不断在秋高马肥的季节，发动侵扰，不断给汉族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另外，匈奴贵族入侵时，

还经常与汉的地方割据势力勾结，里应外合，给汉中央政府造成严重的威胁。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实质上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

到汉武帝时，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达到了极盛时期，政府有了进行反击战的雄厚的经济实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抓住了有利时机，及时地发动了对匈奴的长期反击战。经过公元前一二七年、前一二一年、前一一九年三次大的战役，基本上打垮了匈奴奴隶主反动势力，解除了匈奴造成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所以能取得辉煌的胜利，主要的的是由于这次战争是一次反入侵的正义战争，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汉武帝战略指挥的正确，也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作了全面部署。第一次大的战役主要是收复河南（黄河套以南）地，打击匈奴的主力，解除匈奴对首都长安的正面威胁。第二次大的战役是打击匈奴的右翼，占领河西走廊，并派张骞出使西域，增强内地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使匈奴陷于孤立。第三次大的战役，是扫荡匈奴的左翼，把匈奴赶到沙漠以北，使匈奴无力再发动对汉的进攻。这些战略部署说明汉武帝是一位具有很高军事指挥艺术和才能的统帅。

汉武帝对匈奴反击战的胜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方面要调动全国人力、物力，全力以赴对匈奴发动军事反击；一方面还要排除儒家妥协、投降、卖国路线的干扰。这就使

斗争更加复杂尖锐。

公元前一一九年，匈奴派来使者假意要求“和亲”，汉派使臣去交涉时，匈奴又扣住了汉的使者，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召开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儒家妥协投降路线的代表人物博士狄山，跳出来首先为“和亲”叫好。武帝问：“好在那里？”狄山就学着孔老二的腔调说：“兵是凶器，可不能乱动啊！文帝在北方加强边防，北方人都感到很苦；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天下人有几个月都感到寒心。现在陛下又兴兵打匈奴，造成国内空虚，边境大困，从这点来看，还是和亲为好。”狄山这番话表明，他不仅主张对匈奴妥协投降，而且也反对平定七国之乱，完全暴露出儒家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搞分裂割据的反动嘴脸。武帝听到狄山的议论后，就问张汤。张汤答复得很干脆，说狄山是“愚儒无知”。狄山听后，马上又对张汤进行恶毒攻击，他说：“我固然是愚忠，而张汤是‘诈忠’，他在审判淮南王、江都王谋反案件时，追根问底，陷害诸侯，挑拨离间，破坏皇帝骨肉关系，使地方诸王不安。这就是张汤的‘诈忠’。”武帝听到狄山为诸侯王叛乱翻案，对张汤无耻攻击，再也忍耐不住了，就直接了当地问狄山：“按照你的意见，让你去管理一个郡，你能使匈奴不入侵吗？”惯于说空话，言行不一的狄山，一听要让他去对付匈奴，就吓得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小声说：“不能。”武帝又问一句：“让你守一个县呢？”狄山还是说：“不能。”武帝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让你守个哨所呢？”狄山一听，知

道再说不能，武帝就要把他抓起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说：

“能！”武帝一听狄山说能，马上就把他派到一个临近匈奴的哨所上去，结果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个不主张用兵、专讲“仁义”的儒生狄山，就被匈奴砍了头。汉武帝让狄山这个儒生作了一番表演，又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员去教育了别人，从此以后，那些空喊“仁义”、反对用兵抗击匈奴的议论才平息下去。汉武帝斗狄山，是法家爱国抗战路线对儒家卖国投降路线的胜利。

汉武帝在用人方面也是执行的法家的“因能授官”的组织路线。他破格地任用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征匈奴的统帅），任用卫青的外甥、年青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骑兵总司令），担任抗击匈奴的重任，确实表现出汉武帝知人善用的特点。卫青、霍去病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霍去病在战争中，始终奋不顾身，勇冠三军，因此，十八岁被封冠军侯，二十二岁当了骑兵总司令，成为汉武帝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当汉武帝要给他修建宅第，表示尊崇时，他却说：“匈奴未灭，我怎能去为自己的家庭考虑？”卫青、霍去病对匈奴作战，坚决服从汉武帝的统一指挥，取得了这个战争的伟大胜利。

武帝治国执行的是进步的法家路线，因此在巩固统一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在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匈奴的战争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使汉朝国势达到了极盛时期。但是汉武帝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在

进行反击匈奴战争的同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大兴土木，动用和浪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

桑弘羊舌战群儒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二月间，朝廷在长安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这时，昭帝才十四岁，实权落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手里。霍光是个儒家，是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和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他极力改变武帝时的政治路线，经过几年准备，精心策划了这次盐铁会议。他以“问民间疾苦”为名，从全国各地挑选了六十多个儒家头子，即所谓“贤良”“文学”之士，用马车把他们拉到长安，参加会议，对法家发动突然袭击，妄图搞掉著名法家、御史大夫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

桑弘羊从十三岁起就跟汉武帝当侍从，在汉政府历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几十年，是武帝的一个得力助手。他积极协助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对内打击割据复辟势力，对外抵御匈奴奴隶主的入侵与掠夺，为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官铸钱币以及调整物价都是他提出的重要经济政策。霍光的党羽杜延年等以重新审查盐铁官营为名，恶毒攻击汉武帝的政治路线。一场斗争就这样开始了。在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盐铁官营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内容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论战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路线问题，是法家同儒家的一次决战。

会议一开始，那帮儒生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公开要求取消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一个儒生打出孔老二“仁”“义”的破旗指着桑弘羊说：“从前圣王进行统治，都是注重道德仁义，不重视财利，可是你在全国各地实行盐铁官营、钱由官铸，这种政府带头轻视‘礼义’而重视财利的做法，把社会风俗都弄坏了，国家怎能长久？还是去掉官营制度为好。”盐铁官营，酒类专卖，是汉武帝为巩固中央集权，解除匈奴的威胁，而实行的重要经济政策。正由于实行了这些政策，才得以给反击匈奴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儒生们恰要取消这些政策，其实质不正是妄图从此打开缺口，改变武帝的政治路线吗？

桑弘羊看透了贤良、文学这些儒生们反对盐铁官营、企图破坏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险恶用心，立即驳斥道：“匈奴背信弃义，屡次进行侵扰。我们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为了使国家财货增加，以筹划边防费用，决不能废。现在你们这些人想废除它，必然会造成国库空虚，军费缺乏，使保卫边塞的士兵受饥受寒，拿什么养活他们？”接着桑弘羊用大量事实反击了儒生们鼓吹“礼治”，反对“法治”，恶毒咒骂法家特别是商鞅的无耻谰言，指出：法既可以教化人民，又可以处理监督坏人。有法国家就治，无法国家就乱。他说：“从前秦用商鞅，实行变法，很快使秦国富强起来，统

一了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而孔孟之徒，开口禹汤，闭口文武，大谈仁义，鼓吹王道，结果是危不能安、乱不能治、到底没有能挽回奴隶制的灭亡，象你们说的仁义道德到底有什么用处？”

另一个儒生可着嗓门在那里嚷道：“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这是‘与民争利’呀！”他还无耻地大讲所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之类的“民间疾苦”，似乎他们真的不是为自己争利，而是在为民谋利了。

桑弘羊抓住他们口口声声为之争利的“民”，实际上是那些地方诸侯王和大工商业奴隶主这一实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桑弘羊说：“过去在文帝时，盐铁、铸钱掌握在富商豪强手里，地方诸侯王等垄断了资源，大量使用奴隶，破坏官府的经济，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实行盐铁官营，发展农业生产，使百姓避免饥饿，这怎么能说成是‘与民争利’？现在依了你们，废除盐铁官营，正好符合地方豪强的贪婪之心。他们就会结成私党，不听朝廷管制，农民的土地将很快被他们兼并光，分裂割据的局面很快就会重新出现。你们说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你们说的‘民’，是不是象吴王刘濞那样的‘民’呢？”这些话直驳得儒生们目瞪口呆，无言对答。

又一个儒生见势不妙，来了一个恶人先告状，胡说什么实行盐铁官营是重视商业（末），轻视农业（本），是本末颠倒！

“重本抑末”这是法家思想，儒生们为什么还利用这一点攻击法家呢？戳穿来说，他们要求的重农抑商，是要让国家不要过问商业，不经营盐铁，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让他们工商奴隶主去经营。桑弘羊抓住他们这个要害，阐明汉代的基本国策，他说：“盐铁官营的法令，讲得清清楚楚，冶铁铸造农器，便利发展农业，使百姓无饥寒之累。过去盐铁掌握在奴隶主大商人和豪强地主手里，他们煮盐、开矿，一家使用一千多个奴隶劳动，大发横财，兼并土地，压迫百姓。盐铁官营打击了他们，这正是‘建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正确措施！”桑弘羊一番话把儒生们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

在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盐铁会议上的那帮儒生们正是这样。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入侵的问题上，也大作文章，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一个儒生摇头晃脑地胡说：“善于克敌的不用打仗，善战的不必用兵，善用兵的不必讲究阵法，只要朝廷里讲仁义，就可以使敌人不战而退。当国王的只要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在边防上用那么多费用干啥？”另一个儒生还再次抬出儒家的祖师爷的圣经，教训道：“孔夫子说过：远人不服，可以修文德请他们来，把他们请来了，就要把他们安置好。不要仁义道德，光讲打仗，是好事生非！还是拆毁边防的工事好。”至此，这帮儒生的投降卖国嘴脸暴露无遗。

桑弘羊听到儒生们的无耻言论，气愤地说：“匈奴多次入侵，杀戮人民，抢掠财物，是汉朝中央政权的大患。我们打匈奴是正义的战争，是绝不容许你们攻击的。”

儒生们威胁说：“商鞅开发边疆，蒙恬打退匈奴，进兵千里，这是造成秦国灭亡的原因啊！”

桑弘羊痛斥儒生们说：“商鞅到秦国，秦国大治，功劳象丘山那么高。蒙恬征匈奴，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功。秦国之所以灭亡，是亡到赵高手里，这和商鞅、蒙恬有什么关系？你们这些人没有胆量抗击匈奴，反而造谣诽谤，借古非今，用心何在？你们要拆掉工事，用金钱去讨好匈奴，难道不知道匈奴反反复复，毫无信义，百约百叛吗？要知道：战备搞好了就可以制服敌人，搞不好就会被敌人制服！”桑弘羊的话把儒生们投降卖国的反动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帮蠢儒无理可讲，再一次挥舞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大肆鼓吹“法先王”的复古路线，狂叫什么：“当国君的就要效法尧舜禹，作丞相的要学周公，要治理天下就要学习孔子的道理，这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信条。”

桑弘羊这时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这种复古的老调给予反击。他风趣地揭露说：“你们常说，当臣的不改变君的制度，父亲死了，儿子不改变父亲的办法。现在实行的盐铁、均输，已经很久了，是武帝时就实行的，你们要把它去掉，这不是既有害于先帝的功劳，又违背你们所谓‘圣王’的‘教导’吗！”这一番话，把那帮腐儒驳得抓耳挠腮，狼狈不堪。

桑弘羊在会议上舌剑唇枪，把那些贤良、文学批驳得理屈词穷，丑态百出。他严肃地指出：他面前的这批贤良、文学，都是“内贪外矜”的伪君子，是一批反动政客，只配受到“焚书坑儒”的待遇。但是，这帮家伙还不甘心，硬想拉住桑弘羊不放。桑弘羊警告他们说：“算了罢，如果按照你们儒家的办法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就象胶粘的车子遇到大雨一样，马上就会分解，这一点必须向你们讲清楚。”最后，这帮儒生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桑弘羊在这次激烈的斗争中，舌战群儒，打退了复辟势力的突然袭击，揭露了他们对内复辟、对外投降的阴谋，捍卫了汉武帝以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法家路线，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霍光之流并不甘心，会议后的一年，他施用权术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桑弘羊及其全家。由此可以看出，盐铁会议的儒法论争，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桑弘羊虽然被杀害了，但霍光的复辟阴谋并没有得逞。昭帝、宣帝仍然执行法家路线。那些复辟狂的篡权复辟活动终被发现，汉宣帝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历史再一次证明：凡是搞复辟倒退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汉宣帝训诫逆子

西汉由宣帝刘洵到元帝刘奭（shì 音世）时代，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由尊法转向尊儒的转折时期。在元帝以前，汉朝历代皇帝基本上执行的是法家路线，然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巩固，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突出了。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政权，想的不再是进行社会改革，而是如何加强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法家的进步、改革的主张，已不再适合保守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儒家主张倒退、保守，反对进步、改革，叫人安分守己的反动思想，倒适合转向保守的地主阶级的胃口。同时，儒家极端虚伪，高唱仁义道德，有利于封建统治者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群众，因此原来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儒家思想只稍加改造，便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汉武帝时，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实行，这时儒家思想还没有得势。到汉元帝以后，就放弃了法家路线，执行了儒家的反动路线。宣帝训子的故事，是这一变化的突出反映。

公元前五三年春季的一天，汉宣帝刘洵和太子刘奭发生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是由于汉宣帝杀了大臣盖宽饶、杨恽

后，太子刘爽感到不满引起的。汉宣帝为什么要杀盖宽饶、杨恽呢？这事还得从头讲起。

曾任司隶校尉的盖宽饶，是一个善搞阴谋诡计，惯于陷害别人的反动儒生。他对汉高祖刘邦以来坚持统一中央集权封建制的法家路线，恨之入骨，不断地发出哀嚎，说这是对孔丘“圣教”的犯忤。对于汉宣帝所执行的法家路线，他越想越烦恼，越看越不顺眼，曾几次在朝上提出反对，甚至对汉宣帝实行法家路线大肆污蔑。他在一次奏本中叫嚷什么：“如今圣道全被抛弃了，孔圣人的儒家学说也得不到推行；况且在朝当权的多是些无赖之徒，他们用残酷的刑法代替了诗书礼义……。”他还攻击汉中央集权制是“家天下”，违反了孔老二“公天下”的说教，叫嚷要汉宣帝实行所谓“禅让”制度，也就是说，要汉宣帝自动退位，让他这个复辟狂登上皇帝宝座，篡权复辟。宣帝看了盖宽饶的奏本，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命令刑法部门将盖宽饶逮捕，投入狱中。不久，盖宽饶畏罪自杀。

曾任光禄卿的杨恽，也是一个张口周公，闭口“孔圣”的反动儒生。他和盖宽饶一样，性情刻毒，爱在背后捣鬼。对于汉宣帝执行法家政策，杨恽明枪暗箭经常攻击。一次在西阁楼看壁画，他公然指着夏桀和商纣的画像攻击汉宣帝说：“当今皇帝实行严酷的法家政策，内杀儒生，外抗匈奴，一点也不顾及‘仁义道德’，真比夏桀和商纣还要残暴得多呀！”又有一次，他拾起孔老二的“天命论”，把当时出现的自然灾害归罪于汉中央集权政府，别有用心地说：“长

期以来阴天不下雨，这不是好的预兆，恐怕天下又要动乱了吧！”宣帝得知杨恽这些恶毒的污蔑攻击之后，非常生气，下令将杨恽腰斩示众。

镇压盖宽饶、杨恽，朝廷上的很多官员都认为杀得对，杀得好！可谁知却引起了一位“贵人”的不满。这就是太子刘奭。

刘奭是一个愚蠢的孔孟之徒，他的老师肖望之是个有名的大儒。在肖望之的培养和熏陶下，刘奭学会了一套保守倒退的本领。他极力反对宣帝实行的法家路线，无时不盼望有朝一日登上宝座，来推行儒家的路线。俗话说得好：“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汉宣帝杀了盖宽饶、杨恽后，刘奭一直又伤心，又气恼，时时想找个机会来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

一天，刘奭见宣帝在宫中休息，认为这正是他说话的好机会，就赶紧上前几步，面孔胀得通红，对汉宣帝说：“陛下，你使用的刑法太残酷了！你用这样的办法来管理臣下，也太不‘仁’了。我看今后还是多用儒生的办法为好。”

听了太子的话，宣帝大怒。他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竟是这样一个人。将来要把政权交到这样的人手里，能使人放心吗？他越想越寒心，越想越恼火，不由得拍案而起，大声训斥道：“汉家自有制度，本来是法儒配合着治理国家的，为什么只用儒家一套呢？难道要采用周朝的政治制度吗？”宣帝越讲越气，声音也越来越高，他指着太子刘奭骂道：“儒家之徒，都是些不达时宜，是古非今的人，平时讲起话来引章摘句，装模作样，但行起事来却总是颠倒是非，

来扰乱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善不能守，恶不能除，这样的儒生怎么能够任用呢？”骂完后，宣帝坐下来，望着脸色一阵青、一阵红的刘奭，忧心忡忡地说：“今后败坏汉家政权的，一定是太子啊！”宣帝的这句话果然不差。宣帝死后，太子刘奭即位，就是汉元帝。元帝即位后彻底地改变了汉初以来的法家路线，公开打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号，使儒家思想成了正统。他使用的一些重要官员，都是些专务复古倒退的儒生，使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对人民的压迫极为沉重，加上灾荒连年，天下饥民成群，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以后的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铜马等农民大起义，西汉王朝便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灭亡了。

王充伐孔刺孟

西汉后期，封建制度进一步巩固，奴隶制复辟的严重危险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突出了，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开始逐步转化，从一个进步的阶级逐步向反动阶级方面转化。这时，主张变革、主张前进的法家思想，不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了，反对变革、主张倒退的儒家思想，倒同转向保守的地主阶级利益一致起来。同时，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儒家思想也有些改变，以适应转向保守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的以“天命论”为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一整套反动思想，就是适应地主阶级转向反动的需要经过改造的孔孟儒学。但是，董仲舒的反动儒学，在汉武帝时并没有流行开。到汉元帝以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突出了，统治阶级一面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大力提倡董仲舒的反动思想，把儒家思想抬到正统思想的地位。到了东汉，儒家的反动思想更是越抬越高。章帝时还专门开了一次白虎观会议，把谶纬（chèn wěi 音趁伟）迷信和董仲舒的那一套儒家反动思想揉合在一起，编成《白虎通义》一书，作为官方典籍公布出来，象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们信奉。

在尊孔逆流横行、神学和迷信统治着东汉思想界的日子

里，东汉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高举“非圣”旗帜，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反动邪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把矛头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和孟轲。

王充（公元二七——九七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家世代代都从事农业生产。王充在年青时和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联系，结交过很多地位“微贱”，行动“离俗”（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的朋友，听过很多“异言”（有反抗精神的话）。王充强烈反对儒家的“伪书俗史”，写出了《论衡》一书，其中《问孔》、《刺孟》、《知实》、《实知》等篇都是战斗的讨孔檄文。在这些讨孔檄文中，他义正辞严地宣告：“批驳孔丘，没有什么不应该的，讨伐孔丘的谬论，也没有什么违背道义的！”王充利用大量事实，向儒家的神秘主义的天命论宣战，把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复古倒退的历史观，揭露得淋漓尽致。

董仲舒继承了孔孟“天命论”的衣钵，炮制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反动谬论。胡说什么：天是最高主宰，是有意志、有思想的神。人间的一切，都是天有目的安排的。皇帝就是天的儿子，所以称天子，由天派下来统治人民的。天并且通过祥瑞兆福和灾异祸患来指挥他的儿子在人间的统治。董仲舒所以制造“天人感应”的谬论，就是假借天意，把封建统治秩序说成绝对合理，神圣不可侵犯，要人民服服帖帖听从封建统治。

王充针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指出：天是自然，

而不是神，天地万物是由物质性的气形成的。天是无知的东西，它没有嘴和眼，也没有欲望和意志；它没有手，也不会创造万物和人，也不能指挥皇帝统治人民。王充指出，天灾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尧舜时也有，并不是专门惩罚坏的国君的。雷电击人，也不是上天发怒，而是自然界阴阳“分争激射”的结果，人们在房中、树下被击死，就是这个现象。王充还理直气壮地质问道，如果天要通过祥瑞、灾异来指挥他儿子在人间的统治，那么为什么不让更多有德的君主来受天命，而偏要找一些残暴的昏君，等他作了坏事再来谴责他、警告他？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王充的批判，剥去了董仲舒捏造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圣灵光。

在批判“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时，王充对孔老二、孟轲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孔老二的得意门生颜渊死得比较早，孔丘叹息说：“噫！天要遗弃我啦！”王充质问道：颜渊短命，是自然现象，你孔丘说是上天要遗弃你，这有什么根据呢？这不是和病人拄着拐杖走路，忽然拐杖断了，就说上天要让病人无法走路的论调一样荒唐吗？

孔老二东奔西窜，为维护奴隶制卖命，并幻想弄个官当，结果到处碰壁，惶惶然如丧家之狗。于是他就非常感慨地说：“哎！凤凰没有飞来，河里又没出现八卦图，我的一生算完了。”王充严厉地质问道：所谓凤凰飞来、河图出现是祥瑞的象征，根据是什么？王充说：即使在三皇五帝的所谓太平时代，凤凰、河图也没有出现过；这类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更不是出现帝王的必然预兆。孔丘把希望寄托在凤

鳳、河图的出現上，這是可笑的，也是極其荒謬的。

王充對孔老二、孟軻的“天才論”更是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孔丘、孟軻自吹自擂，把自己打扮成是“生而知之”、“先知先覺”的聖人，董仲舒及其徒子徒孫也一再神化孔丘和孟軻，說他們是“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聖人”。王充猛烈抨擊這種謬論，他根據《論語》記載的事實，揭露出孔老二根本不是什麼都知道的“聖人”。有一次孔丘和顏淵都被匡人包圍了，孔丘溜得快，先逃了出來，顏淵跑得慢，後來才跟上。孔丘一見顏淵，又驚又喜地說：“啊呀！我以為你已經被殺死了，怎麼還跑回來了？”王充指出：顏淵沒有被匡人殺死，孔丘以為是被匡人殺死了，可見孔丘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還有一次，孔丘和顏淵在野外，顏淵給孔丘熬粥喝，忽然起了風，刮進了很多土。顏淵覺得拿這有土的粥給老師喝不太好，就把上邊一層有土的飯舀出來，自己喝了。孔丘在一邊看見了，想：顏淵這個人太不象話了，給我熬粥還偷着喝。王充根據這個事實指出孔丘並不是什麼先知先覺；他如果是先知先覺，就該知道顏淵那樣做是為了愛護他。

孔丘很瞧不起陽貨這個人。有一次陽貨派人給孔丘送去一個蒸小豬，這就使孔丘為難了，要收下吧，就得去回拜；不收下吧，又舍不得把蒸小豬退回。于是他耍了個滑頭，先把這蒸小豬收下，再打聽到陽貨不在家時去回拜。可是不湊巧，在回來的路上剛好碰見陽貨，弄得孔丘很難堪。王充質問道：可見孔丘並不是先知，要是先知怎麼還碰上陽貨呢？

从董仲舒到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儒生，都概不例外地把统治者和孔丘这样的“圣人”，吹成“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先知”。王充针锋相对地揭露说：孔丘连他的父亲是谁，他父亲坟头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周游列国时，路上过河连渡口也找不到，这怎么能说孔丘是“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人”呢？王充举出大量事实，指出孔孟所谓“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强调：人要认识外部世界，首先是通过感觉器官的直接观察，这是认识的根本条件。“圣人”和“愚夫”没有什么不同，对世间事物，只要有过接触，并经过认真思考，“愚夫”也能认识得很好；不接触实际事物，“上圣”也什么都不懂。这就是说，在王充看来，统治者不见得有智慧；被压迫的穷人，不见得就愚昧。因此他对那些智虑深而没有钱财的人，才能高而没有官位的人非常钦佩。他热情地歌颂了农夫、铁匠、小工、绣女的创造精神，尖锐地批判了儒家“上智下愚”的反动观点。

在历史观上，王充继承了荀况等法家的进步历史观，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孟轲的历史循环论，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批判。

儒家一贯鼓吹“今不如昔”的反动谬论，说：“上古的人纯朴，容易教化，后世的人轻浮，不好管理。”又说人类在道德上是退化的。王充指出历史是进化的。原始的人，不知道熟食，不知道种五谷；到后来，人知道熟食，知道种五谷，还有房子住，有衣服穿，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结果。同样，

人类的道德，也是不断进步的。儒家美化周文王、周武王的所谓“德行仁义”，都是他们添油加醋制造出来的。王充的结论是：社会是发展的，汉代胜过周代，一代比一代进步。

王充对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的历史循环论批判得更是尖锐。孟轲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王充指出，孟轲的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帝嚳（kù音库）、尧、舜、禹都是“王者”，一个接一个，根本不是什么五百年出现一个。由周文王、周武王到孟轲已经七百多年，却没有“王者”出现。难道是上天忘记了派遣英明帝王下世的日期了吗？

更可笑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竟然把孟轲的这种历史循环论也搬了出来，胡说什么杰出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看这个家伙反动、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王充对孔孟虚伪的仁义道德也进行了批判，揭露他们是高喊“仁义”，实际到处谋求升官发财的两面派。孔丘不是很爱讲“礼”吗？他的得意门生颜渊死了，他哭得很是伤心。可是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丘把车子卖掉给颜渊买外棺时，孔丘却马上板起面孔，一口拒绝，说什么“大夫出门不能步行”。他还对别人说：“我儿子死也没有给他买外棺。”王充指出，孔丘官架子不倒，为了保持大夫身分，不肯卖掉车子为学生及儿子下葬，是贪恋官位。他质问孔丘：你说“君子杀身以成仁”，为什么不能放弃官位来坚持“礼”呢？王

充的话有力地揭露了孔丘讲“礼”的虚伪性。孔老二讲“君子想的是国家大事，小人想的是个人私利”，可是他为了谋求利禄富贵到处钻营奔跑。孟轲也讲：只要仁义就可以了，不必求利。王充指出：既然这样，你孟轲为什么要接受宋王的七十镒金子和薛君的五十镒金子呢？这就暴露出，孔孟之流讲的仁义，完全是骗人的，他们自己就不相信这一套。但是对于人民，他们也是骗不了的，等到人民没吃没喝，“不能忍受饥寒”的时候，就必然要打破儒家的“仁义”说教，起来造反。王充虽然没有可能揭示出这是由于阶级压迫而引起阶级斗争的真理，但是他驳斥了儒家污蔑农民起来造反是由于农民的本性缺乏“礼义”道德的反动谬论。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神学、迷信笼罩着的东汉思想界，王充有力地批判了孔丘、孟轲、董仲舒的反动儒学，使混乱、昏暗的东汉思想界放出一道奇光异彩。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的局限性，王充伐孔刺孟，主要是从形式逻辑上揭露孔孟言行不一、言论与事实的矛盾，没有从路线上进行批驳。比如批判孔丘的“礼”，只讲孔丘本人及其所宣扬“礼”的虚伪性，没有从政治上看到“礼”的反动实质。事实上，孔丘的“礼”就是指的西周奴隶制度，他鼓吹“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奴隶制。由于王充没有从路线上分析问题，他对韩非的政治主张的评价也是错误的。由于他抓不住路线问题，他的批判触及不到儒家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劳动人民的批孔斗争，就深刻得多，而且很能打中要害。东汉末年的黄巾农

民大起义，不仅用暴力摧毁了东汉政权的反动统治基础，而且针对着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谬论，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斗口号。“苍天”就是指地主阶级的“天”，“黄天”是指农民的“天”，就是要推翻地主阶级的“天”，建立起农民的“天”。这种推翻地主阶级的“天”的革命思想，王充是根本提不出来的。这就说明，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劳动人民才会对儒家进行比较彻底的批判，他们是反抗封建统治者的主力军，是封建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曹操打击豪门坚持统一

东汉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尊儒反法的反动路线，使国力日益衰弱，政治越来越黑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不断激起农民的反抗斗争。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农民起义军响亮地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要推翻东汉地主阶级的王朝，建立自己的政权。面对这种情况，那些拥有门第世资的大官僚大地主，从自身的特权利益出发，在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大搞分裂割据，连年混战，致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情景。而那些无门第世资的中小地主，则要求革新，挽救社会危机，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这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反映到思想领域里，就形成了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曹操就是地主阶级中在政治上反对分裂割据和思想上尊法反儒的代表。

一提起曹操，就会联想到过去戏剧舞台上，涂抹着一副大白脸的人，这是被历代尊儒反法的反动派长期歪曲了的曹操形象。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说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

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鲁迅对曹操的评价是正确的。曹操（公元一五五年——二二〇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是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他博览群书，主张“揽申（不害）商（鞅）之法术”。他一贯反对豪门世族，具有尊法反儒思想。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先后平定了吕布、袁术、袁绍等豪门世族割据势力，平定了乌桓奴隶主贵族的骚扰，统一了北方，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曹操坚决主张法治，极力反对礼治。他针对孔老二“法古循礼”的反动思想，明确指出：应根据实际办事立法。他认为，只有坚决执行法家路线，才能“匡正天下，济世救危，立功兴国”。曹操在临死前的《遗令》中说：“我在军队中，主要是坚持法治”，“天下尚未安定，不能遵循古代的礼治”。曹操这些法治主张，实际是对东汉反动统治者表面讲孔老二的仁义、忠孝，实际贪赃卖法、无所不为的黑暗政治的有力批判，也是对被抬高到东汉王朝正统思想地位的儒家反动路线的批判。

曹操执法非常坚决，他对于有功劳的人赏赐从不吝惜千金；对于无功劳的人，不管你地位多么高，都分毫不给。他认为设置法律，就是不让你触犯，如果有人触犯，该杀头的一定杀头，该判罪的一定判罪，不管什么人都要“以王法从事”。曹操有个堂弟叫曹洪，他的宾客仗着他的势力横行霸道，许昌县令满宠要依法惩办，曹洪亲自出面说情，遭到了满宠的拒绝，曹洪就想用曹操来压满宠，满宠不听他这一

套，还是把曹洪的宾客杀了。后来曹操知道了这件事，不但不怪罪，还支持满宠，说他做得对。曹操坚持“法不阿贵”的原则时，能够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有一次曹操行军路过一片麦地。他为了保护群众的庄稼，公布了一道法令：“士卒不得毁坏麦子，违犯者斩首。”结果骑兵都下马，扶着麦子走过去。可是曹操自己的马因麦地斑鸠起飞而受惊，跑进麦地，毁坏了麦子。曹操就立即让执法官讨论，应该处什么罪？执法官说他是丞相，不能给定罪，曹操严肃地说：“制定法律而自己又违犯，在当今全国尚未平定的局势下，要是不处罚，怎么能够统帅部下呢？但是我是全军统帅，也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自杀。”他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就接着说：“那么请让我处罚自己吧！”于是就用剑把头发割下来，表示服罪执法。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曹操能够割发代首并不是简单的事。按照孔老二的儒家教条，谁要碰伤皮肤、割掉头发，就是对父母的不敬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就是从古代男女都留全发的习惯看，曹操弄个短发头，也是很难堪的事。曹操割发代首，就是对儒家虚伪孝道的批判，就是以身作则执行法治原则的表现。

曹操坚持法治原则的突出表现是对宦官和豪门世族地主的打击。在东汉末年，豪门世族地主是社会黑暗势力的总代表。打击这些反动势力是要冒风险的，但却是符合人民意愿的。曹操在二十岁时，就当上了东汉京都洛阳北部尉，维持治安。洛阳是东汉豪门世族聚居之地，他们仗势欺人，巧取豪夺，为非作歹，使京都人民深受灾难。曹操决心改革这种

恶政。他一上任，便造了几十根五色棒，悬挂在衙门墙上，下令：有犯法禁的，不论是宦官和豪强，一律依法用棒打死。汉灵帝的亲信宦官蹇硕的叔父，仗着自己是皇帝宠臣的亲叔，故意犯法作对，曹操不顾自己官小位低，依法判处他的死刑，公开向权贵们挑战。后来，曹操当济南相时，境内有十几个县官依仗豪门世族的势力，贪赃卖法，被曹操罢官的就有八个。公元二〇〇年，官渡一战，曹操打败袁绍统一北方以后，下令严禁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并免除当年的租赋。以后曹操又任用打击豪强、扶助贫弱、赏罚分明的梁习为并州刺史。在曹操的支持下，梁习把并州的豪强地主集中起来加以管制，然后征发他们的下属当兵，对不守法的豪强给以严厉的惩罚。

曹操对于开历史倒车，宣传孔孟之道的儒家保守派，也给予严厉的打击。孔老二的二十代孙、被儒生捧为“至才”的孔融，专门空谈“仁义”，反对曹操的法治，公开要求曹操恢复西周奴隶主贵族的“古制”。他依仗豪门世族势力及他在儒生中享有的名气，处处与曹操为敌。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提出禁酒令，孔融上书反对，说什么“酒可以修德养性，人不喝酒什么也干不了。”还讽刺说，既然酒都可以禁，那索性连婚姻也禁止好了。另一个反动儒生祢衡，是曹操法家路线的坚决反对者。这个跳梁小丑与孔融互相吹捧，祢衡吹捧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受之不却，反过来又吹捧祢衡是“颜回复生”。祢衡还赤膊上阵，“击鼓骂曹”。曹操对这些复辟狂，坚决进行镇压，把祢衡驱逐出境，把孔

融判处死刑。曹操杀孔融是当时儒法两条政治路线尖锐斗争的表现。

曹操在用人方面，坚持“唯才是举”的法家路线，反对“用人唯亲”的儒家路线。东汉时有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是对东汉儒家标榜的以德孝门第任官制度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儒家路线的虚伪性的有力批判。什么“秀才”，连字都不认识；什么“孝廉”，连父母都不要；什么“清官”，其实比泥土还污浊；什么“高第良将”，其实胆怯如鸡。曹操掌握政权后，公开向儒家的“仁”、“孝”宣战，他三次下“求贤令”，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并特别指出：“有蒙受污辱的名声，有被人耻笑的行为，或者不仁不孝，而具有治国用兵的本领的人，都可以推举出来当官，不要遗漏。”在《选军中典狱令》中，又特别明确提出：选用“明达法理”的人，掌握刑法大权。这种作法，实际是对儒家道德标准的否定和蔑视。曹操选拔人才时，很注重选拔有实践经验的人当官。如于禁、乐进都是从军队基层中提拔出来的，张辽、徐晃都是从败兵中招取的，以后都成为曹操的名将。还有很多州牧和郡守，也是从出身微贱的人中选拔的，也都成了曹操的得力助手。

曹操还极力反对豪门世族地主利用孔孟的“天命论”，阻挠社会变革，大胆宣布，他从来不信天命之事。他继承先秦法家“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曾说：“天地间，人为贵。”有一次，袁绍问曹操：若要取得天下，靠什

么？曹操回答说：要取得天下，最重要的是靠人的智慧与力量，加上办事合乎道理，就可以无往不胜。曹操打败吕布、袁绍等军阀势力，就是靠在法家路线指导下发挥人的作用。

东汉的反动统治者，只知崇拜孔丘，一味空谈仁义，不务农事，不管民生，加上豪门世族敲诈勒索，军阀连年混战，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曹操掌握政权后，按“以农富国”，“兵农合一”的法家耕战政策实行屯田制。他说：

“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又说：“秦始皇由于重视农业生产，而统一天下，汉武帝用屯田平定西域，这是我们的先辈创造出的最好榜样。”所谓屯田，就是把军队和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开荒种地，规定：屯田的农民用公家耕牛的，收获的东西，六成交政府，四成归自己；用私牛的对半分。曹操采取屯田制，使当时的北方农业生产不仅恢复了元气，而且很快有了发展，没有几年时间，政府到处积存有粮食，仓库里都装得满满的，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一定的保证。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曹操还组织力量，大力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方法和农具，推广种稻，以提高粮食产量。为了增加农具的供应，积极发展冶铁事业。曹操的下属韩暨，把马力鼓风机改为水力鼓风机，使冶铁产量增加三倍，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曹操坚决执行法家的进步、统一的正确路线，重视耕战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粮足兵强的程度，并通过正义的战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对北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都说明曹操是一个尊法反儒的

地主阶级的革新政治家。同时，还应当看到，由于曹操是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农民起义的高潮中，他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的活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诸葛亮以法治蜀

过去，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三顾茅庐”的故事。

公元二〇七年刘备在曹操的追逼下，逃到荆州，依靠刘表，驻军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给刘表看守北方。这时刘备观察形势，瞻望前程，深深感到要统一天下，不仅要有自己的力量，还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于是他四处访贤，“三顾茅庐”就是讲刘备三请诸葛亮帮助打天下的故事。

诸葛亮（公元一八一——二三四四年），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水县）人，出身在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跟叔父生活，后到荆州。十七岁时叔父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过着“躬耕”苦读的生活。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刘备求贤心切，听到新野“名士”徐庶的介绍，便冒着隆冬的严寒，接连访问了两次，都没有见到诸葛亮，第三次才得见到。

刘备见到诸葛亮，就十分恳切地向诸葛亮请教安定天下的大计。诸葛亮虽在隆中过着隐居的生活，但非常关心天下大事。他同刘备第一次对话，就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向刘备提出了一个统一全国的战略和具体策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

诸葛亮“隆中对策”的内容，就是建议刘备“先取荆

州、益州，安抚西南各部族，同东吴结成联盟，整顿好内政，然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夺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所谓两路出兵，就是一路由荆州出兵，向曹操的根据地南阳和洛阳进攻；一路由益州出兵，经秦川（今陕西、甘肃一带），攻取长安。诸葛亮问刘备：“益州形势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汉高祖就是以此统一了天下。将军有这个志向吗？”从“隆中对策”可以明显看到，诸葛亮在未出茅庐之前，就想要建立象汉初那样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这说明，诸葛亮是主张进步、统一的法家思想的拥护者。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对策，大为钦佩。他请求诸葛亮以力相帮，完成统一大事。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恳态度所感动，便答应出山辅助刘备。刘备对诸葛亮是十分信任的，从军事到政治基本上都是按照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办事，从而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又占有荆州，进入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在做了丞相之后，坚决为巩固蜀汉地主阶级政权，为实现统一全国的理想努力不懈，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治理国家是实行“礼治”，还是实行“法治”，这是儒家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诸葛亮始终坚持“法治”，反对“礼治”。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豪门世族地主专横跋扈，胡作非为。诸葛亮认为：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当权者软弱，威刑不严，只有“威之以法”，才能“上下有节”。诸葛亮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坚决执行法治，赏罚分明。他说：“赏是为了鼓励人立功，罚是为了制止人犯罪；

赏罚分明，是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又说：“我所以要用严刑峻法治国，是要人民知道法的尊严。只有采取这种赏罚分明的办法，勇士知道为什么去死，坏人要办坏事有所畏惧，这样才能使政治清明。”诸葛亮还主张以法治军。认为：“孙武、吴起这些军事家所以能够取胜于天下，就是以法治军的结果。”因此他非常强调军法的作用，他说：“如果赏罚不明，虽有军令人们不信守，两军阵上鸣锣不收兵，听见击鼓不冲锋，这样的兵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没有用的。”要使军队有战斗力，必须实行法治。

诸葛亮实行“法治”，特别强调先秦法家所主张的“法不阿贵”的思想。他说：“统治者说的话或做的事，大家都是看着的，如果统治者自己破坏法律，不做个好样子，那末要治理好国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出师表》中就向蜀后主刘禅建议，“不论是宫庭内外，都要一体看待。提拔与处分、表扬与申斥，都不要有亲疏厚薄之分。”在这方面诸葛亮是以身作则的。有一次，诸葛亮派马谡带兵镇守街亭，马谡违背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把军营扎在山上，被魏军切断水源，致使街亭失守，影响了战争的全局。诸葛亮按军法斩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将军马谡。诸葛亮对自己的错误也毫不掩盖，亲自上疏请求贬官三等。对于诸葛亮这种赏罚分明的精神，在当时就受到留府长史张裔的称赞，他说：诸葛亮“赏不忘记疏远的人，罚不躲避亲近的人；爵禄绝对不给无功的人，刑罚不因为谁的地位高就可以免掉。”对于那些搞分裂、破坏“法治”的世家豪族和官吏，诸葛亮总是进行

无情的打击和镇压，绝不宽容。治中从事彭蒙（yàng 音样）原来是蜀国的中央大官，骄傲自大，后来被调为江阳太守，嫌官职小，心怀不满，煽动马超叛乱。马超检举了他，诸葛亮就立即将他逮捕法办。长水校尉廖立，也搞分裂活动，自认为才高，应做诸葛亮的副手，公开诽谤朝政，攻击法治路线，说蜀国的官吏都是些俗人，不用贤达名士。他所谓贤达名士，就是指孔老二的信徒。后来，诸葛亮毫不犹豫地罢了他的官。

诸葛亮曾经说过：“要管理好国家的政治，必须能听进各方面的意见。”他一向奖励部下说老实话，力戒阿谀奉承。他说：“一个人如果因为得到了别人的直言批评而改正了过错，就如同扔掉烂鞋而获得珠玉一样。”一次，他部下一个官员董和，曾对他处理一件事表示不满，同他反复争论了十次。诸葛亮非但没有责备董和，反而加以表扬，要官员们向董和学习。

奖励耕战，富国强兵，这是先秦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诸葛亮继承了这种思想，根据法家“以农治国”的理论，重视农业，劝导老百姓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派遣了一千二百名士兵去保护四川有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并在那里设立堰官；后来在“北伐”战争中，还利用空隙时间，“休士劝农，分兵屯田”，实行法家“兵农合一”的政策，既克服军粮供应的困难，又发展农业生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他极力反对奢侈浪费，认为金银璧玉之货，锦绣绮罗之衣，雕文

刻镂等巧玩，都不是老百姓所要求的，统统不应提倡。

诸葛亮为了完成一统大业，按照既定战略，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诸葛亮执行这种政策的一个典型表现。孟获联合西南少数民族部族反蜀，诸葛亮亲帅大军远征。在这次远征中，诸葛亮严明军纪，不许乱杀彝人。初战就获得大胜，活捉了孟获。诸葛亮不但不杀孟获，也不加侮辱，还亲自带他去参观蜀军营垒，问孟获：“我们的军队怎么样？”孟获说：“以前我们不知道蜀军的虚实，所以被你们用计打败了。现在了解了你们的军队，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再有机会，我一定打败你们！”诸葛亮见他不认输，便释放了他，让他重整旗鼓，再来决战。就这样诸葛亮一连六次俘虏了孟获，又六次把他释放回去。诸葛亮在第七次俘虏了孟获之后，仍表示要释放他，叫他重新组织力量，再来决战。但孟获心服口服地对诸葛亮说：

“丞相的威力真大，我们南人今后再也不作对了。”孟获降服之后，西南各地少数民族都纷纷依附蜀国，不再为敌。由于诸葛亮的“法治”路线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到拥护和欢迎，使蜀国有了安定的后方，就为统一事业提供了重要条件。

诸葛亮为了实现统一，进行了“北伐”战争，但是由于关羽失守荆州，两路出兵、钳击洛阳的战略受到破坏，使统一全国的计划受到挫折。诸葛亮“六出祁山”，都因为后援不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最后不得不在渭滨屯田，与司马懿长期相持。后来诸葛亮积劳成疾，死于军中，蜀军遂按诸

葛亮死前安排好的计划退回汉中。蜀军撤退后，司马懿视察了蜀军的阵地，见蜀军布阵严整，赞叹不迭。

诸葛亮一生坚持法家的“法治”思想，统一了西南，并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了东汉末年我国西南地区豪强大地主统治的弊政，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仅仅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所进行的革新，都是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这种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也是应该看到的。

范缜大讲“神灭论”

在三国鼎立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分掌魏、蜀、吴三国政权，法家思想占上风，儒家思想一度吃不开了。对这种情况，门阀地主哪里会甘心呢？他们变幻手法，用道家思想来补充儒学，炮制出了一套荒谬的唯心主义“玄学”理论。他们企图用这一套使人听之非常微妙、神秘莫测的邪说，论证孔丘一派的所谓“名教”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任何人都不得反对，以此为他们重新掌权大造舆论。但是，这种用道家外衣装饰起来的孔孟之道，同样不能阻止阶级斗争的发展，挽救不了反动统治者的衰败命运。到了东晋南北朝，门阀地主又把佛教神学同孔孟之道结合起来，作为奴役劳动人民和为自己的封建特权辩护的工具。

南朝的梁武帝既是一个孔孟之道的信徒，又是一个迷信很深的有神论者。他大刮迷信之风，调用大量的人力物资，修建寺院，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时地主阶级革新派又举起法家无神论的旗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著名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就是这一斗争的杰出代表。

范缜（约公元四五〇年——五一五年），字子真，舞阴（今河南泌阳）人，出身寒微，在南朝门阀豪族地主掌政时代，是一个受歧视、受排挤的人。范缜在年青时就表现出了

对门阀的反动统治的反抗精神。

范缜所处的齐梁时代，门阀地主的统治非常腐败，士族子弟凭借他们的政治特权，做高官，享厚禄，却从不过问政事，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劳动人民在门阀地主的残酷剥削下非常穷困，阶级矛盾非常尖锐，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反动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权，除了用儒家的“名教”禁锢人民之外，还极力利用佛教欺骗和麻痹人民，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迷信邪说，胡说什么这一辈子享福受罪，都是前一辈子造成的结果。官僚地主所以能享受荣华富贵，不是他们剥削了人民，而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不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是前世造孽作恶的结果。因此，他们要求人们对现实生活要忍耐、要驯服，不能反抗、不能造反。反抗、造反就是作恶造孽，死后要下地狱，轮回再生时要变牛变马，受更大的罪。忍耐、驯服，信佛“行善”就是积德，死后就可以升天堂，进入极乐世界，轮回再生时就可以变为享受荣华的贵人。在宗教迷信之风极盛之时，范缜继承和发扬荀况、韩非、王充以来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勇敢地提出“神灭论”，断言人死精神灭，不可能成佛。范缜的理论使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竟陵王肖子良，发动一些人去质问范缜，但不能使范缜屈服。肖子良看硬的不行，就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范缜。他派一个儒生王融对范缜说：“‘神灭论’既然不合道理，你还要坚持，恐怕有伤名教。象你这样有才干的人，何必这样固执，要是放弃‘神灭论’，何愁当不上中书

郎呢？”范缜一听哈哈大笑，说：“我范缜要是放弃自己的思想去求官位，那早就当上宰相了，何止是个中书郎呢？”王融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滚回去了。

轮回因果报应邪说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精神不死、灵魂不灭，灵魂（精神）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思想。范缜在他的名著《神灭论》中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有力地论证了精神（灵魂）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他说：“神（精神、灵魂）就是形（身体），形也就是神，所以形体存在，精神也存在，形体死亡，精神也就灭亡。”范缜还以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形”与“神”的关系。认为“神”和“形”的关系，就象锋利和刀刃的关系一样。他说：“没有听说刀刃没有了而锋利还存在，那么形体已经死亡了，精神怎么还会存在呢？”范缜认为：人有知觉，树木没有知觉，这就说明知觉是人的属性，他说：形体就是赖以产生精神的物质，精神就是形体的运用。范缜这种思想就是明确地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范缜进一步指出：物质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地运动着，一个质可以转变成为另一个质。他说：“活人的身体就不是死人的尸体，死人的尸体也不是活人的身体，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有了质的变化，所以就由活人的身体的有知，而转变为死人尸体的无知。”范缜的精神与知觉只有活人有，死人则没有的观点，就说明不同的质具有不同的属性，属性不能离开质而存在，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产生。

范缜的“神灭论”思想，对于人死灵魂不灭的谬论是一

个沉重打击，因此引起以梁武帝为首的反动统治者的极力反对。梁武帝曾召集御用学者六十四人，写了七十四篇文章向范缜发动围攻。攻击范缜的“神灭论”损害“名教”，背叛了孔孟的“经书”，不敬祖宗神灵，是大逆不道。范缜不避反名教的罪名，批驳了梁武帝的无耻澜言。一个叫王琰的反动儒生被范缜批驳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时，就大耍流氓，以谩骂代替战斗，他说：“哎呀范先生，你连你的祖先的神灵在哪里都不知道，可真是不孝顺啦！”范缜针锋相对，讥笑这个笨蛋，说：“哎呀王先生，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的神灵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还不自杀去找你祖先呢？不然，可不能算是孝顺啊！”王琰本想骂范缜，结果自己找了个没趣，只好狼狈地败下阵来。

范缜的《神灭论》以法家唯物主义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对儒、佛、道三教的唯心主义灵魂不灭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范缜也还存在着很多缺点。他认为地主剥削农民，人民供养地主都是合理的，他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承认“圣人”和“凡人”在形体上有根本差别，把人的聪明和才能归结于天赋的“形”、“质”不同，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泥潭。在鬼神问题上，他一方面否定鬼神的存在，同时又肯定统治阶级的“神道设教”的必要性，这就说明范缜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不彻底性。尽管如此，必须看到，范缜的神灭论思想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范缜同梁武帝的斗争，同样是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武则天做皇帝

南北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长期的斗争，特别是隋末农民战争的打击，士族门阀衰落了。公元六一八年，在隋末农民战争中，李渊父子建立了唐王朝。

公元六五五年，在唐王朝内部，发生了一场以废立皇后为焦点的政治斗争。唐朝的第三代皇帝李治（唐高宗）要废原来的王皇后，另立武则天为皇后，这件事在唐朝宫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为首的一班大臣坚决表示反对。褚遂良说：“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哪能随随便便地废掉！”当满朝文武大臣们讨论这件事时，褚遂良又说：“皇上如果一定要另立皇后，就请在名门大族中挑选美女。为什么一定要立那个武氏？”司空李勣、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大臣对于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则表示坚决支持。

唐高宗李治废立皇后的问题，表面上看只是朝廷的家事，实质上却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斗争。原来王皇后出身名门大族，是太上国舅长孙无忌、顾命老臣褚遂良拥立的，代表世族豪门地主的利益。褚遂良等人保护王皇后，实际上就是保护世族豪门的政治特权。而一般中小地主集团，为了反对世族豪门地主的特权，革新政治，削弱褚遂良等腐朽保守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

就支持出身比较低而在政治上很有作为的武则天当皇后。唐朝宫廷内这两派势力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李勣、许敬宗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就在这一年十月十三日，高宗李治下诏书废王皇后为庶人。十一月初一，举行隆重的仪式，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武则天（约公元六二四——七〇五年）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是利州（现在四川广元县）都护武士彠（hù音户）的女儿，名曩（zhào音照）。她刚强机智，熟知历史，是地主阶级中很有才干的人。她在当了皇后以后，积极参与政事，曾向高宗李治提出过十二条革新建议，主要内容是要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赋税、徭役负担；广开言路，杜绝奸邪；禁止官僚贵族奢侈腐化；对于有才干的人要破格提拔等等。这些建议以后都陆续得到实行。武则天的这些主张对于整顿政治，促进生产发展，都起到一定作用。

武则天当了皇后，保守派十分不满。随着高宗多病不问政事，武则天直接掌握政权，保守势力就更加反对。褚遂良、长孙无忌勾结韩瑗、柳奭（王皇后的舅父）等人，多次密谋叛乱，都被武则天识破并随即镇压下去。但保守势力不甘心失败，他们在皇室中寻找政治代理人，利用太子李弘来反对武则天。李弘是个孔孟之徒，对所谓的“鸿儒之士”极为尊重，他曾上书要求追赠孔老二的得意门徒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他极力反对武则天，并与守旧势力站在一起攻击武则天。公元六七五年，武则天废掉李弘并处以死刑，立其弟李贤为太子。但李贤也是一个孔孟之徒，为

了反对武则天的政治路线，他私藏武器，准备发动政变。公元六八〇年，武则天发现了李贤的诡秘行动，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在洛阳天津桥上当众焚毁那些武器，宣布李贤的罪状，将他废为庶人，囚于巴州（四川巴中县），立她的第三个儿子李显为太子。公元六八三年，高宗李治病死，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李显刚一上台，就急急忙忙任命他的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又要授给他乳母的儿子以五品官。武则天使人劝他，他说：“我把国家让给韦玄贞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怜惜一个宰相位置？”武则天为了使政权不败坏在这个“任人唯亲”的李显手中，毅然将他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废为庐陵王，另立第四子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则天以太后身分，临朝执政。但斗争并没有因此结束。保守势力在太子身上打主意的阴谋破产后，就亲自跳了出来，发动叛乱。公元六八七年九月，保守势力的政治代表徐敬业，以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为号召，在扬州起兵，宰相裴炎、大将程务挺也和徐敬业遥相呼应，密谋策划，妄图迫使武则天交出政权。在这紧急关头，武则天临危不乱，一面发兵三十万平息扬州叛军，一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裴炎一伙，整个叛乱，不到五十天就被镇压下去了。这次叛乱平定后，武则天召集大臣讲了一次话，她说：“老臣中跋扈难治有能比上裴炎的吗？世代为将而能纠集亡命之徒的有能比上徐敬业的吗？宿将善战有能比上程务挺的吗？这些所谓人中豪杰进行叛乱，已被我处治了，你们当中有人认为超过他们，还想出来较量一番的，请早些出来。否则，请老老实实跟我走，不

要惹天下人笑话！”这一番话吓得那些顽固派屁滚尿流，不敢吭声。公元六八八年，武则天又以同样果断的措施，一举消灭了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的叛乱。武则天的亲生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因参与李冲父子叛乱，被打一百大板，下到狱中，后在狱中饿死。至此，基本上荡平了保守派控制的武装力量。

从六五五年始，大地主保守势力一次又一次地反对武则天，都遭惨败，而武则天却在反对保守势力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这也说明武则天有能力领导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保守派的斗争，有办法控制住当时的局势。公元六九〇年九月九日，在洛阳则天门的门楼上，举行了盛大的登基仪式，武则天突破儒家重男轻女，妇女不能当皇帝的惯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鲁迅说：

“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女子当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创举。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蔑视和批判。

武则天当政以后，始终执行法家路线。为了掌握下情，她诏告天下，收受告密信件。有些告密人，武则天还亲自召见。一旦发现有作恶的人，就严刑处理。后来尊儒反法的保守派大肆攻击武则天是“女祸”“乱国”，完全是恶意诽谤。

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在举用人才方面。她改革了科举制度，不论门第，扩大录取名额，选拔更多的地主阶级人才，补充到政权机构中去。她亲自主持重要

考试，接见有突出才干的人。她还特别开了女科，从妇女中选拔人才，提高妇女地位，使妇女也有参政机会。在用人上，有才能的人一定要提升，不称职的就罢官或降职，所以当时一些贤臣、名将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保证法家路线的贯彻执行。武则天任用的宰相狄仁杰、姚崇都是执法坚决的法家人物。历史上的尊儒反法的反动派攻击武则天“重才轻德”，其实武则天重的是法家之才，轻的是儒家之德，这正是她执行法家路线的表现。

武则天还特别注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破除孔孟之道，限制儒生。唐初，在首都长安设有国子学和太学，学生都是各级官僚的子弟，这些学府的主持人和教师多是孔孟的忠实信徒，学习内容全是儒家经典。武则天对这样的学府进行了改革。在她执政时期，这些学府多由武氏诸王和驸马主持，他们根本不是儒生；教师也不用儒雅之士；学习内容由儒家经典改为诗、赋、文章和历史。科举考试，不考经义，而考诗、赋、文章。对于这种情况，孔孟之徒恨之入骨，百般攻击，胡说什么武则天毁灭学校啦，儒学不兴啦，风俗败坏啦等等。孔孟之徒的恶毒攻击，正好说明武则天的反儒精神。

武则天不仅注意国内局势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注意排除外来势力的干扰。当时吐蕃、突厥等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奴隶主贵族经常侵扰内地人民。因此，武则天出兵反击，打败了吐蕃和突厥，打通了曾经一度中断的中西交通，使唐代的长安继续成为当时中亚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武则天掌权的半个世纪里，由于坚持执行一条顺应历史发展的法家路线，“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坚决打击世家豪族的腐朽势力，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破除孔孟之道的思想束缚，因而社会比较安宁，经济、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从公元六五二年到公元七〇五年，（武则天死后的第一年），全国户口从三百八十万户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多户。这一事实，集中地反映了武则天执行“法治”路线的成就。当然，武则天毕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治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她的许多措施还有消极的方面。但总的来说，她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柳宗元奋笔斥韩愈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八〇五年），发生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即以王叔文为首，包括柳宗元、刘禹锡等地主阶级革新派受斥被贬，宦官和大地主保守派上台，颠覆了革新派政权的事件。在唐王朝已经衰败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但到唐朝的中叶，封建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最高统治者唐玄宗更加奢侈腐化，整日沉溺于酒色，不问政事。公元七五五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头子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尽管唐王朝大动干戈，历经八年时间，平了“安史之乱”，但从这以后，盛唐便开始衰败下来。伴随这种衰败过程，地方藩镇割据势力越发膨胀起来。他们手握重兵，公开对抗中央政府，实际上成为各霸一方的土皇帝。在中央政府，宦官集团窃取了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他们与地方藩镇势力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横行天下，鱼肉人民，形成一股十分反动的分裂势力。边疆奴隶主贵族趁机策动叛乱，肆意掠夺，使唐王朝陷入混乱分裂的状态中。

公元八〇四年，春夏大旱，粮食歉收。京兆尹（唐王朝国

都长安的长官)李实依仗自己是皇帝宗室,在大灾之年,强行搜刮,胡作非为。老百姓去京兆府抗议,李实一概置之不理。一天,唐德宗忽然心血来潮,向大臣问“民间疾苦”。李实马上撒谎说:“今年虽然大旱,但是田里庄稼长得特别好。”于是唐政府的赋税,大灾年有增无减,使穷苦的老百姓被迫拆房卖屋,去交赋税,生活更加穷困。一个歌舞奴隶叫成辅端的,看到这种情况,曾编几十首顺口溜,唱给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们听,其中唱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硕伍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有唐建都长安二百年来,为什么如今这样轻视种田?一顷麦苗只值一石五斗米,三间堂屋才卖二千钱。)李实听了,恼羞成怒,给成辅端加上诽谤皇上的罪名,处以死刑。自此,朝臣中再没有人公开谈论民间疾苦。由于权臣专横,藩镇称雄,老百姓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这时,在皇太子李诵周围有一批具有法家进步思想的人物,以王叔文为代表,要求革新,主张维护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以挽救社会危机。大宦官俱文珍、大军阀韦皋和以儒家道统维护者自居的韩愈为代表,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极力反对革新,顽固坚持封建割据和专权。这样,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便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太子对唐王朝的危机早有察觉,常与王叔文议论革新的事。王叔文向太子推荐了许多积极要求革新的人才,其中就有在朝里任监察御史里行、负责弹劾贪官污吏的柳宗元,还有王伾(pī音丕),他是有名的书法家,刘禹锡是个有“宰相才能”的青年人,

陈谏、程异在管理经济方面很有才干，韩泰是王叔文培养的军事人才，其他还有韦执谊、凌准、韩晔等。他们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革新派以王叔文、王伾、柳宗元、刘禹锡为主，积极参与朝内大事的决策，革新活动十分活跃。

公元八〇五年正月，李诵即皇帝位，为唐顺宗。王叔文等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其他革新派人士也都在朝内担任了重要职务。革新派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在政治上，坚决打击顽固的保守派，加强和充实革新派力量。他们首先向大贪官李实开刀。公元八〇五年，李实借机强征应免的赋税，一次即搜刮民财达三十万贯，顺宗把他贬为通州长史。长安市民听说，袖揣石块，准备痛打李实，吓得这个家伙连夜逃窜。接着，王叔文又建议顺宗起用被保守派排斥的陆贽等，并在下层选一批人担任中央官吏，扩充了革新势力。在经济上，规定地方除正税外，禁止一切非法剥削，免去老百姓所欠赋税。王叔文还建议放出大批宫女，回家自谋生活。仅安国寺一个地方，就放出一千多人。王叔文还亲自担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管唐中央的经济大权。在军事上，以老将范希朝为中央禁军和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副，控制军权。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打击了藩镇、宦官等保守势力，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斗争是十分尖锐激烈的。在军权问题上斗争更为激烈。宦官头子俱文珍怂恿保守派将领拒绝交出军权，当韩泰到奉天召集会议时，他们都拒绝参加。同时，以俱文珍为首，勾结朝臣中一

批有“儒学高名”的人发动政变，逼着顺宗退位。革新派政权只有一百四十六天便被颠覆。革新派人物遭到了残酷镇压，王伾被逼死，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也被杀害。其他革新派人物都被贬官，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柳州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保守派的疯狂镇压，使革新派进一步认识到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严重危害，激发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奋战不息。柳宗元、刘禹锡同反动儒家头目韩愈的激烈论战，就是这种斗争的突出表现。

柳宗元被贬到的永州（今湖南零陵），是个人烟稀少，非常荒僻的地方，他在龙兴寺中整整住了十年。后来，他又被贬到柳州（今广西柳州）做刺史，在那里一直斗争到死。

与保守派在政治上的镇压相配合，以韩愈为首的儒家在思想上也对革新派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柳宗元针锋相对，在被贬期间写出一系列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战斗文章，痛斥韩愈的无耻谰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大进步。可是，韩愈站在复古倒退的立场上，充满着对进步、革新的仇恨，咒骂秦始皇废分封、焚书坑儒是灭“先王之法”，并把这说成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他拚命宣扬诸侯世袭的三代圣王之治，把它视为最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这是“先王之

道”，绝对不能改变。柳宗元在他著名的《封建论》中，狠批了儒家妄图恢复分封制开历史倒车的谬论。他首先指出：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是客观形势决定的，分封制的产生是这样，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也是这样。柳宗元把这个规律归结为“势”，说社会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他用历史进化论的思想，说明历史上商汤灭夏桀，依靠三千诸侯的力量，武王伐纣，依靠八百诸侯的力量，商汤、周武不能把他们依靠的诸侯都废了，只好实行分封制，这并不是他们愿意如此，是大势所趋。由于历史的发展，分封制又被郡县制所代替，这同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柳宗元这种进化论观点，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儒家利用一些表面现象来迷惑人，胡说什么：周朝推行分封制，能够维持八百年，秦朝实行郡县制，只有两代就灭亡了，可见分封制比郡县制好。柳宗元驳斥说：周朝维持八百年，只是个假象，实际上早就灭亡了。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成了一个空名，诸侯割据，互相兼并，天下大乱。周朝灭亡就是实行分封制的恶果。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指挥灵便，秦早亡的原因“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并不是郡县制不好。他根据汉初“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有叛将而无叛州”的事实，指出后期地方兵权掌握在藩镇手里，因而造成了分裂。这一点抓住了唐代藩镇割据的要害，柳宗元批判了分封制，批判了复古倒退，实际就是对藩镇割据势力的宣战。

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还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

历史功绩，认为地主阶级施行郡县制是“公天下”，“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指出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而创立的郡县制一直延续至唐代，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说明秦制是正确的。《封建论》是秦汉以来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争论在理论上的总结，也是对主张分封制的复古思潮的一次总清算。通过这次清算，儒家要以分封制代替郡县制的谬论基本上被打退了，对以后儒法斗争有深刻的影响。

在柳宗元和韩愈的论战中，韩愈这个腐儒继承孔老二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鼓吹天是人类的最高主宰，具有“赏善罚恶”的威力，人的命运是由天安排的。因此，他警告人们不要违抗“天常”，要听天由命。不难看出，韩愈的矛头，是针对人民的造反精神，也是针对革新派的改革要求的。柳宗元写了《天说》、《天对》、《非国语》等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坚决批判了韩愈的神学天道观，指出：天是“无青无黄，无赤无黑”的大自然，没有意志，它对人们也根本没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在他看来，天地、元气、阴阳，都是自然现象，它们和瓜果草木一样，都是“物”。人们求天、怨天，都不必要。柳宗元质问道：假若有人把侵害瓜果草木的昆虫除掉，瓜果草木能知道感恩吗？有人要专去培养昆虫，使它繁殖，瓜果草木会发怒吗？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事的“存亡得丧”根本和瓜果草木以及天地、元气没有赏罚关系。柳宗元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出发，对董仲舒的“王权神授”谬论给予尖锐批判，一针见血地指出：“受命

不于天，于其人。”认为政权不是神授的，得到人们支持的政权，才能久存。柳宗元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尽管达不到完全科学的认识，但他把自然与人加以区别，这种“天人相分”的观点就彻底否定了儒家“天人感应”的谬论。柳宗元揭露说，儒家宣扬“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正如巫婆、算命瞎子一样完全是欺人之谈。他还以寓言故事的形式，对于顽固保守的儒家势力，进行有力的鞭挞。例如《黔之驴》一篇，就是刺向当时社会上那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反动派的一把匕首。这充分表达了革新派不畏“天命”，对保守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可贵精神。

柳宗元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他对儒家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幻想用少数人的改革去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这正是他们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在这一场斗争中，柳宗元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发展了先秦和秦汉法家的思想，对唐以后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有很大影响。

王安石三斗司马光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宋代，就逐步衰落，向后期演变。到了北宋中期，一小撮官僚大地主利用政治特权，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耕地，并且逃避赋税徭役，对农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再加上统治集团的挥霍浪费，引起了财政危机；同时，北部的辽和西夏的贵族统治者经常进行侵扰，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造成了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积极要求变法，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王安石（公元一〇二一年——一〇八六年）字介甫，号半山，曾被封为荆国公，所以后世又称他为王荆公。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时就上过万言书，提出了变法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公元一〇六七年，年轻的皇帝宋神宗赵顼即位，他面临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财政危机，想从变革中寻找出路，于是就任用王安石为宰相，领导变法运动。王安石设立了变法机构，相继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保甲法等等“新法”。“均输法”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物资的

收购调运，防止豪商富室进行投机，牟取暴利；“青苗法”是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放钱粮，利息较低，防止高利贷者的重利剥削；“农田水利法”主要是兴修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工程由官府管理；“市易法”是限制皇室贵族和豪商对城市中小工商业者的额外勒索；“免役法”是要原来享受免役特权的豪绅、官吏、富商、僧侣出钱，由政府雇募人服役，使农民减少差役，以利发展农业；“方田均税法”是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土地，实行按占地多少缴纳赋税；“将兵法”是要求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对各地区的军队进行训练；“保甲法”是对农村壮丁进行军事训练，使具有当兵打仗的能力。

王安石为了变法，写了《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创立了与孔孟儒学相对立的“荆公新学”，并把《三经新义》列为当时学校的必读教材，使学校成为培养变法人材和宣传变法思想的阵地。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为了抑制兼并，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的社会地位，增加国库收入，并不能解决极度尖锐的农民与大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变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集团的特权，对它们的利益有些触犯。这就遭到了以司马光、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大官僚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和恶毒攻击。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意识各个领域，处处都在激烈地进行着。在从公元一〇六九年到一〇七六年的变法过程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就有三次集中、尖锐的斗争。

公元一〇六九年（神宗熙宁二年），“青苗法”颁布以后，顽固派立即掀起一次反变法的恶浪。大官僚地主阶级的元老派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出来大吵大嚷，攻击“青苗法”，弄得宋神宗有些动摇。王安石在对“青苗法”作了辩解之后，称病在家，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在变法派吕惠卿等人的要求下，一再表示挽留。这时，司马光利用他翰林学士的头衔，代替神宗起草挽留王安石的“批答”（对王安石要求辞职的批语），乘机耍弄阴谋，把挽留写成谴责，说王安石变法弄得“人人愁痛”，老百姓骚动不安，皇帝不好收场等等，企图迫使王安石早日下台。王安石立即上书澄清事实，宋神宗这才清醒过来，随即表明了挽留的真意。司马光的阴谋可耻地破产了。王安石继续执政，变法态度更为坚决。他一方面对“青苗法”推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纠正，一方面布置对顽固派进行反击。

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一连向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软硬兼施，极力掩盖他在起草“批答”中的阴谋，继续向王安石进行恶毒的攻击。他攻击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造成“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是只懂得“利”，不懂得“义”的“小人”，并且无中生有，给王安石列了“侵官乱政”，“生事扰民”，“与民争利”，“拒绝劝谏”四大罪状。最后图穷匕首见，公开无理要求王安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出来说一句话：废除新法，一切复旧。

面对着司马光的公开挑战，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无情地揭露了司马光的真面目，对司马光强加的“罪

状”一一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王安石一开头就说：“我和你长期以来，商议国家大事意见总是不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一下子指出了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思想根底，撕破了他的画皮。王安石在驳斥司马光强加给他的四大罪状时说：“我接受皇帝的命令，商讨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上把它议定下来，然后交主管官吏去执行，这决不是什么‘侵官乱政’；我吸取前代帝王治理国家的经验，兴利除弊，这决不是什么‘生事扰民’；我实行的一系列理财政策，是为了国家富强，决不是什么‘与民争利’；我批判邪说谬论，驳斥奸邪小人（指顽固派），也决不是什么‘拒绝劝谏’。”司马光还曾攻击王安石“要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在这封信里郑重声明：为了变法，“不计较敌对力量的多少”，并且正告司马光说：“要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只去墨守陈规旧章，那是根本办不到的。”王安石不怕威胁，坚持革新，表现了一个法家政治家敢于斗争的气概和胆量。

司马光在写信威胁王安石失败以后，紧接着又在科举考试中玩弄阴谋，妄图借考生之手来围攻王安石。公元一〇七〇年，司马光突然向考生出题，将王安石曾说过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句话和儒家经典加以对照，要考生发表意见。他认为这一下总可以抓到王安石的什么“罪状”，煽动一部分人来反对变法了。朝廷内外的顽固派官僚也都蠢蠢欲动，吵吵嚷嚷，妄图再次动摇宋神宗的变法态度。宋神宗找王安石询问情况，王安石立即对顽固派的

谬论作了批驳。

有没有“天命”？是不是可畏？孔老二炮制“天命论”，要人们“畏天命”。顽固派用“天命”来吓唬人，反对变法。他们硬说天旱、地震、山崩等自然灾害，都是由于王安石实行变法，违犯了“天命”引起的，是天对变法的惩罚。王安石严厉质问那些顽固派：如果人间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天命”决定的话，那么还要人来干什么？你们说唐尧、商汤是顺“天命”的“圣贤”，但是，在他们治理期间，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这该怎么说呢？王安石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认为水旱天灾、地震、山崩等自然现象的形成与人事无关。因此，“天变不足畏”。他还继承荀况“人定胜天”的思想，认为应当“修人事”，努力去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

祖宗之法可变不可变？顽固派大吵大嚷：“祖宗之法不可变也”，要人们相信孔老二的“畏大人”的反动说教，死守孔孟之道的老规矩。他们把变动“祖宗之法”当成一大罪状，胡说什么不按祖宗的老规矩办事，国家就要灭亡，只有一成不变地照老规矩行事，才能统治长久。革新派则用事实说明自古以来没有不变的法。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法，春秋战国以来，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法，就是宋代，从宋太祖到宋仁宗，某些法律制度也有很多变动。祖宗自己都变，怎么不许后人变动呢？王安石得出结论说：“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怎样对待“人言”？顽固派搬出孔老二“畏圣人之言”的说教，要革新派遵循孔孟之道，也就是要革新派在他们的

攻击诽谤面前屈服，王安石不听他们那一套，他们就叫喊“不恤人言”（不听意见）了。王安石斩钉截铁地回答顽固派：“人言不足恤”，攻击变法革新的流言蜚语就是不能听。顽固派攻击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王安石回答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程颢诬蔑新法是“用贱陵贵，以邪妨正”，王安石痛斥他是不识时务的“愚儒”、“庸人”。

王安石的“三不足”思想，是对孔孟之道的大胆挑战，是对孔老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有力批判。它打破了当时思想界拘守孔孟之道的一潭死水的局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革新派的斗志。反动理学家程颢气急败坏地攻击说：“最大的祸害是王安石的新学教坏了青年们”，表示要和王安石拼命，足见王安石的新学对反动理学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经过这次斗争之后，攻击“青苗法”的一些顽固派官僚被赶出御史台、谏院等弹劾机构，司马光也被迫下台，离开京都。新法的推行获得了很大成绩。列宁称许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但是，王安石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在变法中走的是一条改良的道路，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农民起义军针对社会的基本矛盾，响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却在于防止农民大起义，变法的阶级基础是很狭隘、很软弱的。变法得不到农民的拥护，对顽固派的打击不够有力，新法也未能全部认真执行。公元一〇八五年宋神宗死后，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在高后（英宗皇

后)、曹后(仁宗皇后)的支持下,立刻就反扑过来。司马光登台执政,把新法全部推翻了。鲁迅说得好:“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王安石变法失败八百八十多年以后,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又重弹起宋朝顽固派的老调子,骂王安石是“拗相公”,并把反动的儒家门徒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而伪造的《辨奸论》视若珍宝,从《辨奸论》中寻求反革命的策略,恶毒咒骂和攻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丧心病狂地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恰好说明他和历代的反动派是一路货色,是钻进我们党的一个大儒。

反理学陈亮斥朱熹

南宋时期反动的理学家朱熹，曾有这么一段话：“陈亮的学说传布到江南去了，两浙地区信奉他的学说的人已经很多了。……这种情况真是可怕！真是可怕！”陈亮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学说为什么使朱熹连声惊呼呢？

陈亮（公元一一四三年——一一九四年），字同甫，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县）人，与朱熹（公元一一三〇年——一二〇〇年）是同时代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东北女真族贵族政权金朝不断南下进犯，南宋王朝国势危急的时期。当时，爱国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进行英勇的抗金斗争，而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却推行一条一面残酷镇压农民革命，一面对金朝屈辱投降的反动路线。朱熹是大地主阶级顽固派在思想方面的代表。他继承和发展了北宋程颢、程颐所开创的反动理学，并吸取佛教和道家思想，炮制出一个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南宋王朝的反动政治路线提供理论根据。而陈亮则是主张革新，主张抗金救国，力图中兴的进步思想家，是这个历史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陈亮曾经多次痛斥朱熹的反动谬论。既然是这样，陈亮学说的广泛传布，怎能不使朱熹这个反动腐儒连声惊叫“可怕”呢？

朱熹的反动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他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是万物的根本，胡说“理（即精神）在气（即物质）先”，“没有天地以前，已经有了这个理。有了这个理，便有这个天地；如果没有这个理，天地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万事万物也没有了”。对于朱熹的这种谬论，陈亮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根本没有什么先天地而存在的“理”。充塞天地之间的无非是具体的事物，而宇宙间任何普遍原则都只能存在于客观的具体事物之中，决不能存在于事物之外。在这里，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陈亮的一生，以革新政治、抗金救国、中兴宋朝为奋斗目标，因此，他重视实用，重视功利，对朱熹之流空谈“仁义”的反动“儒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朱熹继承孔丘、孟轲、董仲舒的反动说教，将“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义”就是“天理”，“利”就是“人欲”，“天理”与“人欲”、“义”与“利”不能并存。就是说，为了保存“天理”和仁义，人民必须放弃“人欲”，即放弃谋求生存的权利。陈亮把那些终日低头拱手，走路迈着四方步，说话拉着长腔，满口道德义理，而不能做一件实际工作的道学家叫做“腐儒”，说他们是得了麻痹症“不知痛痒”的人。正是这样一些麻木不仁的道学家，败坏了社会风气，使人迷失方向，导致深刻的社会危机。针对这种情况，陈亮将“义”、“利”统一起来，明确提出只有功成事济，做出了成绩，才算有德有理。一个人只要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即使

他的作为同孔孟之徒所说的“天理”和“仁义”相背离，也可称得起“一世英雄”！这不仅是对朱熹的批判，而且是对朱熹的祖师爷孔老二的批判。朱熹对陈亮的“事功”之学，非常恼火，多次向他的学生说：不破除陈亮的“谬说”，孔孟之道就不能昌明。甚至还对陈亮进行人身攻击，诬蔑他“心地不清和”，利欲太重，是在“利欲胶漆盆中”讨生活。其实，朱熹等孔孟之徒，何尝不讲“功利”？他们拼命地维护南宋腐朽统治集团的利益，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甚至甘愿向金朝屈辱投降。他们硬装出一副反对功利的样子，只能说明他们是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腐朽反动的两面派。

朱熹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退化论者。他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帝王心术的好坏，而三代之君（即夏、商、周三代奴隶主总头子）的心术最好，专行“天理”，以“道”治天下，所以三代是“天理流行”的美好盛世。三代以下至汉唐之君，心术越来越坏，专行“人欲”，以“智力”把持天下，因而三代以下，是“人欲横流”的黑暗世界。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痛斥朱熹说：如果照你那种说法，历史的发展一代不如一代，那么三代以后一千五百年间的历史和人类活动不过是勉强支持，胡混日子，这岂不要人类历史成一大空阙？又怎能出现汉唐盛世，万物繁荣流长的现象？陈亮认为古今时代不同，社会有发展变化，应根据时代不同，不断进行变革，以适合时代的需要，“有益于现实”。这与朱熹的复古守旧、复辟倒退的思想，恰成鲜明的对照。

在对待女真族贵族南下侵扰的问题上，陈亮和朱熹的态

度也迥然不同。朱熹在口头上曾一度讲得激昂慷慨，什么对金“不可和”啦！当今不能“安坐无事”啦等等，调子唱得很高。但是，由于他反动的阶级本性，很快就完全失去了抗金的信心，走上了妥协投降的道路。更恶劣的是，他对积极主张抗战的人横加指责，诬蔑他们是谋求个人富贵的“轻情巧言之士”，而对那些力主“和议”的投降派，却吹捧为是识时务的“正人君子”。可见朱熹抗战是假，投降是真。所谓“识时务”，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妥协投降的破烂不堪的遮羞布而已。陈亮坚决反对朱熹的妥协投降路线，斥责他们是麻木不仁的人，积极主张抗战。陈亮在年青时即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精心研究了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十几位历史人物用兵成败的史实，写成《酌古论》一书，以为抗战“中兴”的借鉴。公元一一六九年，他趁南宋投降派总头目宋高宗赵构退位，孝宗赵昚（shèn 音甚）登基的机会，又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写出《中兴五论》，上书皇帝，大声疾呼，主张抗战救国，打破南宋王朝苟且偷安的局面。以后又四次上书，急切要求南宋朝廷革除弊政，进兵中原，收复失地，并提出了具体的用兵计划。但在投降派的阻挠打击下，他的正确建议始终未被采纳。

陈亮还批判朱熹之流空谈仁义，反对用“赏罚”来治理国家的反动谬论，认为这是“迂腐之论”，他站在法家立场上，主张用“霸术”（法治）、用“赏罚”来管理天下，力图使统一中央集权制充分发挥作用。这是适合当时情况的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对赏罚不明，是非颠倒，革新抗战有

罪，保守投降有功的儒家反动路线的有力批判。

由于朱熹是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维护者，专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因此，宋、元、明、清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拼命地吹捧他。朱熹死后不久，南宋一个腐朽皇帝理宗赵昀（yún 音云），亲自对朱熹的儿子说：“我读了你老子写的书，认为他说得很对，如能和他同时，该多好啊！”他还对朱熹大加褒奖，先追赠朱熹为“徽国公”，后又把朱熹送进孔庙。元、明、清三代，把朱熹编的《四书集注》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科举考试一律按照朱注作文章，不得另有发挥。这样，程朱理学就成了官方哲学，统治思想界达数百年之久。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吹捧朱熹，证明他和历代的反动派是一丘之貉。而陈亮则是一个提倡事功，鄙视道学，着重实际，反对空谈，要求变革，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进步思想家。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同反动腐儒朱熹针锋相对，连续对朱熹一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揭露批判，因而多次遭到这些腐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他曾三次被诬入狱，遭到严刑拷打。但他英勇顽强，从不停止战斗。可是，因为屡遭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只活了五十一岁，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便与世长辞了。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在陈亮的思想中也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如他反对朱熹不顾社会危机空谈仁义，而强调事功，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成功的都是正确的，这是片面的、错误的。在反动阶级占统

治地位的社会中，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进步阶级的正确行动也会暂时遭到失败，受到挫折，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成败判定是非。陈亮也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束缚，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有无“本领宏大”的帝王，就是明显的例证。当然，这些在陈亮的思想中只是次要的。从总的方面看，他站在法家立场上，不愧为一位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家。

张居正改革行法治

公元十六世纪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逐渐发展，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当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一方面残酷掠夺工商业者，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市民斗争也逐渐展开。公元一五一〇年，爆发了刘六、刘七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支起义军奋战近两年，转战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江西、江苏等八个省，纵横几千里，人数达几十万，曾三次打到北京附近，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所到之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狼狈逃窜，劳动人民扬眉吐气。起义军打到河南时，烧了大官僚焦芳的房子，还按焦芳的样子扎成草人，作为靶子，表示对大官僚地主的刻骨仇恨。孔老二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劳动人民的仇敌。起义军在斗争中高举着鲜明的反孔旗帜。当起义军攻占“孔府”所在地山东曲阜时，捣毁孔府庙宇，镇压孔府贵族地主，处死反动儒生，砸烂孔庙中的大小祭器，把“神圣的”孔庙大殿当马厩，把儒家的经典《五经》《四书》，扔到臭水池里，大灭了孔家店的威风，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这次农民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却推动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儒法斗争，为张居正改革开辟了道路。

在封建社会日渐衰落的形势下，反动的官僚大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一面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面翻新花样，以主观唯心主义形式宣扬孔孟之道，毒害人们的思想。屠杀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反动道学家王守仁是集官僚大地主阶级反革命两手于一身的代表人物。

王守仁（公元一四七二年——一五二八年）又叫王阳明，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本人就是一个大官僚。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生涯中，总结了一条反革命经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挥舞反革命屠刀的同时，他极力宣扬儒家反动思想。他继承了南宋反动道学家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致良知”的反动说教。所谓“良知”，按照王阳明的解释，是一种先验的、完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天理”。他胡说反动统治阶级生下来就具有这种品质，而劳动人民的“良知”却被“私欲”蒙蔽了，因而需要“致良知”，就是要去掉“私欲”，恢复“良知”，并把“良知”发挥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说穿了就是要劳动人民放弃一切反剥削、反压迫、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俯首帖耳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他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谬论，实际上是要取消客观实践（行）。由于他的反动说教适应了大地主顽固派的需要，所以大为流行。王阳明死后，他的徒子徒孙到处聚众讲学，兜售邪说。

正在王阳明学派到处泛滥的时期，张居正作为地主阶级

革新派的代表，在当时农民起义和市民斗争的影响下，积极贯彻法家路线，同反动儒家学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张居正（公元一五二五年——一五八二年），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人，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通过科举进入政界，穆宗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入阁为大学士，隆庆六年五月，穆宗病死，年方十岁的神宗即位。张居正在神宗的母亲李太后的支持下，升为内阁首辅（宰相），直到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六月去世为止，实际掌握政权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领导着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活动。

当时，以王守仁学派为代表的道学家，以讲学为名，到处鼓吹“法先王”、“称三代”，恶毒攻击秦始皇，刮起一阵阵尊儒反法、复辟倒退的妖风。张居正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理论，公开批判孟轲“法先王”的反动思想，高度肯定荀况“法后王”的进步思想，热情赞扬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和郡县制度。他总结了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凡是按照孔孟之道搞礼治、讲仁政的，“必亡国”。早在公元一五五五年以前，张居正就曾写信给在北京聚徒讲学的王守仁的学生聂豹，批判他们的复古倒退谬论，谴责他们言行不一，信口胡说，指出他们的学说完全不可相信。随后，张居正又痛斥那些称颂“三代”的道学家是“不达时变”的腐儒，他们鼓吹“法先王”，完全是重弹宋朝卖国贼的老调。张居正掌握政权以后，就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这些道学家聚徒讲学，并下令封闭各地书院六十四处，从而给那些

空谈心性，颂古非今的反动儒生以沉重的打击。

张居正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因而，治理国家的办法，应根据形势的不同，随时进行变革。他认为当时朝政腐败，必须进行改革，推行法治，清除弊政，才能挽救深重的社会危机。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要求一切诏令要实现，一切政策要贯彻，一切议论要控制。他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考核，建立起一个贯彻执行法家路线的政权机构，严格实行法治。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限制和打击官僚大地主、大恶霸。对孔老二的后代——“衍圣公”的特权，也要加以限制。当时的“衍圣公”是孔老二的六十四代孙孔尚贤。他是一个大恶霸，平时就依仗权势剥削、欺压人民，更利用每年自曲阜入京朝贡的机会，肆意科派，纵情掠夺。沿途又生事百端，为非作歹。他们走到那里，“军民避之，无异夷虏”。他们还利用特权，大量携带私货，以朝贡为名，大搞投机倒把，从中捞取暴利。对于“衍圣公”孔尚贤的这种恶劣行径，张居正非常恼火。他说：“就是孔丘今天活着，也要严格遵守政府的法令，不得任意胡来，何况他的后裔呢？今后若再骚乱百姓，应一律进行追查，这样才算执法公平。”张居正还力主取消“衍圣公”每年亲自到北京进行朝贡的规定。在他的坚持下，“衍圣公”入朝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

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张居正也实行了一些改革。他认为豪绅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并且千方百计地逃避、转嫁赋税徭役，造成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和不少中小地主濒于破产，致

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府发生财政危机。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他执政期间，曾推行一系列抑制豪绅大地主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丈量全国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清丈的结果，查出了大批隐田，打击了豪强兼并势力，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另一项是在清丈田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新税制，将税粮、差役等大都合并起来，改为征银，按地亩和人丁征收。这样就迫使豪绅大地主必须承担他们应该负担的赋税徭役，从而减轻一些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还注重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并提出了“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即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扶助工商业的发展。他还多次召回苏州织造太监孙隆，减轻机户（丝织作坊）的负担。这些主张和措施，都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

张居正按照法家路线所进行的改革，遭到了豪绅大地主的拼命反抗，他们多次向张居正进行恶毒的攻击。万历三年（公元一五七五年），有一个御史名叫傅应祯的，在上疏中公然大放厥词，说什么天象变异，水旱不调，全都是由张居正的改革引起的。并质问张居正说：“难道你真认为天变没有什么可怕吗？难道你真认为祖宗不值得效法吗？难道你真认为人言用不着顾虑吗？”妄图用“天变”、“祖宗”、“人言”对张居正进行威胁，并攻击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是一个“三不足者”，将来一定会误国。傅应祯对张居正的这种攻击，正说明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都具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和风格。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孔孟之道，张居正应当辞职回家守孝三年。但当时各项改革正在进行，而且斗争十分激烈，如果守丧三年，就可能前功尽弃。于是，张居正按照过去曾经有过的例子，由皇帝批准，仍然照常任职。一些儒家守旧派官僚，就乘机大肆攻击，说张居正违背了“万古纲常”，不合人情，妄图借此把张居正赶下台。他们甚至借彗星的出现，制造流言蜚语，诬蔑张居正准备篡位造反。张居正同这些反动家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几个为首的抓了起来，狠狠地打了一顿棍子，驱逐出朝。大地主守旧派一切伎俩都用尽了，只好改变手法，暂时收敛一下，等待时机，准备反扑。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很坚决，并且收到一些成效，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大地主顽固派的势力，更不可能触及到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只是依靠地主集团中的少数革新派，对封建制度的某些环节做一些修补、改良工作，因而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虽执政十年，最后仍免不了失败。

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张居正因病去世。大地主保守派见时机已到，立即跳了出来，对新政进行反扑。他们把革新派官员一批批从政权中排挤出去，把一些反对改革的守旧派人物又重新安置在重要的岗位上；张居正的改革，一项一项被推翻，张居正的官爵，一项一项被剥夺，最后又以“纯任霸术”、“专恣擅权”的罪名，于万历十二年抄了张居正的家。家人被禁闭活活饿死十余口，还有的被逼上吊

自杀，有的被迫跳井，有的被发配到边远的地区充军。这是儒家腐朽势力对法家革新势力的又一次血腥报复，是儒家反动派对法家革新派所欠下的又一笔血债。但是新生事物总是扼杀不了的。张居正积极推行的“一条鞭法”，同王安石的“免役法”等一样，都是封建社会后期势所必行的制度，而张居正和王安石一样，也都以封建社会后期的改革家载入史册。

李贽反孔 宁死不屈

“志士不忘在沟壑（志士从来不怕死），勇士不忘丧其元（勇士随时准备掉脑袋）。”这是明代法家李贽临死前在狱中写的诗句。这诗句是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战斗一生的写照。

李贽（公元一五二七年——一六〇二年），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庭，生活比较贫困。二十岁后，离开家乡，颠沛流离，在穷困潦倒的生活中，锻炼了一副倔强的性格。他敢于坚持正义，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从三十岁开始，他做了二十多年的中、小官吏，接触到许多有权有势的官僚和道学家，对他们的腐朽、虚伪、奸诈行径，非常气愤。五十四岁时，他毅然辞官不干，到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一带，开始了讲学、著述的新生活。

李贽生活的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日益腐朽、没落，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残酷的封建剥削压迫，不仅迫使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城市市民也接连展开了反抗斗争。明朝封建统治阶级除了极力用武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外，同时又疯狂宣扬程朱理学和王守仁的反动学说，以加强思想统治。如果有

谁反对他们那一套反动谬论，就被看成是“离开儒家经典，背叛孔孟之道”的危险分子，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李贽不顾杀头的危险，以“掀天翻地”的气概，对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利益和要求。

李贽反儒、反道学斗争的锋芒，首先指向程、朱的祖师爷孔老二。他大胆地揭露孔丘是个“无学无术”的家伙，并指出道学家对孔老二的吹捧，纯属盲目崇拜，就象“矮子看戏跟着别人喝采，随声附和”，又象“一犬吠影，群犬吠声”一样。他反对儒家所提倡的把孔丘的言行作为区分是非的标准，认为什么事都“以孔丘的是非为是非”，那就根本没有是非了。如果干什么事都必须按照孔丘的言教才行，那么在孔丘没有出生以前，难道人们就没有是非，不能做人做事了吗？他嘲弄反动理学家朱熹对孔老二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肉麻吹捧，辛辣地讽刺说：“怪不得在孔丘出生以前，人们整天点着蜡烛走路啊！”有一次李贽读《论语·乡党》篇，看到孔丘“唯酒无量，不及乱”时，就很有风趣地说：“孔丘能喝大量的酒又不要酒疯，真是大圣人，大圣人！但是除此以外，都和一般人一样。”在这里李贽把孔丘这个被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儒生们顶礼膜拜的偶像，毫不客气地从“圣人”的宝座上拉了下来。

孔丘这个反动家伙最轻视妇女，他曾恶狠狠地诬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在这种反动思想的支配下，妇女没

有社会地位，没有人身自由。李贽坚决反对孔孟之徒所宣扬的这种“男尊女卑”的反动观点。他说：“说人的见识有长有短是可以的，如说男子的见识都长，女子的见识都短，怎么可以呢？”他在湖北麻城讲学时，就招收了很多女学生，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动说教，使女子也有学习文化的机会。他还主张男女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迫害妇女。他对理学家诬蔑西汉时寡妇卓文君自己作主和司马相如结婚是“淫奔”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指出卓文君的举动是“善择佳偶”，是值得称赞的正当行动。李贽这种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对理学家拚命鼓吹的封建礼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李贽还用最明显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他指出：孔丘嘴上说他没有富贵之心，实际完全不是那回事。譬如他代理鲁国宰相职务仅仅三个月，光各种皮袄，就捞了一套又一套，真是富贵享受达到了极点，这哪里是什么不要富贵！李贽还指出：那些理学家和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一样，也都是一些表里不一的家伙，他们嘴里说的是仁义道德，心里想的是升官发财，表面装做正人君子，实际行为活象猪狗。平时只知道打躬作揖，一旦国家有事，就“面面相觑（xū音虚），绝无人色”，想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狗命和富贵。当时有一个以孔老二正统派继承人自居的大官僚耿定向，去同李贽辩论。李贽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就是一个‘言不顾行，行不顾言’，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把耿定向批得狼狈不堪。

李贽在猛烈抨击孔孟之道的同时，热情地赞扬法家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推崇秦始皇是“千古一帝”；称赞李斯建议推行郡县制是“千古创论”；赞扬曹操“能用人，知大计较”，“可称之为江、淮、河、海之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夸奖武则天有智慧，有才能，是“明察善断”的“圣后”，“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赞扬柳宗元的《封建论》“卓且绝矣”，好得很。对当代法家张居正也同样推崇，认为张居正是“宰相之杰”。

李贽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对法家的赞扬，是对封建统治者正统思想的沉重打击。他的进步思想受到当时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反动统治者和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则视为洪水猛兽，对他恨之入骨，不择手段地进行迫害。李贽针锋相对，毅然宣布：“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反动派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于公元一六〇〇年冬，组织了一批流氓打手，把李贽居住了十多年的龙潭芝佛院（在湖北麻城）和准备死后葬骨的塔，都焚烧和捣毁了。李贽被迫移住通州。但凶狠毒辣的反动派并不就此罢休，公元一六〇二年春，他们以李贽“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等为口实，让皇帝出面，给他扣上了“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悍然将重病中的李贽非法逮捕入狱。在狱中，李贽面对凶恶的敌人，坚贞不屈，他写道：“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意思是说名山大川我都走遍了，就是这监狱我还没有进来过。显示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同年三月十六日，七十六岁的李贽，在狱中硬被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

者残酷地迫害死了。

李贽死后，封建统治者不仅极力掩盖罪证，而且明清两代都把他的著作列为禁书，加以焚烧，不准流传。但是李贽的进步思想的影响是永远扑不灭的。他的思想和著作不仅在当时起到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而且为后来许多反封建的思想家所继承。当然，李贽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的思想还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儒家的批判和对法家的肯定都还不够彻底。例如他尊崇法家，但有时也指责法家；他批判了孔孟，但有时也赞美几句。这表明，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同尊儒反法的思想彻底决裂的，更不可能把孔孟的偶像真正打倒。

反倒退王船山狠批程朱

公元一六九二年阴历正月初二日，明清之际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与世长辞了。王船山生于公元一六一九年，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在临死的时候，给自己题了一个“碑铭”，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抱刘越石之孤愤”，“希张横渠之正学”。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刘越石就是东晋将领刘琨，是一位著名的抗战英雄。当西晋政权被我国西北匈奴族的统治者刘渊父子灭亡以后，刘琨奋发图强，枕戈待旦（枕着武器等待天亮），闻鸡起舞（听到鸡叫就起来练武），下定决心要推翻匈奴贵族统治者。他带着一支孤军，转战中原，最后牺牲了。张横渠即张载，是北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非常推崇这两人，说他自己政治上同刘琨一样，抱有抗敌到底的意志，在思想上希望继承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两句话概括了他一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抱负。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末清初大动荡的时代，社会矛盾非常复杂，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非常尖锐。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大顺农民革命政权。但是农民革命军的胜利成果并没有巩固下来。就在这年五月，

盘踞在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勾结我国东北的满洲贵族，攻陷北京。反封建统治的革命战争随之转化为反民族压迫的抗清斗争。在人民抗清斗争的鼓舞下，王夫之等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组织义军，抗击清兵，卷入到反清斗争的洪流中。可是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大江南北的抗清运动相继都被镇压下去，清王朝取得了在全国的统治。

满洲贵族为了配合军事镇压，也和汉族反动统治者一样，乞灵于孔孟之道，特别把程（程颢，程颐）、朱（熹）反动理学奉为至宝，极力推崇。清朝皇帝亲自给二程祠书写“学达性天”的匾额。他们吹捧二程能把孔老二的天命论和人性论贯通起来，吹捧朱熹能集孔孟之道的大成，继承了孔孟“千百年绝传之学”。为了利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大肆传播纲常名教的反动著作，《御注孝经》、《内则衍义》、《理性精义》、《理性大全》以及朱熹的《四书集注》、《朱子全书》纷纷出笼。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去人欲”等反动口号，到处喧嚣。

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农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抗清斗争的实践，给王夫之思想以深刻影响。他在抗清斗争失败后，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迫害，就隐居到衡阳石船山下，用他手中的笔在继续战斗，被后人称为船山先生。他共写出了四百多卷著作，继承了张载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从法家的立场出发，在哲学、史学等方面，向清统治者所宣扬的反动程朱理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程朱反动理学宣扬“理（精神）在气（物质）先”的客

观唯心主义谬论，即认为“理”是产生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并胡说什么在没有天地以前就有“三纲五常”之“理”。王夫之针锋相对，提出了“理在气中”，即精神离不开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他用许多实际事例说明这一唯物主义观点，驳斥程朱理学的反动谬论。他说：没有弓箭以前就不会产生“射道”（射箭的道理和技术）；没有车马之前，也决不会产生“御道”（赶车的道理和技术）。同样，在人类社会出现家庭、国家之前，也就根本不会有什么“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儒家所谓的纲常名教。

程朱理学拚命宣扬“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谬论，王夫之也是针锋相对。他说：“天理离不开人欲，人欲就是天理”，并且明确指出：“饮食男女之欲”，是人类所共有的，不能去掉。王夫之由于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对“人欲”还不能进行阶级的分析，这是错误的。但是，在反动派极力用“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谬论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的时候，他揭露了程朱理学的反动性，要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强调人们争取生存的权利，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孔孟之徒为了开历史倒车，总是把古代社会加以理想化、神秘化，提倡复古，鼓吹历史退化论。孔丘为了复辟奴隶制，曾编造“三代盛世”的谎言。孟轲言必称尧舜，狂热鼓吹“法先王”。南宋的朱熹则胡诌什么“三代”乃是“天理”流行的时代，而后世一千五百年间全被“人欲”所支配。王夫之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他认为这些都是颂古非今的谬论。他说：唐尧、虞舜以前，人类处于野蛮状态，自

夏、商、周以后，人类文明才有了明显的进步，秦汉以后的社会，比起以前的社会更有大的进步，秦以前的“封建（分封）之天下”与以后的“郡县之天下”相比，简直是葛（麻布）与裘（皮袍）之比，要复三代就是弃皮袍而取麻衣。王夫之尖锐地指出：那些主张回到“三代”去的复古主义者都是“贼民病国”的家伙，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孔孟之徒为了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还竭力宣扬历史宿命论，说历史是上帝或“天”创造的。王夫之以他的“理势合一”的历史理论，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说，合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之势就是理。势变了，理就要变，理随势转，理和势是一致的。王夫之根据这种“理势合一”的理论，认为秦始皇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乃是历史发展的“势”之所趋，“理”之必然，决不是什么上帝或天的意志的安排。同样，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人之所以遭“危亡之祸”，也决不是什么由于触犯了“天”，而是受到历史应得的惩罚。所以，王夫之责问历史宿命论者说：“天何心哉？”哪有什么天的意志来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呢？

如何看待秦代实行郡县制，怎样评价推行郡县制的秦始皇，这是两千年来儒法论战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孟之徒站在复辟倒退的立场上，恶毒攻击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是“绝灭先王建国的体制”，“忘记先王治国的原则”，是大逆不道。王夫之在批判儒家反动历史观的基础上，针对这种反动谬论，据理驳斥，颂扬郡县制，肯定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

作用。他在《读通鉴论》的开头第一篇，就是关于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评论。他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认为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在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不可抗拒的。因此，不管儒家怎样咒骂秦始皇，可是郡县制已经实行了将近两千年而不能改变了。王夫之根据历史事实具体地说明了封建制的郡县制比奴隶制的分封制有许多优点。

实行郡县制有利于选有才能的人管理国家。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各个受封的国王和官吏是世袭的，做官的子孙代代做官，种田的子孙代代种田。这是不合理的。在世族中也会出现笨蛋，而农民中也会有优秀人物。优秀的人物毕竟不能长期屈居于笨蛋之下。这样势必引起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而在郡县制的条件下，各个郡守县令，都是由中央选拔委任的，其子孙不能世袭，这样可以把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加以任用，不称职的人也可以随时罢免。当然这里应该指出，封建制的郡县制只能是地主阶级的专政。王夫之所说的选拔有才能的人，不外就是将地主阶级内部有才干的人，选拔到统治岗位上去，向劳动人民实行专政。

实行郡县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王夫之用历史事实作比较，认为自三代实行分封制以来，诸侯各自为政，擅自兴兵，互相侵伐，这自然会造成天下混战，国家衰败的局面。后世实行了郡县制，没有中央的指示，地方不得擅自兴兵，中央制定的法律，地方不得任意违背、废除，政令统一，这就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国家统一，人民所受

的痛苦也比过去减轻些。从利害关系看，郡县制比分封制利多害少。

王夫之所以能对郡县制和秦始皇作出肯定的评价，是他坚持进步的历史观的表现。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在“变化日新，生生不息”地进化着，越到后代越文明，后代总比前代强，永远是今胜于昔。王夫之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对以后进步思想家和革新运动都有很大影响。不过，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王夫之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动力，更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认为“君相”可以“造民物之命”，即认为帝王将相决定国家、人民的命运，在历史观上，仍然受着唯心主义的束缚。

龚自珍怒驳嘉庆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就走向衰落。整个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日趋瓦解的历史转折时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逐步成长起来，瓦解着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极度腐败，贪污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说是无官不贪。在嘉庆、道光两朝久任军机的曹振鏞，政治上是个“不倒翁”。他的门人弟子很羡慕，问他做官有什么诀窍，他无耻地回答说：“多磕头，少说话。”嘉庆初年的大学士和珅，是个大贪污犯，嘉庆皇帝查抄了他的家产，共列清单一百零九号，仅就其中的二十六号作了估价，就折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万多两。有人估计其全部财产达八亿两，相当于一年正赋收入的二十倍。当时有这样的民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些民脂民膏又落到了最大的贪污犯嘉庆皇帝手里了。这种腐败情况，也赤裸裸地反映在军备上。骑兵无马，水师无船，士兵摆摊做小生意，军官养鸟斗蛐蛐。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俄国从东北、西北窥伺我边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西南、东南伸出魔爪。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严重，迫使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公元一七九六年至一

八〇四年的白莲教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活动在湖北、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公元一八一三年，天理教起义军领袖林清派人潜入北京内城，曾一度攻入皇宫，把仇恨的利箭射在隆宗门的匾额上，使清宫里的一小撮皇族权贵，在多少年后提起来还谈虎色变。他们钩心斗角，互相厮咬，也常以“林清来了”吓唬对方。

激烈的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促使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他们以法家思想为武器，要求革新，主张发展生产，提倡富国强兵，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龚自珍就是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一个突出代表。

龚自珍（公元一七九二年——一八四一年），号定盦（ān 音安，同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一个三世为京官的官僚家庭，受过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但是，他冲破了当时笼罩着学术思想界空谈性命和脱离现实的考据训诂学风，以极大的热情探求“经世之学”。他当过二十年的小京官，同林则徐、魏源等有良好的友谊。同时，与劳动人民有某些接触，对劳动人民在腐败官府敲诈勒索下的苦难生活，寄予很大的同情。他的诗文，处处都表现出他的进步思想倾向和敏锐的观察力。他自己曾说：“文章酸辣早，知觉鬼神灵”，这种“酸辣”的文风，自然不容于表面上“温柔敦厚”，骨子里凶残虚伪的孔孟之徒，因此常常遭到恶毒的攻击。龚自珍四十八岁那年，得罪了上官，便辞职回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年，即公元一八四一年，年仅五十岁的龚自珍忽得“暴疾”，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龚自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他指出，清王朝虽然维持着表面的繁荣，实际上却已经处于行将灭亡的“衰世”，是太阳快落的时候了，悲风扫过，燃起灯烛，光线惨淡，如在梦境。一旦“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下便会波涛汹涌地沸腾起来。这个“山中之民”是谁？龚自珍未作说明。可是他隐约地看到农民起义的风暴就要来临了。农民起义推动了他的变革思想。他说：没有不覆灭的一家一姓的王朝，有的王朝很快改朝换代的原因是拘泥于祖宗的成法，唯恐别人起来议政，皇帝一人说了算。拘泥于祖宗成法没有不失败的，而经过大家议论的政令都一定能通行无阻。与其将来被迫改革，那如自己主动起来改革？他的政论，常常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嘉庆皇帝。公元一八一三年天理教起义军杀进皇宫的事件发生后，清政府惊恐万状，嘉庆皇帝下了一道上谕，乞灵于孔孟之道，责备大小群臣，痛骂奴才们“顽钝无耻，名节有亏”。龚自珍看到这个荒谬的上谕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写了《明良论》四篇，对嘉庆皇帝大加批驳，对孔孟的反动教条，提出公开挑战。龚自珍尖锐地指出：近年的士人，从做官那天起，知耻之心已剩下不多了，做官越久、越大，越精通吹牛拍马的功夫，就根本谈不上名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根源是皇帝对臣下象对待猪狗一样，“朝见长跪，夕见长跪”，知耻之心，早已摧残干净了。他说：历代君主都是“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万民必得服从，一旦国家有事，反而又责备群臣没有气

节，不是太晚了吗？龚自珍敢于冒犯皇帝的淫威，把政治上的毫无生气，算到皇帝头上，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

龚自珍探讨了清王朝转入“衰世”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是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发展下去，穷苦人的强烈不满，就会“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必发为兵燹”，就是说，要爆发农民战争，直至“丧天下”。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他大声疾呼，主张实行变革，并提出“均田”等改良措施，想抑制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他要求实行的改良，都是为了维护垂死的封建制度，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和反动性，是行不通的。他所提的“均田”，同当时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剥削而要求的“均田”，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他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抨击和揭露，给后来的资产阶级活动家以某些启示，成为十九世纪维新思想的先驱，这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龚自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沙皇俄国、英国等国的侵略活动十分警觉。为了反抗侵略，他用了很大力量，研究边疆地区的地理和历史。他对一些“浅见愚儒”胡说什么加强国防，劳民伤财，是所谓“不智”，平定边疆叛乱是所谓“不仁”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曾效法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上书道光皇帝，反复强调应移民实边，加强边防。道光叫他写了个《安边绥远疏》。龚自珍洒洒千余言，提出在新疆撤去有名无实的屯田，改为私田；加强伊犁驻军的训练，以达到“足食足兵”安边绥远的目的。但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建议未能受到重视。鸦片战争前夕，鸦片大量涌

入，白银滚滚外流，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在对待英国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形成了抵抗派和投降派。抵抗派以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投降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代表，反对禁烟，主张“宽严得中”，实际上是要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屈膝投降。龚自珍坚决站在抵抗派一边。公元一八三八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龚自珍特意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赠言送行。文中痛斥了穆彰阿之流所谓“宽大”谬论，提出对鸦片吸食者、贩卖者、运造者处以绞刑和斩刑的主张，并强调须“重兵自随”，“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器”，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龚自珍的爱国主义热情，给林则徐以很大的鼓舞。

龚自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孔老二。他认为孔老二并不是天生的圣人，孔门的经籍也不是万世不变的“圣人之学”，而只是“一代之学，一代之治，一代之法”。他认为儒家的“天命”论是统治者束缚人的工具。对“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对统治者生来就“性善”的否定。他说：“性善恶皆后起者”，不是先天固有的，人性好比杞柳一样，既可以制成杯子，又可编成篱笆，还可以制成刑具，哪有什么先天的“性善恶”可言呢？这种对儒家的批判和“不敬”的态度，也表现了他的反潮流精神。

龚自珍晚年有“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诗句，大体概括了他一生的活动，也是一个比较确切的自我评价。龚自珍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开了议论时政和注意研究边疆历

史地理的风气，影响很大，给十九世纪末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很大启示。清末有人曾说：初读龚自珍的文章“若受电然”。反动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把封建社会的急剧衰败归因于龚自珍所开的“风气”，从这里也可见影响之深远了。

但是龚自珍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有他明显的阶级烙印。他虽然对腐朽的清政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但又认为“可以更，不可以骤”，反对激烈的变革。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一定的同情，但他主要考虑的是唯恐丧失了地主阶级的“天下”。他对孔老二有所批判，但在他辞官回籍路过曲阜时，又曾到孔庙“朝圣”。可是，从龚自珍的一生来看，尊法反儒，积极主张改革，反对保守倒退，是他的思想的主流。“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yīn 读音，意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这首著名的诗，正是他的进步思想的写照。他对我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进步影响，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严复译述《天演论》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勾结，野蛮地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使中国更加陷入苦难的深渊。广大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强烈要求改变现实，抵抗外来的侵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前仆后继，一浪高过一浪。三元里人民抗战的吼声，吓得英帝国主义侵略者丧魂落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英雄们，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以摧枯拉朽、风扫残云之势，给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腐朽反动的清王朝以及他们所利用的统治工具——孔家店以沉重打击。在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为了国家的复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那时不辞艰辛，寻找革命真理的一个代表人物。

公元一八五三年，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的那一年，严复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乡下一个医生的家庭里。严复小的时候，读过一些《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但是由于他的家境贫寒，不能和当时有权有势的子弟一样，沿着所谓科举的“正途”向上爬，所以在十四岁

的时候，就考进洋务派在福州举办的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技术。后来，又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本来清政府派一批青年出国，是想把他们培养成为“良将”，但是，严复在英国两年多，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军舰上，而是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考察、探讨和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对严复的影响很大。通过考察和钻研，使他相信：要想改变祖国贫困落后的面貌，必须向西方学习，并通过改良主义道路，使中国富强起来，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

公元一八七九年，二十七岁的严复，在英国一个海军大学毕业，抱着“变法图存”的满腔热情回到了祖国。他在洋务派头子大官僚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但是，李鸿章办海军的目的是为了培植私人势力，把海军作为他勾结洋人的媒介，一切都依靠洋人。严复虽然是国家海军学校的校长，但实际上并没有发言权，因此眼看着海军腐败下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公元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在李鸿章卖国投降路线的祸害下，全军覆没，水师学堂也毁于炮火之中。中法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纯是欺人之谈。严复对于洋务派的卖国行径，非常气愤。他常对人说：“这样下去，用不了三十年，我国就要象一条老牛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他觉得在海军里实在难于有什么作为，便想脱离海军，另谋出路。他曾和朋友们集资在河南修武（焦作）创办煤矿。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创办私人企

业，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他又退一步，想从科举上打开一条出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严复虽作得一手上好的八股文章，但因他的思想不合顽固守旧势力的需要，屡试不中，这条路也给堵死了。这时严复已经四十岁了，他回顾过去，感慨万端，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年误习傍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傍行书指的是英文，意思是说：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怀抱”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反而被人看成是假洋鬼子，苦闷极了。

公元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传来，给严复以很大的刺激。战后，英、俄、日、德、美等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在眼前。残酷的现实，使严复从悲观颓唐中惊醒。他决定著书立说，宣扬革新。这一年，他连续在天津发表了几篇政治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第二年，他又陆续发表了他译述的《天演论》。在这些译著中，处处洋溢着他的爱国热情，大胆地抨击了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腐朽的社会政治，较系统地介绍了西学、新学。他站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强烈地要求变革，要求进步。这就引起了顽固派守旧势力的反对，恶毒地攻击他“披发狂叫、白昼见魅”。可是，他传播的理论却不胫而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孔老二的一套反动说教，代表着落后、保守、反动势力的利益，要改革，要前进，就必须批判孔老二这个头号反动思想权威。当时，正是尊儒派提出的“保教”反动口号到处

喧嚣的时候。所谓“保教”，就是保孔孟之道。严复把“保教”斥为“怪事”。“怪”在那里呢？严复说：通常一个“教”总是告诫教徒不杀、不盗、不淫、不讲假话等，而现在拚命叫喊“保教”的人，却正是做尽坏事的家伙。这些人有什么资格谈保“教”呢？况且一个“教”，如果当面讲的是一套，背后做的又是一套，就是整天敲锣打鼓也是保不住的。孔老二的“教化”在中国统治已两千多年，把中国闹成这样局面，“其教有流弊根苗”，是件很清楚的事。在批判孔老二的同时，他又推崇法家人物。他说秦始皇的“坑儒”，是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是理所当然的。秦朝的博士儒生大发谬论，危害国家，坑掉他们，实在不算什么过分。在《辟韩》一文中，严复痛斥唐朝尊孔顽固派韩愈的尊君谬论，大胆地把皇帝比作“窃国大盗”。因为皇帝从人民手中盗窃了国家的权力，所以非常害怕人民觉醒，于是便利用孔孟之道和多如牛毛的法令，败坏人民的身体、智力和德行，妄图使人民永远不得收回固有的权利。他在《原强》一文中提出“鼓民力（锻炼人民体魄）”、“开民智（提倡西方科学）”、“新民德（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如设议院、地方官公举等）”，大力宣扬“尊民叛君”的思想。他把资产阶级的“新学”、“西学”和孔孟之道的“旧学”、“中学”对立起来。新的应该提倡，旧的应当批判，振聋启聩，在当时思想界曾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严复为了更系统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于公元一八九六年把他译述的《天演论》陆

续在天津发表。《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宣传进化论的小册子。天演就是进化的意思，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天演论》的前半部是唯物的，主要讲生物界经过亿万年的演变才变成今天的样子。世界本来还有许多生物，因为不适应外界环境，所以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失败了，这种生物便绝了种。另外一些生物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得到胜利，便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天演论》用大量的事例论证了生物界是由低级到高级演变而来的。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新观点、新思想，给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严重打击。这种看法是符合生物界的客观发展规律的。但在《天演论》的后半部，却把这种观点硬套到社会学的领域里，便成为错误和反动的谬论了。这就是庸俗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照这种反动谬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帝国主义就会被说成是社会竞争的优胜者，它理应生存，发展，侵略有理；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则是社会竞争中的劣败者，理应被淘汰，被侵略活该。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伪科学，极其反动，必须批判。严复也承认“物竞天择”的规律适用于“政教”（社会领域），这是帝国主义打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的一块印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软弱性的一个表现。但是，严复作为一个处在上升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言论，和后来买办资产阶级的“月亮还是外国的圆”的奴才腔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他在承认天演适用于“政教”的同时，再三强调：进化的精要，就是

前进者就能生存，传流后世；不前进的就要垮台、灭亡。这就是鼓励人要发奋图强，去旧图新，自强自立，努力去战胜这个“天”。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经过严复改造的《天演论》，已和庸俗进化论有所不同。帝国主义要人们承认这个所谓的“天”，妄图永远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严复则要求人们发奋图强，战胜这个“天”，而只有自甘落后，才会被“天”所淘汰。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加上了很多按语，发表了不少自己的议论，已经给《天演论》加上了新的含意。所以鲁迅先生说：严复“做”了《天演论》。即是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翻译了。严复在《天演论》的“自序”中说：“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这个古人是谁？很清楚，是指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法家荀况。严复把法家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联结起来，给封建的守旧的反动思想很大冲击，影响中国思想界二十年之久。

《天演论》虽然用“变”的观点驳斥了形而上学的“不变”观点。但却只承认量变而不承认质变。严复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思想。严复的思想中有“变”，也有“不变”。作为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忍受不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排挤时，就要求“变”。另一方面，他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上层，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直接间接的联系，因此，又不敢“变”，害怕“变”，和叶公好龙一样。《辟韩》一文发表后，打中了顽固守旧势力的要害。洋务派头子张之洞怂恿一个反动文人写了一篇《辩辟韩书》，猖狂反扑，并对严复进行威胁恫

吓，扬言要杀害他。严复被这气势汹汹的逆流所吓倒，越来越转向保守，以致连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也没积极参加。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他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五四运动时期，他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反对提倡白话文，攻击赞助学生运动的人是“神经病”，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反动派。在他转向保守的同时，也从反儒转向尊孔，当年的反孔斗士，现在却伏在孔老二的脚下忏悔了。公元一九二一年，严复无声无息地死去，人们早已把他忘怀了。

严复的转变，充分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泽东选集》第690页）由此证明：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任务，资产阶级是无法完成的。从严复的一生，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历史教训：一个人不管他在历史上曾经作出怎样的贡献，只要他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就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所吞没。

章太炎批康反袁

章炳麟（公元一八六九年——一九三六年），号太炎，浙江省余杭县人。他在青少年时期，目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卖国行径，就强烈地主张反抗侵略，变革图强。甲午战争后，年轻的章太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投身于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担任过资产阶级改良派《时务报》的编辑工作。但是，康有为等跪着“造反”，不敢触动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并且扯起孔老二的破旗，鼓吹“以孔教为国教”，这使章太炎极为不满，他对这种荒谬的骗人之谈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康有为的喽罗们被他驳斥得恼羞成怒，竟扬言要揍他一顿。章太炎无法和他们展开正常的辩论，愤然辞去了《时务报》馆的职务，开始转向革命。

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很快便失败了。事实证明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接着，公元一九〇〇年，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革命运动爆发了。在这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一九〇五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并拟定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这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已完全堕落成为一个反革命的派别。他们成立保皇会，死保其主子光绪皇帝。一个要革，

一个要保，于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论战激烈地展开了。

康有为一伙根据孔老二的“忠君”、“仁恕”、“天命”以及“上智下愚”等反动教条，胡说清朝历代皇帝如何实行“仁政”，光绪皇帝又是多么“圣明”，情愿主动地“变法”、“立宪”，因此，中国不必革命。又胡说什么光绪皇帝经过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大难不死，都是“天命”决定的。这就是说，光绪皇帝有“天命”在身，革命便是“违天逆时”。他们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胡说什么革命会造成“流血成河、死人如麻”，引起大乱，祸国殃民。他们又诬蔑中国人民“民智低下”，“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没有革命资格。他们还编造了中国有了孔老二的“教化”，使“人人平等”，“自由已极”的胡话。总之，中国人民不能革命，不配革命，不必革命，只要按照他们的改良路线走下去就行了。

章太炎针对康有为、梁启超一伙尊孔保皇、宣扬改良的鼓噪，在一九〇二年写了《订孔》一文，对他们的谬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文中借用一个日本学者的话，指出孔老二是中国的“祸本”，以后的儒者对孔老二的说教抱残守缺，不敢有一点变动，因此，两千四百多年没有进步，罪恶全在孔老二身上。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又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面驳斥了康有为根据孔孟之道反对民主革命的无耻澜言。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舞文弄墨，倡言保皇，不过是甘当奴隶，让其主子赏识自己的“忠心”，以换取高官厚禄，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行径。而清政

府的尊孔，不过是愚弄人民以保持其反动统治的手段罢了。对于康有为歌功颂德的“**圣明**”皇帝光绪，章太炎直书其名，极端蔑视地骂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光绪这个小丑，连豆子和麦子都分不清，什么**圣明不圣明**！载湉当年赞助变法，不过是出于和那拉氏（慈禧太后）争夺政权的需要。他为了争夺政权，不惜里通外国，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按其罪行应该杀头，有什么理由奉这个卖国贼为主子呢？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还驳斥了康有为鼓吹的“**天命论**”，认为要改变现状，不是靠什么“**天命**”，而是靠人们的力量。对康有为宣扬的革命要“**流血成河**”的喊叫，章太炎列举了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经过流血的斗争才取得成功的事实，指出中国革命也非通过暴力不可。至于康有为所谓“**民智太低**”，没有能力革命的谬论，章太炎指出人民的智慧是在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他举例说：义和团初期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经过斗争实践，认识到清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面目，两年后，在直隶省（河北省）发生的景廷宾起义，就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了。他满怀信心地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认为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破坏，而是破中有立，是“**补泻兼备**”的救时良药。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在斗争的实践中不但改造着客观世界，而且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

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章太炎关于革命实践和革命战争的言论，当然还不可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还夹杂着些庸俗进化论的糟粕；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历史上法家唯物主义思想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批判了孔孟之道，对嚣张一时的康、梁反革命保皇谬论给予迎头痛击，在中国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后，中外反革命势力十分惊恐。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章太炎，把他囚在上海租界的“西牢”之中。章太炎在狱中仍坚持革命斗争。一九〇六年，帝国主义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章太炎。章太炎出狱后即东渡日本。这时，同盟会已成立了一年，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同盟会为章太炎出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到会两千多人。由于会场太小，许多人挤在屋檐下，趴在窗台上，踮着脚尖听章太炎演讲。章太炎在演说中严厉地批判了孔老二，指出孔老二一生光想做官，满脑子功名利禄；一个革命者如果夹杂着孔老二这样的思想，就象传染了病菌一样，要残害全身。他大声疾呼：“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他还批判了程朱“理学”，借用清初进步思想家戴震的话说“理学杀人”，并指出清朝的皇帝正是以“理学”作帮凶任意残害人民。因此，要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进行民主革命，必须同时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他的演讲，使到会的革命青年和革命党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不久，他又发表了《诸子学略说》，继续抨击和揭露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醉心名利，哗众取宠，模棱两可，奸诈虚伪的丑恶行径。在批判儒家的同时，章太炎热烈地赞扬了法家。他说商鞅不畏强暴，勇于革新，是一个坚强正直的硬骨头。他对荀子“法后王”的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比孔老二的学问大得多。他指出，法家并不是以刑罚为目的，而是以刑罚作为镇压旧势力，维护新制度的必要手段。这是对两千年来一切尊儒反法的反革命小丑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保皇派的论战中，章太炎站在斗争的前列，“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通过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革命思想压倒改良思想，保皇派越来越不得人心。革命派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胜利，为辛亥革命扫除了思想障碍。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这里，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章太炎是作出了贡献的。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复辟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一得势就向人民反攻倒算，准备复辟帝制，把历史拉向倒退。复辟必然尊孔反法。一九一三年，袁世凯发表“祭孔令”，大搞尊孔读经，想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袁家王朝的“幸福之门”。康有为一伙赶忙出来吹喇叭，抬轿子，在《不忍杂志》上专门攻击民主共和制度，叫嚷要“以孔子

之教为国教”。一些封建余孽、清朝的遗老遗少组成“孔教会”，向袁世凯献媚邀宠。帝国主义分子也亲自出马，为其奴才撑腰打气，叫嚷什么孔教应和基督教“携手合作”。老沙皇俄国的一个文化特务盖沙令，指手划脚地胡说：“孔教是中国之基础”。一时间，群魔乱舞，气焰十分嚣张。

章太炎在这场尊孔复辟的逆流面前表现十分坚定。一九一三年秋，他不顾个人安危，赶到北京，痛斥袁世凯“包藏祸心”。袁世凯把他软禁起来，他毫不屈服，每天在纸上大书“袁贼”二字。一九一四年二月，章太炎准备逃离北京，由于袁家特务监视甚严，未能成功。章太炎愤怒已极，便手持羽扇，把过去袁世凯授给他的勋章做扇坠，直奔新华门找袁贼算帐。袁贼不敢见他的面。他一怒之下，把总统府招待室的家具、器皿砸了个稀巴烂。

在被禁期间，他陆续写了《驳建立孔教议》、《秦政记》、《秦献记》等文章，向尊孔复辟的反动谬论猛烈开火。他痛斥康有为伙倡“孔教会”是“怪妄”，是想做当代的董仲舒，这是绝没有好下场的。他辛辣地嘲讽袁世凯尊孔、祭天，骗不了人民，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对康有为等诬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谰言，他明确地指出：“不燔(fán音凡)六艺，不足以尊新王”（不烧掉儒家的六经，就不能树立新兴地主阶级的权威）。他还指出：“推行法家路线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恰恰相反，这倒是秦始皇成为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原因。秦始皇统一中国，厉行革新，创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历代皇帝中最高大的一个。”章太炎尊古代

的“新王”秦始皇，就是歌颂辛亥革命，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把他的反孔反复辟的思想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而只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这种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使得袁世凯肆无忌惮地大做其皇帝梦，终于在一九一五年演出了“洪宪皇帝”的丑剧。这个注定短命的“洪宪皇帝”只支撑了八十三天，便被人民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再一次充分证明，凡是搞复辟倒退的家伙，都是要倒霉的，没有好下场的。康有为的保皇也好，袁世凯的称帝也好，都成为历史的笑柄。林彪一伙利令智昏，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王朝，使我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最后落得个更惨、更可耻的下场，这是必然的！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尊法反儒，旗帜鲜明，同康有为、袁世凯之流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不愧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但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使他不可能彻底批倒孔老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到了他的晚年，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转向反面，跟在反动派后面尊孔读经了。毛主席在论述资产阶级的特点时曾经指出：“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章太炎由反孔到尊孔的转变，说明资产阶级不可能担负起彻底批倒

孔孟之道，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历史任务。只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才能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批孔斗争引向彻底的胜利。

编 后 记

在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部分教师和工农兵学员承担了编写《儒法斗争史话》的任务。在深入研究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力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来分析、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并尽力把它写得通俗易懂。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所限，远远没有达到上述要求，缺点和错误一定会有。我们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工农兵读者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儒法斗争史话》曾在《河南日报》上连续刊载，这次付印前，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在报纸发表前，郑州印染厂的工人同志们帮助我们对初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特在此致谢！

开封师范学院《儒法斗争史话》编写组

一九七四年九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儒法斗争史话

作者 = 开封师范学院《儒法斗争史话》编

页数 = 1 8 8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1 9 7 5 . 0 5

出版社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书名

目录

序言

立法制管仲相齐国

作竹刑邓析反周礼

以法治军孙武练女兵

针锋相对少正卯斗孔丘

李悝相魏制《法经》

西门豹治邺破神权

吴起治楚狠斗旧贵族

商鞅变法为统一奠基

反儒学荀况批孟轲

批儒论法韩非集大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

承秦制刘邦建汉

卫汉业吕后除奸

巩固统一文景削藩

强本弱枝武帝兴国

桑弘羊舌战群儒

汉宣帝训诫逆子

王充伐孔刺孟

曹操打击豪门坚持统一

诸葛亮以法治蜀

范缜大讲“神灭论”

武则天做皇帝

柳宗元奋笔斥韩愈

王安石三斗司马光

反理学陈亮斥朱熹

张居正改革行法治

李贽反孔 宁死不屈

反倒退王船山狠批程朱

龚自珍怒驳嘉庆

严复译述《天演论》

章太炎批康反袁

编后记